



目 录

苏联解体研究专辑

苏联解体·范畴篇

- 3 潘兴明 / 帝国研究视角下的苏联解体研究
15 李永晶 / 苏联解体与文明进程——马克思·韦伯“俄国革命论”的视点

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改革专论

- 29 M·坎加斯普罗 / 苏联改革的两面性：从改革走向崩溃
46 K·彼得罗夫 / 建构、重建与解构：从概念史视角看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实证篇

- 71 庞昌伟 / 国际油价波动与苏联解体
85 任 琳 / 中俄和解研究

苏联解体·认知篇

- 96 林精华 / 世界殖民帝国历史的和平结束——21世纪初俄国人对苏联解体的认知
118 于 滨 / 转型的迷茫与困惑
137 胡 彦 辑 / 俄罗斯大事记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李敏焘

杨 成

刘 军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2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1 年 12 月 23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1 年第 6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Пань Синми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азвал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мперий..... (3)

Ли Юнцзин

Развал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процесс развит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и---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акса Вебера (15)

Маркку Кангаспуро

Два лица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от реформ к коллапсу..... (29)

Кристиан Петров

Создание,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и д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развал СССР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стории понятий (46)

Пан Чанвэй

Колебания мировых цен на нефть и развал СССР..... (71)

Жэнь Лин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имирения (85)

Линь Цзинхуа

Мирное завершение истории мировых колониальных империй---Отношение русских в начале 21-го века к развалу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96)

Юй Бинь

Путаницы и за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в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х..... (118)

俄羅斯研究

2011 年第 6 期 (双月刊)

Contents

Pan Xingming

Studies on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from a Perspective of Empire Studies (3)

Li Yongjing

Collapse of the USSR and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Max Weber in His Essays on Russian Revolution (15)

Markku Kangaspuro

Double face Perestroika: From Reforms to Collapse (29)

Kristian Petrov

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deconstruction: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nceptual history (46)

Pang Changwei

Fluctuation in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USSR (71)

Ren Lin

On Sino-Russian Reconciliation (85)

Lin Jinghua

Peaceful End of World Colonial Imperial History:Russians' Perceptions on USSR Disintegration in Early 21st Century (96)

Yu Bin

From Sovietology to Russianology: The Agony of the Switch..... (118)

苏联解体·范畴篇

帝国研究视角下的苏联解体研究

潘兴明*

【内容提要】苏联的建立与演进，似乎都与“帝国”有复杂的关联性。其前身——俄罗斯帝国是典型的陆上帝国。苏联成立后坚持反帝立场，但之后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其标志就是形成了核心—边缘的帝国结构体系，以苏联统治中枢莫斯科及俄罗斯为核心，向外形成了三层边缘地带，其中第一层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第二层是中东欧华约成员国，第三层是在亚洲和美洲的经互会成员国。苏联解体实际上是“帝国终结”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次迟来的非殖民化，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这方面的具体原因至少有以下三个：其一，苏联领导人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及判断和采取的对策及政策；其二，边缘地区民族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动员和发动作用；最后，“帝国的负担”成为难以承受的现实负担。

【关键词】帝国 非殖民化 苏联解体

【中图分类号】K512.5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6-0003-(12)

帝国作为一种不平等的统治和治理体系制度，在20世纪中叶前后退出历史舞台。帝国这个名头也由19世纪时遭列强追捧，沦落到受世人唾弃。随之而来的便是学界对帝国研究热度的下降，正如列文(Dominic Lieven)所言：“在20世纪下半期，‘帝国’概念从当代政治辩论中销声匿迹，成了历史学家的私产。”^①然而，苏联的解体以及全球化大潮的汹涌而至，帝国研究再次成为热门的研究话题。在其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苏联由一个反帝国家逐渐演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按照帝国兴衰规律，苏联的帝国属性注定了发生非殖民化的不可避免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苏联解体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

* 潘兴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

①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2.

二十年前，苏联解体及苏东体系的瓦解，标志着欧洲地区冷战的结束，成为 20 世纪最重大的里程碑式事件之一。从此，欧亚的政治版图发生巨大改变，转型成为这个地区国家的共同进程。在这场大变动中，苏联的解体无疑占据着中心位置，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学界已有多种解释，大致上可以归纳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从帝国研究角度探讨苏联解体问题，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等人已提出了卓有见地的看法，但对于苏联的属性以及与其解体的关联性问题，仍然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所谓帝国，我们认为是指一个国家通过侵略扩张，强制性地征服和统治其他国家和民族，建立起宗主国对各种附属地的统治和治理体系的政治实体。宗主国（民族）在帝国内部占有核心地位，附属地（民族）则处于边缘地位，帝国内部形成核心—边缘关系和架构。宗主国与附属地之间、宗主国民族与附属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强制性和不平等性构成了帝国内部核心—边缘关系的基本特性。多伊尔(Michael Doyle)强调政治控制和主权问题，认为“帝国是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国家对另一个政治社会行使政治控制，即行使有效的主权。这种控制可以通过武力、政治权谋或经济、社会、文化依附关系来实现。”^①列文将帝国定义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其核心与边缘地带在种族及民族构成、历史、宗教、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②赫斯基的定义与列文相似，认为帝国是“一个实行大一统统治的国家，拥有广阔的领土和众多的民族。”^③

苏联的前身——俄罗斯帝国是个典型的帝国，这应当不存在任何疑问。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英国拥有一个帝国，俄国就是一个帝国，这凸显了俄国更为深刻的帝国属性。1917 年以前，俄罗斯帝国的统治和扩张已经经历了许多个世纪。由版图狭小的基辅罗斯起家，莫斯科公国不断扩张和壮大，终于在沙皇伊凡四世时期形成了俄罗斯帝国的雏形。与欧洲其他大部分帝国相比，俄罗斯帝国具有自身的特性。首先，俄罗斯帝国是陆上帝国(overland empire)，葡、西、英、法、荷、德等帝国均为海上帝国(overseas empire)。^④其次，俄罗斯帝国的扩张与民族国家的建设同步进

① Michael Doyle, *Empir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5.

② Dominic Lieve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Soviet Union as Imperial Politic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 no. 4, October 1995, p. 608.

③ F. Hirsch, “Toward and Empire of Nations: Border Mak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Soviet National Identities”, *The Russian Review*, vol. 59, April 2000, pp. 201-226.

④ 欧洲同属陆上帝国的还有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

行，那些海上帝国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再次，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和治理基本上呈单一性特征，均为通过武力征服占取土地和人口，实行直接统治，将其纳入本国的版图，由欧洲主体部分不断向四周各个方向扩张，最终形成版图最大的陆上帝国。海上帝国的扩张和治理则呈多样性，大英帝国的扩张手段除武力征服之外，还包括列强之间的战争及分赃、商业公司的商业活动以及与当地首领做交易等等，统治面积虽然很大，曾冠以“日不落帝国”之称，但帝国属地分布于各大洲，难以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国家。在治理方面，英帝国分为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两种主要形式，其殖民地又分为移民型、非移民型和二元性三种类型。最后，俄帝国的社会发展落后，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突破的第一个国家。

像俄罗斯帝国这样的陆上帝国，在欧洲历史上还有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与海上帝国相比，陆上帝国的整合程度更高，居民流动、物资往来和文化交流都较为便捷，在更高程度的一体化经济和社会文化融合的基础上，核心—边缘关系尽管存在，但更容易趋向于模糊化。不过，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不平等关系引发的冲突和斗争，阻碍了国家和文化认同的形成。这样，海上帝国的边缘地区民族主义运动足以导致非殖民化的情况很难在陆上帝国出现。同时也意味着只要帝国的架构未遭受外力摧毁，边缘地区就很难脱离核心。另一方面，陆上帝国抵御大规模战争打击的能力似乎较低，一旦在战争中失利，整个帝国可能就会立即崩溃，不如海上帝国由于核心与边缘分离，有一定的回旋和缓冲余地。因此，在一战中倒下的四大帝国中有三个是陆上帝国：俄罗斯、奥匈和奥斯曼帝国。另一个是德意志帝国，其情况与典型的海上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也不尽相同。虽然德国拥有一些海外殖民地，但也有较大规模的陆上兼并和扩张，应当属于混合型帝国。

二

苏联的建立与演进，似乎都与“帝国”有复杂的关联。普京就曾在2000年3月指出，那种将俄罗斯联邦视为前苏联遗存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新俄国“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具有自信和远大前程的强国”。^①就学理探究而言，要判断苏联是否具有帝国性质，首先要考察其内部结构，然后再考察其对外关系的行为方式和准则。苏联的内部结构确实呈现出核心—边缘架构，以俄罗斯文化和语言为基础的俄

^① Interview with Putin in *Bratislava Narodna Obroda*, March 7, 2000, in *FBIS*, March 8, 2000. Cited in Mark R. Beissinger, “Rethinking Empire in the Wake of Soviet Collapse”, in Zoltan Barany and Robert Moser, eds., *Ethnic Politics and Post-Communism: Theories and Practi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7-38.

罗斯民族和制度，在国内其他文化的辅助和参与下，形成了一个以苏联统治体系为核心的制度体系。这个核心通过莫斯科的统治中枢对边缘地区“行使政治控制”。另一方面，俄罗斯民族文化虽然处于核心地位，但俄罗斯人在苏联并没有任何特权，因此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并不认同苏联体制，而正是俄罗斯脱离联盟的行动给了苏联最后的打击，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一点与英、法、西、葡等帝国的终结过程完全不同。这种强制性和不平等的核心—边缘架构，有别于一般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的正常关系。当然，苏联在成立之初不是帝国，还曾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

苏联成立后坚持反帝立场，宣布要建立一个各民族自由平等的新国家，为此设计并建立了加盟共和国制度，甚至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苏联。在1919年举行的俄共（布）第八次党代会上，列宁表示要与沙俄帝国主义彻底划清界限，承认国内各民族的地位。“沙皇和资产阶级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对大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在先前加入俄罗斯帝国的各民族的劳动群众中正在迅速消失，正在随着对苏维埃俄国的了解而消失，但这种不信任并不是在所有民族和所有劳动阶层中都已完全消失。因此，必须特别慎重地对待民族感情，认真地实行各民族的真正的平等和分离的自由，以便消除这种不信任的基础，而使各民族的苏维埃共和国结成一个自愿的最紧密的联盟。”^①

在这里，布尔什维克并不是要肯定和弘扬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恰恰相反，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将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大团结中走向衰落和灭亡。列宁宣布，明确新的国家制度是为了在未来消灭国家作准备，称苏维埃国家是“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的新型国家”，^②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平等的国与国关系，为其他国家的联合树立典范。当时，反对帝国主义既是苏联对内关系的指导方针，也是对外关系的根本原则。而且，俄罗斯人在苏联并不享有任何政治经济特权或特别待遇。

可以看出，苏联在建立之初力图全面消除帝国残余，着手主权国家建设，承认和落实民族自决原则。在19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政府曾推行名为“本地化”（“korenizatsiia, indigenization”）的民族政策，鼓励加盟共和国实行文化自治，在政府机构和教育系统中使用当地民族语言，为尚无文字的民族语言创立文字，将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称为“俄罗斯沙文主义”。以乌克兰为例，乌克兰语成为本地学校的教学语言，连俄罗斯人也必须进入当地的乌克兰语言学校学习。在中亚，莫斯科取消了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布哈拉（Bukhara）和希瓦（Khiva）之间原有的模

① 列宁：“俄共（布）纲领草案”，《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卷，第86页。

② 同上，第82页。

糊边界，重新以部族及家族为基础，给予它们以民族的法律地位。以此为基础划定新的边界，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如在哈萨克人聚居的地区，苏联成立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Kirgiz Autonomous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1925年更名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Kazakh Autonomous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后在1936年升格为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通过这些政策措施，莫斯科希望将当地落后的部族变为先进的苏维埃民族大家庭中的新成员。

苏联全面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和人口，所宣布的要放弃沙俄侵略所获土地和废除强加给他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承诺未能兑现。此时推行本地化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打击和清除那些反苏维埃的俄罗斯反动势力。如在支持罗曼诺夫王朝的白军阵营中，顿河和库班哥萨克人基本上都是逃亡的俄罗斯农奴的后代。政府解除这些尚武的哥萨克人武装，后来还将他们强制迁移到哈萨克和西伯利亚。苏联在后来的发展进程中，放弃了本地化政策，重新实行俄罗斯化。1938年，苏联政府规定所有学校都必须使用俄语教学，解散那些实施本地化政策的政府机构，撤销一些民族主义抬头的自治共和国和地区，将其人口整体强迁到边远地区。二战中，俄罗斯民族主义成为抗击纳粹德国侵略的有力武器，“为了俄罗斯母亲”的口号家喻户晓。

从30年代开始，苏联政府向俄罗斯以外的加盟共和国大规模移民，继续对外拓展疆土，将核心以外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置于依附地位，并将中东欧国家等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逐步演变成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

以苏联统治中枢莫斯科及俄罗斯为核心，向外形成了三层边缘地带，其中第一层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第二层是中东欧华约成员国，第三层是在亚洲和美洲的经互会成员国。与典型的帝国结构相类似，这种帝国结构体系呈轮轴辐射状，核心对边缘具有支配权，边缘对核心存在着依附性。在苏联内部治理方面，按照列文的看法：莫斯科与边缘地区的经济关系“完全符合‘殖民’一词的所有负面涵义”。^①

曼兹(B.Manzt)指出了经济依附关系的五个方面：第一，莫斯科通过中央计划系统管理边缘地区，带有强制性，对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结构造成了长期性的损害；第二，苏联政府各部负责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加盟共和国当局被排除在外；第三，经济专门化使得边缘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的农业等部门受到人为扭曲，产生依赖性；第四，各加盟共和国只与莫斯科建立工作关系，听从莫斯科的指令，相互之间的联系也要通过莫斯科来进行；第五，莫斯科通过价格和补贴政策扭曲市场，实现控制。^② 这样，在苏联存在的末期，那些推崇民族自决的加盟共和国将苏联视为俄

① Dominic Leive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Soviet Union as Imperial Polit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 no. 4, October 1995, p. 619.

② B.Manzt, *Central As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罗斯的帝国；而在俄罗斯本身，苏联被视为一个过度中央集权化的莫斯科的帝国。^①

在这种核心—边缘关系框架中，非俄罗斯精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值得注意。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精英参与苏联国家事务的基本条件是需要掌握俄语，能够将苏联利益置于地方利益之上，为苏联国家利益服务。苏联通过教育、奖励和惩罚制度，将各地最为出色的精英汇聚到国家的各级党政系统之中。同时，对于那些不愿意以这种方式行事的精英，则予以严厉的打击和惩罚。

苏联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同样具备这种核心—边缘的特性。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提出的“有限主权论”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应受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利益的限制，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主权，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则是有限的。因此苏联阵营中的其他国家不享有完全主权，苏联有权对它们实行干预，包括武装干涉。^②具体表现为：第一，中东欧国家的国内政策需得到莫斯科的首肯才能出台，内政决策空间有限；第二，中东欧国家的对外政策更是控制在苏联手，不得擅自与阵营以外国家打交道；第三，中东欧国家重要的人事决定需要得到莫斯科的批准，对苏联控制表示不同意见者受到撤换或其他惩治；第四，中东欧国家的政府是在苏联的扶持或干预下建立的，更多的是反映苏联的选择和意志。^③在这里，苏联的霸权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得以建立和维持。中东欧国家实际上处于附属国的地位，亚洲的经互会国家的情况与之相类似，但有程度上的差异。

除此之外，苏联还对邻国进行军事干预和入侵，阿富汗战争就是典型的例证。1979年9月，左翼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总统塔拉基（Taraki）在内战中被杀，继任的总统阿明（Amin）不听苏联的指令。于是，为了在南方邻国扶植一个友好的政府和向南方的温水港口以及波斯湾油气产地挺进，苏联在同年12月25日派兵入侵阿富汗。苏军迅速攻占喀布尔和其他重要城市，并在12月27日处死阿明，将亲苏的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扶上总统宝座。苏联的入侵很快受到阿富汗武装力量——圣战者（mujahideen, Muslim holy warriors）的坚决抵抗，游击战很快蔓延到阿富汗各地。圣战者武装得到了美国和伊朗、沙特等国的财政和军火支持。苏军付出伤亡数万人的代价仍然无法打败圣战者游击队武装。苏军最终被迫与美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签署停止干预阿富汗事务的协议，于1989年2月全部撤出仍然陷于内战之中的阿富汗。这场不得人心的对外侵略战争，连苏

① Reza Zia-Ebrahimi, "Empire, Nationalitie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http://www.sras.org/empire_nationalities_and_the_collapse_of_the_ussr.

② See: Robert A. Jones, *The Soviet Concept Of 'Limited Sovereignty'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The Brezhnev Doctrine*, St. Martin's, 1990.

③ V. Bunce,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The Evolution of the Eastern Bloc from a Soviet Asset to a Soviet Lia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9, no. 1, Winter 1985, pp. 1-46.

联领导人也觉得底气不足，难有取胜的机会。1982 年接替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曾表示：“（阿富汗）经济落后，伊斯兰教独大，而且几乎所有乡村人口都是文盲。这不是革命形势。”^①根据罗维尼(Rafael Reuveny)和普拉卡什(Aseem Prakash)的观点，阿富汗战争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三大原因之一（另外两个是制度原因和领导人原因）。其具体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认知影响。通过战争，苏联领导层改变了苏军有能力平息国内分离主义势力和干预其他国家的原有认识；二是军事影响。苏军的声望和士气受到打击，党对军队的信任发生动摇，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势力因苏军的削弱而受到鼓舞；三是合法性影响。苏联当局派遣来自中亚加盟共和国的军人到阿富汗作战的做法，引发了这些地区的反战示威活动，损害了苏联制度的合法性；四是参与影响。战争酿成了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参战老兵形成了新的市民团体，削弱了莫斯科的政治控制。而且新闻报道也产生了一次“公开性”。^②在总体上，阿富汗战争使已经羸弱的苏联国力遭到进一步削弱，苏联的国际声望受到严重损害。在国际社会严厉谴责其侵略行径的背景下，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亦遭到许多国家的抵制，惨淡收场。

三

历史上帝国的演进和发展大致上都经历了兴—盛—衰—亡的周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近代以来帝国的终结，在二战前是由于战争和革命，而在二战后则是由于非殖民化。苏联解体实际上是“帝国终结”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次迟来的非殖民化。由于苏联与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有形帝国不同，因此其非殖民化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在一般意义上，对于传统帝国而言，非殖民化从广义上说，泛指由殖民地、保护国、委任统治地过渡到独立国家的历史事件；从狭义上讲，则指二战后在民族独立运动的压力下，殖民国家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被迫改变政策，从而使得殖民地和其他附属地获得独立，导致殖民帝国时代终结的历史进程。^③对于苏联而言，这场非殖民化运动是由苏联领导层主动作出政策改变为先导，在中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得以兴起之际，苏联国内加盟共和国开始出现独立倾向，进而作为核心部分的俄罗斯决定脱离联盟，造成联盟体制的迅速解体。基本上是一个由自上而下过渡到以下抗上，最后由核心脱离联盟的行动完成最后一击的演变过程。

① Francis Phillips,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http://www.mercatornet.com/articles/view/the_fall_of_the_soviet_empire.

② Rafael Reuveny and Aseem Prakash, “The Afghanistan war and the breakdown of the Soviet Un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9, 25, p. 693.

③ 潘兴明：“试析非殖民化理论”，《史学理论》，2004 年第 3 期。

由于苏联本身是一个主权国家，中央集权程度很高，各加盟共和国领土相连，通过先后数次俄罗斯化，加上两千余万分布在俄罗斯以外的俄罗斯居民，所以直到80年代末，苏联国内并没有像英帝国在二战后那样受到强大的非殖民化压力。就这场非殖民化的原因而言，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苏联领导人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及判断和采取的对策及政策显得至关重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公开性政策使苏联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和国内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看到了苏联与中东欧国家不平等关系的消极方面，指出中东欧国家“对苏联的市场和技术产生了依赖，和世界经济失去了联系。因此，这些国家渐渐变得落后起来。可是想挣脱超级大国‘善意拥抱’的企图受到了坚决的制止。”所以，

既然我们在自己国内决定改革和民主化的方针，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个方针推广到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上。不光是在口头上，而且是在实际行动上，要承认他们的自决权。承认他们有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不再利用盟国的关系把自己的思想方式、自己的模式、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①

因此，戈尔巴乔夫在对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中提出“新思维”政策原则：中东欧国家有选择的自由，苏联不会干涉它们的内政。此时，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中东欧国家“每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强烈意愿。人们希望摆脱自己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和军队。他们不愿意忍受‘老大哥’的肆意妄为，不愿意看克里姆林宫一个个主子的脸色行事。”于是，他决定“还‘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自由’”，^②明确宣布驻扎在这些国家的苏联军队不会干预当地人民的行动。显然，“苏联已经失去了掌控一个帝国的意愿。”^③当中东欧国家发生巨变，共产党纷纷失去政权时，苏军果然按兵不动，后来又撤回本国。这场兴起于中东欧国家的非殖民化风暴很快波及了苏联国内。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加盟共和国首先宣布独立，其他加盟共和国纷纷响应，结果只过了一年多时间，苏联便成为了历史。

其二，边缘地区民族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动员和发动作用。我们知道，非殖民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殖民地的民族主义。20世纪以来，帝国终结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帝国边缘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壮大。这种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是现代帝国的掘墓人，直接导致了众多民族国家的诞生。苏联边缘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其他陆上

① 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5页。

② 同上，第316-317页。

③ Victor Sebestyen, *Revolution 1989: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in Francis Phillips,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http://www.mercatornet.com/articles/view/the_fall_of_the_soviet_empire.

帝国有相似之处。

苏联一方面强调国家的“苏维埃”共性，一方面又保护各民族的个性，因此，莫斯科的民族政策失误使得苏联并没有成为一个民族大熔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培育和造就了各地方的民族主义。而波罗的海地区加盟共和国更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离心倾向。与英法西葡帝国内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来自于核心地区的扩散不同，苏联欧洲部分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并不比俄罗斯落后，它们自身的民族主义意识和要求并没有消失，只是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暂时蛰伏起来。中亚地区原先的民族意识并不清晰，而政府的政策反而唤醒和培育了当地的民族意识，听任民族主义坐大变强。高加索的民族主义较为强烈，受到长期的压制，但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样，一旦莫斯科的控制出现松动，这种被压制很久的民族主义就会以不同的形式强烈地迸发出来。

于是，民族主义抗议行动在高加索地区爆发。1989年初，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通过立法，将格鲁吉亚语定为官方语言。同年4月9日，第比利斯发生民众示威，要求维护格鲁吉亚的统一，反对阿布哈兹的分裂主张，要求格鲁吉亚脱离苏联，建立独立的格鲁吉亚。苏联安全部队的强制打压造成了更大的反弹，加剧了苏联体制的合法性危机。1990年11月，格鲁吉亚进行最高苏维埃选举，首次允许各政党参加竞选，结果圆桌一自由格鲁吉亚联合阵线(Round Table-Free Georgia coalition)赢得选举胜利，联合阵线领导人加姆萨胡尔季阿(Zviad Gamsakhurdia)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导致当地苏共领导体制的瓦解。1991年4月，格鲁吉亚宣布独立，脱离苏联。

80年代后半期，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都成立了民族主义组织，发动了多次抗议行动，其共同要求是要求恢复三国因苏联在二战期间的兼并而失去的独立。如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在1988年10月发布的纲领中就宣布：“本阵线的行动基础是：拉脱维亚人是本共和国的土著民族，拉脱维亚在历史上是拉脱维亚人的疆域。地球上只有在这个地方，拉脱维亚民族、拉脱维亚语言和拉脱维亚文化才能得到保持和发展。”^①1989年8月，多达200万名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爱沙尼亚人参加“波罗的海之路”的联合行动，人们手拉手形成数百里长的人链连接三座都城，表示对三国独立的强烈支持。1990年3-5月间，三国自行宣布独立的行动拉开了苏联解体的大幕。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脱离苏联的决定是对联盟的致命一击。列文认为：“在重建本民族历史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者将苏联的做法视为根本的、真正的和

^① “National Front Publishes Program”,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USSR*, December 6, 1988, p. 88.

发自内心的民族抱负的敌人”。^①

而在苏联以外，中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支重要力量。战后中东欧国家的政权多是在苏联的影响和扶持下建立的，其内政外交受到苏联的全面控制，本国领土上驻扎着苏联军队。莫斯科宣扬的“有限主权论”和武力干预行动造成了相互关系的紧张和当地民众的不满。戈尔巴乔夫一开始推行对中东欧国家的“新政”，即“承认他们的自决权，承认他们有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东欧各国的民族民主力量便马上积极活动起来。”^②于是，波兰开始掀起“团结工会”运动，于1989年6月举行自由选举；匈牙利人拆除与奥地利边界的铁丝网；大批东德人开车经匈牙利前往西方，然后就是柏林墙的倒塌。这场巨变在波兰用了十年时间，在匈牙利用了十个月时间，在东德用了十个星期的时间，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只用了十天。边缘地区的巨变首先波及苏联国内的边缘地区，再影响到核心地区，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最后，“帝国的负担”成为难以承受的现实负担。研究非殖民化理论的世界经济流派认为，霸权与经济增长的出现呈一定的周期性，核心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的内部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当一个国家掌握霸权时，经济的超常规发展、技术革新的巨大压力以及国家干预都造成了资本的高度集中。但是，由于先进技术的扩散和维持霸权体系的巨额费用，霸权国家在竞争中的优势会逐渐消失，最终导致它的衰落。这一观点得到了研究军事霸权的学者的赞同。他们认为，维持霸权国家势力范围的任务和负担是产生这种周期性的根本原因。到80年代，苏联政府觉得维持华约的代价已经远远超过所获得的收益。在冷战中，苏联及华约成员国为维持与北约的军备竞赛和力量平衡，实行军工优先的准战时经济政策，所投入的财力和人力的平均水平超过美国及北约成员国，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国军控与裁军署的统计资料清楚地显示出苏联在军费支出方面的沉重负担（请见下表）。

莫斯科也感到无力承担对中亚等加盟共和国的财政补贴和拨款。有时一些加盟共和国获得的年度补贴额相当于其年度总产值。以塔吉克斯坦为例，该加盟共和国所获补贴占其年度财政收入的47%。^③这与英帝国和法帝国在帝国末期的经历十分相似。而当时的世界市场能源价格的下降更是减少了苏联的油气出口收入，因而庞大的军备竞赛开支更是难以为继。

①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John Murray, 2000, pp. 139-140.

② 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15页。

③ Ollapally and Cooley,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2(4), 1996.

表 1：军费支出比例与军民比例情况表

国家、地区和组织	军费占 GDP%	军人占每千人口
北约	5.4	9.5
美国	6.6	9.6
其余成员国	3.6	9.5
华约	10.7	15.2
苏联	12.5	16.1
其余成员国	5.8	12.7
非洲	4.3	3.1
东亚	2.9	5.1
拉丁美洲	1.8	4.5
中东	15.6	16.0
大洋洲	2.8	3.9
南亚	4.1	2.3
世界平均	6.1	6.0

资料来源：U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Arms Transfers*, 1987, Figure 12, p. 12.

四

非殖民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但是否会像其他帝国的经历一样，意味着俄罗斯帝国梦的彻底终结？从俄罗斯的现实情况来看，当初导致非殖民化的三大因素已发生很大变化和逆转。首先，领导层大力推动和强化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前苏联国家的一体化进程，由经济、安全合作向政治方面的整合扩展。其次，民族主义依然有强大的作用，但阻碍作用已遭到削弱。那些民族主义诉求最强烈的地区，如波罗的海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已经置身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外，不再具有体制内的破坏力。第三，俄罗斯的经济有了很大起色，国力开始恢复和增强。俄罗斯新近推出了2011-2020年装备计划就清楚地表明了重建军事大国的明确意向和坚定决心。

因此，俄罗斯的情况有别于其他帝国，因为“帝国情结”和“帝国综合征”一直是俄罗斯挥之不去的梦想与现实。普京最近提出的“欧亚联盟”构想，就是“帝国”要素在对俄有关后苏联空间政策发生作用的突出反映。俄罗斯并未放弃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力的努力，传统的维护其势力范围的意志依然十分坚定。

【Abstract】 Bo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seem to have a complex relationship with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its predecessor, is typically land-bas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Soviet Union, it had adhered to anti-imperialist stance and then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social imperialist” country. The symbol is that a core-periphery structural empire system had been formed and a three-tier periphery had been shaped outward with Moscow, centr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as its cor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s actually an integral part of “empires’ empire” history and a belated decolonization as well. In this respect, there are at least the following three specific reasons: first, Soviet leaders’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nd policies; second, border regions’ nationalism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obilizing; finally, “empire’s burden” has become an unbearable one in reality.

【Key Words】 Empire, Non-colonization,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Аннотация】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СССР имеет слож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империей».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являлась типичной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ой империей. После сво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идерживался анти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позиций, но затем превратился 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державу. Показателем этого являетс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ядра — периферийной имперской архитектуры,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власть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принадлежала Москве, и от этого центра была сформирована трехуровневая периферийная зона. Развал СССР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является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истории «конца империи», запоздалой деколонизацией. Этому,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есть три конкретные причины: во-первых, понимание и оценка советскими лидерами тогдашней ситуации, а также принимаемые ими меры и проводимая политика; во-вторых,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периферийных областей сыграл важную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ую роль; в-третьих, «бремя империи» превратилось в непосильное бремя реальност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мперия, деколонизация, развал СССР

(责任编辑 黄翔)

苏联解体与文明进程—— 马克斯·韦伯“俄国革命论”的视点*

李永晶**

【内容提要】自苏联在1991年末解体以来，学者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肇因进行了多种分析。这些分析中，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析占据了显要的位置。然而，这些分析陷入了同义反复的逻辑错误。与此相对，各种基于事实的分析，往往停留在一种事后的描述上，未能提供有效的说明。那么，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苏联解体意味着什么？马克斯·韦伯在其“俄国革命论”中提供了一个卓越的视角。

【关键词】韦伯 官僚制 理性化

【中图分类号】K512.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6-0015-(14)

一、问题：何谓“苏联解体”？

从多种意义上来说，苏联在1991年12月的解体堪称20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事件之一，而且这种影响还将持续下去。苏联解体二十年以来，关于解体原因，包括学者的分析、记者的报道、当事者的回忆与证言等在内，相关文献可谓汗牛充栋。鉴于这一历史事件对世界秩序、对人类文明进程所具有的深刻影响，可以预见，各国学者们仍将持续对其进行探索和解析。那么，这里所说的苏联解体的“影响”究竟何指？这种对影响及意义的探寻，将我们的注意导引向一个被视为自明的、因而未得到解释的前提性问题：什么是“苏联解体”。我们将发现，对“苏联解体”事件自身的认识决定着我们对其影响及意义的表述。

事实上，“苏联解体”是一个极其暧昧的说法。如果我们有意注意到这个说法的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编号：08JJDGJW260）的阶段性成果。

** 李永晶，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全称，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的“苏联解体”乃是一种复合现象，它具有相对容易观察的多重结构——仅就“苏联”全称的字面意义而言，我们可以从“联盟的解体”的角度思考，亦可从“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解体”的角度展开分析；同样，我们还可以将焦点对准“苏维埃”及作为其核心的“苏共”这个组织。此外，“解体”含义也并不明确：这是一种“自然解体”现象，还是一种“被解体”的结果？与前者强调的自然过程相比，后者意味着苏联这一组织形态尚未耗尽其继续存续的动力，甚至还意味着有其他的可能。由于多数论者没有注意到“苏联解体”这一现象与意义的多重结构，相应的各种论述也就未达到一定程度的明晰，如果不说是混乱的话。

在形形色色的分析与解释中，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占有显要的位置——诸如“资本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的破产”、“邪恶帝国的崩溃”之类的说法充斥着人们的耳目。然而，这与其说是解释，莫若说是对既定事实的同义反复：这些说法仅仅是对“苏联解体”这一整体现象的另一种表达，因而只是一种循环解释。与这种论述相对，从某种具体事实的角度的分析也很常见。比如，苏联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精英主导”、“民族主义”、“民主化改革”等具体内容得到了关注。诚然，这些角度的分析将曾经犹如暗箱的苏联体制的方方面面展示给了世人，但它们还不足以说明苏联解体的本质。事实上，“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等在历史上曾被认为是导致苏联强大的要因。事后解释虽然更容易得到理解，却不得不免事后聪明的嫌疑。

因此，这些基于后见之明的解释有时被尖刻地讥讽为“预测过去”。这是一种严厉的批评。正因为如此，论者就有义务为自己的解释的有效性进行辨明——从普遍的原理上、而非已经发生的个别事实上对苏联解体进行说明。

这里我们还有必要注意一种特别形态的论述：苏联解体时而被视为“悲剧”，时而被视为“警钟”。这些论述的特别之处在于，意识形态的因素得到了有意的弱化、甚至掩饰，“苏联”被视为一个中性的国家实体与统治机制；仅仅在与自身的利益——比如说多民族国家的统合——相关的联系上，“苏联”才被视为具有正面价值的一种机制与符号。不过，这种中立的解释依然有着隐性的意识形态前提：如果作为统治技术的“苏联”的“中性”是成问题的，那么无论持“悲剧”论还是“警钟”论，都无益于我们对真相的探究，因而也无益于国家与社会的真正福祉，因为这种论述依然无法客观地审视“苏联解体”的真正经验与教训。

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概括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批评，而是首先意味着我们要将分析更推进一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对事实的零散观察与描述构不成真正的分析，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无论是来自左翼还是右翼——先行的解释，将导致客观事实的严重变形，甚至取代事实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意识

形态角度的解释自身就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事实，尽管这种事实不再与我们试图探讨的对象自身有关。在探寻苏联解体的本质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会成为我们认识的首要障碍，我们需要科学的视角。

事实上，社会科学的分析正意味着，各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论争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克服。在社会科学的视角下，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林林总总的观念，仅仅作为构成多元的社会事实的一种要素而存在，而非我们进行认识与理解的前提。那么，这种社会科学的、悬置了意识形态的分析，在何种程度上能更接近“苏联解体”的本质解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进行具体研究之前，我们显然无法得出更明确的回答。不过，本文将从社会科学的一个特定角度，通过举例来说明社会科学分析的有效性。无需赘言，这种说明仅仅意味着我们刚刚开始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分析，而绝非意味着结束。

二、韦伯的“俄国革命论”：预言未来

不同于迄今的论述，我们将目光首先投向苏联于 1922 年 12 月成立前后及其发展的历史中。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2）的“俄国革命论”，成为一个恰当的视点。韦伯自 1905-1906 年间发表关于俄国革命的所谓“编年体”历史叙述以来，一直关注俄国革命的动向。1917 年 2 月到 10 月发生的革命，则为他的俄国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新素材。虽然韦伯极其罕见地谦称其文是“编年体”的历史叙述，甚至是“新闻报道”，然而由于文章中所展示的关于俄国革命本质的洞见，他的文章成为同时代人中相当重要的俄国研究。事实上，1906 年第二篇论文《俄国向伪立宪主义的转变》发表后，俄国学者随即进行了翻译，并在俄国出版。这篇论文获得了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而职业革命家，例如列宁本人，则对其公开表示不屑与反对。与这些历史事实相比，我们将看到，韦伯俄国革命论的意义更是在当下。

从内容上看，韦伯的第一篇题为《论俄国的立宪民主形势》的论文，是针对解放同盟于 1905 年以俄文和法文刊行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的评论，文章的重点是介绍自由主义运动一侧的动向。第二篇论文《俄国向伪立宪主义的转变》，则主要是针对沙皇政府的伪善进行的揭发。正是在这篇论文中，韦伯展示了基于两个普遍主义视角的分析：一方面，俄国的政治现代化半途而废，另一方面，沙皇的官僚专制体系顺利运行。在本节以及下一节中，我们将分析这两个相互联系的视角的有效性及其普遍性。

今天看来，首先让人惊讶的是韦伯在文中进行的极其谨慎的“预言”——由于

它们构成了不折不扣的“未来预测”，那么重新审视韦伯的这些论述，我们就能获得关于俄国革命、尤其是关于革命后苏俄社会问题的有效视角，因为韦伯的“预言”恰恰是后来的现实。更重要的是，这种视角将给我们提供一种关于“苏联解体”的社会科学的解释——这种解释因其不再是事后解释，因而更显示出真正的社会科学分析可能具有的科学与洞察力。

韦伯在上面提到的第二篇论文的结尾写道：“无论在最近的未来将发生多么严重的倒退，俄国仍然会不可改变地对接到特定的欧洲发展轨道上来。”^①这就是说，俄国可以选择走自己的路，但它最终还是要回到欧洲、亦即西欧发展的道路上。韦伯在这里没有、或不愿挑明的是，“欧洲发展的道路”正意味着一种普遍性的道路。在这种发展道路上，俄国不可能持久地脱轨。对这种结论的“引而不发”，表明了韦伯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审慎——他对俄国自己的“选择”有所保留。这一点我们也将在下文阐述。

同样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上述“预言”是在与美国形势的对比中作出的，因为他再次看到了社会发展的收敛趋势。韦伯指出：“两者都不可避免地没有‘历史’的羁绊，另外，它们的地理疆域那种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大陆’特性也在发挥同样的作用。”由于这两种独特的要素，“世界将大大依赖它们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大概的确是‘从头开始’建设‘自由’文化的‘最后’机会了。”^②这里我们要注意的，韦伯在这里保留的“最后机会”究竟意味着什么？美俄两国资本主义经济建设具有共性，这或许会对“欧洲发展的道路”作出最后的审判——审判其道路是特殊西欧的，还是普遍人类的。这里我们还要注意的是，韦伯并非简单地期待俄国的道路会成为一种所谓的“超越现代”的模式。^③韦伯的论述仅仅体现了他的谨慎：在现代化这一不可逆的社会历史面前，俄国知识分子这一独特的群体，这一群不顾惜个人利益、以人民乃至人类为思想出发点的知识分子，究竟能怎样改变现代化的道路与面貌。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暂且转向1918年韦伯对一群奥地利军官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时值著名的“十月革命”后半年有余，韦伯全面跟踪了俄国发生的最新事件。这种全新的状况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他在1906年作出的不乏乐观情绪的预言？

针对这次俄国发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验，韦伯指出了两种态度：“在中产阶

①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②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59页。

③ 在所谓的“后现代性”理论中，韦伯被视为一位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理论家。这种观点夸大了韦伯对近代以降世界观与社会生活合理化弊端的批评。

级社会里享有既得利益的人……会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让他们做完这场实验吧，它必定会失败，然后可以用它作为一个警示。’”但是，“我们会说，‘如果这场实验获得成功，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基础上的文明也是可能的，然后我们也许会改宗。’”^①要注意的是，对韦伯的审慎表述不能做过大的解释，因为他已经从一个普遍的角度对俄国革命的本质及其困难进行了分析。这个角度就是政治社会学，这是韦伯观察近代政治的一个技术性的视角，其中“官僚制”居于核心位置。官僚制之所以成为中立的、普遍的角度，就在于它内在于近代以降合理化过程自身。^②

事实上，官僚制视角贯穿于韦伯对俄国革命的全部观察。韦伯注意到，俄国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警察国家与官僚国家统治形态逐渐形成。在这一视角下，从1905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立宪诏书到1906年7月6日议会解散，该过程正标志着“现代化官僚制的集权统治的明确建立”，意味着官僚制的最终完成，并最终取代了沙皇专制。^③然而，这种取代沙皇专制的更为隐蔽的专制，成为俄国此后、直至苏联末期难以去除的毒瘤——专制获得了合法的外套，而欺瞒得到了掩饰。

作为首位阐述近代官僚制的学者，韦伯对这种欺瞒洞若观火，因而他明晰地剖析道：“就我们所能预见的东西来看，俄国当前的独裁制，也就是中央集权的警察官僚制，除自掘坟墓之外，已经无路可走。独裁制出于它的自我持存的利益，指望一种开明专制，其实所谓的开明专制纯属于虚乌有，还有，为了保持威望，独裁政府必须与那些经济势力交好，在俄国的条件下，这些经济势力承担着不可阻挡的‘启蒙’和解体的重任。……如果独裁政府不重创自身，就不能解决任何一个重大社会问题。”^④今天看来，这实质上构成了他对1917年俄国革命的预言：以沙皇及其大臣会议为核心的官僚专制，走到了末路。不过，这仅仅是开始，因为革命后的俄国并未解决内在于官僚制的问题。

到了1918年俄国革命形势逐渐明朗后，韦伯再次从官僚制的角度对俄国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分析。韦伯指出，社会主义在原理上意味着经济生产的社会化，这就意味着“带薪经理们的股份公司正在取代各个企业家，属于国家、自治市和单一目的联合体的工商企业正在兴起，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奠基于单个（或者实际上是任何）私人经营者的风险和利润。”然而，“这种社会化一方面意味着官员和受过商业或技术专业训练的职员增多，另一方面则是食利者数量的增多……这等于是公开承认

①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240页。

② 韦伯对官僚制正反两面的评价，及其对于当下的意义，请参见拙文：“走向共识：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与‘政治成熟’论”，《大观》（第6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9月。

③ 韦伯：《论俄国革命》，潘建雷、何雯雯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201页。

④ 韦伯：《论俄国革命》，第128页；另参见《韦伯政治著作选》，第60页。

企业以及单一目的联合体是完全排他性地由官员、而不是由工人统治，在这里，工人要想通过罢工行动达到什么要求，会比私人企业家统治时更为困难。这是官员的专政、而不是工人的专政，就目前来说，谈论工人的专政，无论如何都还为时太早。”^①官员的专政，在韦伯这里是科学分析的结果，而对革命后的俄国而言又仅仅是一个事实。

另一方面，从管理技术的角度来看，“所有现代工厂的管理完全都是基于对生产的计算和知识、对需求和技术培养的知识，所有这些都越来越需要由专家来做。”那么，俄国必然需要的这种专家来自何处？韦伯再次进行了预测：“无论在工会成员本身还是在工团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我都看不到有谁掌握了在和平时期管理生产的技能。俄国正在进行一场大实验。”“那里正在发生的情况是：布尔什维克政府如今已在那些还能开工的工厂……转而实行计件工资制，否则产量就要蒙受损失。”“这些工厂把企业家留下来领导企业，并付给他们非常可观的补助金。……布尔什维克以撤销面包供应卡为要挟，迫使官僚系统也不得不为他们工作。然而，国家机器与国民经济不可能长期以这种方式运转，这场实验目前看来并不那么鼓舞人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官僚制的屈服，与其说是意味着革命的蜕变，毋宁说是在客观技术面前的必然选择。

紧接着上述悲观的预测，韦伯给出了另外的分析：“令人惊讶的仅仅是，这个组织毕竟一直在发挥功能。之所以能够如此，因为那是一种军事独裁统治——而且确凿无疑，它不是将军的独裁，是下士的独裁，还因为从前线返回的厌战士兵和习惯于农业共产主义并渴望土地的农民会师了……”^②军事独裁早早地取代了革命浪漫主义。然而比这种结局更为黯淡的是，一种多重的、因而是致命的官僚制专制应运而生。

至此，韦伯展开了一幅完整的画面：俄国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三个主体，即知识阶层（包括职业革命家）、士兵、农民因各自合理的行动而结合在了一起。^③他们推翻了1905年革命后形成的“中央警察官僚制”，然而，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复合的官僚专制，包括苏共组织、政治警察、技术专家与各级行政官员。如果说韦伯在1906年已经预测了1917年专制制度的解体，那么，韦伯1918年的分析则可视作对1991年苏联解体的预言：“如果独裁政府不重创自身，就不能解决任何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当然，“预言”是这里借用的说法，韦伯进行的仅仅是基于社会科学的分析，

①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234页。

②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239页。

③ 关于俄国革命过程中三者相互作用的简要历史，可参见梁赞诺夫斯基等著《俄罗斯史》（杨烨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36章中的相关叙述。

以及对这种分析结果进行的客观表达。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韦伯观察到，“在城市民众和农民眼中，凡是官僚制禁止的东西，必然是官僚制不想让‘人民’获得的好东西，对此我们无需惊讶。”^①这种对官僚专制的不满乃至敌意，因其源于人们对“好东西”亦即好生活的内在追求而无可消除。然而这种无可回避的事实有着更为深远的政治意义，因为它将我们导向对政治事务进行普遍主义的探究，这也正是韦伯本人的立场。

三、俄国历史的必由路径：官僚制、民主制与人性

上文对韦伯俄国革命论的概括进一步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当韦伯说俄国未来将不可改变地“对接到特定的欧洲发展轨道上来”时，他是否在重复人们耳熟能详的、黑格尔以降德意志观念史中所表述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法则”？第二，韦伯对俄国革命的观察自有其特定的德意志视角，那么这种视角，包括对德意志帝国利益的关注，是否会让他的俄国革命论多少承载了一些意识形态要素与功能？如果我们试图确定韦伯“俄国革命论”的社会科学视点，并进而确定其普遍主义视点的有效性，那么这两个问题就非常突兀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首先，如果韦伯因袭了观念史上的历史的“必然性”，那么他的观察与分析都将是徒劳的。因为这种仿佛如自然界规律一般的“必然性”取消了现实主体的存在与作用，将现实的人或者导向宗教信仰的领域，或者带入意识形态的囚笼之中。结果，这种观念上的“必然性”成了人们无可奈何的宿命。其次，如果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身份与心情成了韦伯观察俄国革命的前提，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批评说，韦伯不过是在近代“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评论而已。由于这两种情形都远离了科学与理智，它们如果是事实，就将颠覆韦伯社会科学可能具有的普遍意义。下面我们将指出，韦伯并未被这两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所束缚。

（一）韦伯观念中的“必然性”问题

在上述两种意识形态中，“必然性”问题最为棘手——俄国必将走上特定的欧洲道路，这是否是对德意志观念论中“必然性”的一种具体表述？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韦伯自始至终都从近代社会组织的机制这个视角分析问题，而非在历史发展阶段论这一历史哲学层面论述问题。如前所述，“官僚制”之所以构成俄国革命前与革命后必然要采取的管理体制，仅仅在于，近代官僚制是西欧近代合理化在技术上的表达。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的技术表达，它并不含有任何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

^① 韦伯：《论俄国革命》，第213页。

性”含义。换言之，作为客观、中立的管理技术，官僚制并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含义。

事实上，官僚制在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过早成熟，正意味着这种理性化的管理技术具有无可替代的力量——在以“自上而下”为本质特征的俄国现代化进程中，居于上位亦即主导地位的阶层必然要借助科学的、有效的管理手段推进社会变革。官僚制正产生于这一社会变革的模式中。因此，如果说官僚制与近代俄国社会有“亲和性”，那么这种说法只意味着理性化力量的胜利。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韦伯的俄国革命论中反复出现的论断乃是，这种官僚制如果不加以控制，就必然导致官僚专制。如果说韦伯愿意使用“必然性”这个说法，那么上述说法就是其对这一术语的全部表达。那么，如何避免这种作为“必然性”的官僚专制的出现？俄国在将来“不可避免地对接到特定的欧洲发展道路上来”，不多不少正意味着，俄国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西欧已然发展的政治技术：立宪主义与议会制，亦即人们常说的民主化。然而在韦伯看来，这种民主化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作为近代社会合理化统治技术的另外一种必然结果。只有通过立宪安排，通过议会尤其是特别委员会的监督，官僚制所代表的行政权力才能得到有效制衡，官僚制的专制才能得到避免。这正是韦伯“俄国革命论”的主旨所在，也是其普遍意义之所在。

因此，对于是否有“俄国道路”的问题，韦伯实质上持否定态度。尤其在被俄国知识分子珍视有加的思想与观念上，韦伯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努力，不时流露出轻蔑的态度：他时而视之为“小孩子的玩意”，时而视之为“就像我们每天的面包一样不值一提。”^①在他看来，俄国知识分子观念上的花样的虚妄，早已被西欧的社会经验所刺破。那么，如何理解韦伯对俄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有可能创造“全新自由”的论述？这是否意味着有另一种超越上述“必然性”的逻辑？事实绝非如此。

在官僚制—议会制的权力制衡技术中，韦伯为主体即政治家的作用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这是理解“全新自由”这一说法的关键。换言之，如果出现真正的政治家，出现他所说的“伟大领袖”，那么，官僚制—议会制这一复合的统治技术的合理一面，将得到充分的发挥。值得注意的是，在迄今为止的苏联解体论中，有俄国学者认为苏维埃政权“在政治领导人培养方面没有作为”是一个重要原因。^②显然，与韦伯的

① 韦伯：《论俄国革命》，第183、261页；二战后英国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柏林有类似的论断：“我认为俄国未曾贡献任何新的社会或政治观念，俄国任何的社会或政治观念不但有其长远的西方根本，而且，每个观念初现此地前八、十或十二年前，早已出现于西方。”参见柏林：《俄国思想家》（第二版），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

② 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9页。

分析相比，这种看法是浮浅的。在韦伯看来，凡是在官僚专制的地方，人们无法指望真正的政治家出现。真正的政治家也只有充分利用官僚制—议会制技术，才能发挥其主体的创造性与主观意志，才能在这个意义上创造历史，而不会受制于历史发展阶段论所规定的那种“必然性”。人类自由的任何可能性，只能同时依赖于对客观技术的尊重与对主观创造的珍视。

其实，韦伯在 1906 年论文末尾提到“全新自由”之前，他对经济发展与自由关系的阐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人们提出的唯一问题是‘民主’——实际上是‘自由’（就任何意义而言的‘自由’）——何以从长远来看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完全还有‘可能’存在时，把它归因于今天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则是非常可笑的。事实上，只有一个民族具备了永恒的坚定意志不再像一群羊羔一般被统治，才有可能支持它们的存在。”^①韦伯在当时俄国知识阶层的身上看到了这种主体的热情与意志，而正是这种主体要素才真正支持人类普遍追求的生存状况：自由。只有在自由的历史状况下，人的创造性才能得以发挥，从而“全新自由”的出现也就有了可能。韦伯对俄国革命的期许，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

事实上，也只有在上述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韦伯在其 1906 年论文中对沙皇尼古拉二世进行的讽刺与批评：“沙皇本人从未真诚地促进俄国变成一个立宪国家：……对沙皇来说，只有治安利益。”^②沙皇政权的政治稳定压倒一切，这种鼠目寸光的治安利益绑架了这个国家的和平前程，也绑架了这个国家与民族的真正利益。另一方面，沙皇政府的“官僚制根本没有准备就其独断的行政权力作出真正有深远意义的牺牲。”^③政府高官完全受限于官僚制的惰性与消极控制。韦伯据此对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结局嘲讽道：“正如‘伪善是恶性（vice）献给德性（virtue）的敬意’一样，这样一种虚伪至极的立宪主义的明确法典化，也是独裁制的‘理念’献给立宪原则同样令人羞耻至极的敬意。”^④专制者屈服于虚伪的立宪主义，这正意味着立宪原则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力量。

由于沙皇念兹在兹的仅仅是“治安利益”，他全然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政治眼光。韦伯不无遗憾地论述道：“如果‘立宪’体制在法律中得到充分贯彻的话，局势的发展可能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到那时候官僚制就可能要依靠君主来反对议会，并与君主休戚与共。尽管这听上去可能很奇怪，但是君主要是还想继续做官僚制事实上的

①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 57 页。

② 韦伯：《论俄国革命》，第 175 页。

③ 同上，第 241 页。

④ 同上，第 209 页。

主人，这就是必经之路。”^①沙皇本来可以得到恰如其分的政治位置：在有效的议会、政治家、官僚的相互作用中，存在着真正的政治。然而由于沙皇维持专制的野心及政治上的无能，更由于他对官僚制的无知，他最终葬送了政治改革的良机。

上面我们看到，在官僚制—民主制的技术对立中，韦伯引入了主体对于自由的意志要素。这里要强调的是，正是这一主体要素，这一内在于普遍人性的要素，作为近代组织管理技术的官僚制—民主制暗含的某种“必然性”得到了最终的控制；历史重新回归到了人的掌控之中。这样，韦伯观察俄国革命进程的普遍主义的视角得到了完全的展开。

这里同样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韦伯所言的“民主”或“自由”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并无关系。正因如此，韦伯对俄国知识分子持有的自由主义观念进行了分析与批评。

在分析沙皇于 1905 年 10 月颁布的立宪诏书时，韦伯对其第一条承诺的各种自由进行了分析。如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做法一样，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求立即实行以普通、平等、直接、秘密为原则的选举法；他们期望这种民主原则将保障自由的实现。韦伯对此疑虑重重，因为他发现俄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热情阻碍了他们对人类事务本质的思考。兹举一例：韦伯通过展示“学术自由”与大学民主机构“议事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批评。

韦伯指出，“俄国同仁对一种良好的无记名投票体制的效能的信念，甚至是在那些涉及个人品质的地方也不例外——人们只能期望他们能放弃自己对‘议事会’效能的特殊尊敬。”然而，民主的“议事会”在这里成为“学术自由”的障碍。在韦伯看来，“当需要对一个特定学科的一名学者的学术水平这类问题作出正确决断的时候，议事会是毫无用处的，这类问题应该只根据特定的最少人数的教学人员的直接要求来运作。”^②

这里同样意味深长的是，韦伯从一种普遍人性的视角对上述论断进行了解释：“就人性弱点可以允许的范围而言，真正的‘学术自由’，只是考虑候选人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的意义而言，绝不可能通过绝大多数一知半解的成员组成大型会议进行无记名投票来实现，正如这种学术自由绝不可能通过政党庇护关系或者忠于国家的官僚机构的干涉得以实现一样。”^③我们看到，韦伯对这一具体情形中民主制、无记名投票制的批评，并不是某种精英或贤人统治论的翻版，而是考虑到“人性弱点可以允许的范围”后，对真正自由的探究。显然，这种对自由的探究正源于对作

① 韦伯：《论俄国革命》，第 175 页。

② 同上，第 190、191 页。

③ 同上，第 191 页。

为主体的人的意志的尊重，因而同时是近代官僚制—民主制技术下自由得以保障的内在要求。

（二）韦伯的“民族主义”立场问题

让我们转向第二个疑问：韦伯固有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在其论述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我们要问，韦伯的俄国论是否是与德国纯然无关的超然论述？事实并非如此。不过，韦伯的德意志立场并未影响他的客观判断，甚至可以说正相反，韦伯要从俄国革命及其失败的经验中吸取必要的思想养分，最终为德国的政治改革提供知识与智慧上的支持。

在批评俄国阻碍变革的势力的愚蠢的同时，韦伯对德国进行了异常辛辣的批评。“俄国正在经历惨痛的阵痛之时，即便在这种时候，德国人还有一个荒唐习惯，要寻找‘要谴责’的人，‘当然’不能去指摘君主及其亲密随从，因此德国人就很喜欢一种极端卑劣的、针对议会政治的批评，在德国无教养的人看来，犯错的必定是杜马。他们称杜马‘政治无能’，没有完成任何‘实际的’事务，然后他们又提醒德国的读者注意，不论从何种情况来看，俄罗斯民族都还没有为一个立宪政权做好‘准备’。”^①韦伯接连使用了“荒唐”、“极端卑劣”、“无教养”的措辞批评德国人，因为他们（当然并非全部）仅仅止于对政治的表面现象、尤其是对政客们举手投足进行肤浅的观察，人云亦云，毫无动用自己理智进行客观分析的准备与能力。如果任这种“无教养”状态持续下去，德国国家与民族将付出不可挽回的利益代价。韦伯对俄国的分析与批评，同样有效地指向了德国。

因此，作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韦伯，并未因这一身份而影响了他对客观形势的判断。相反，他的民族主义、他对德意志民族的忠诚，正体现在他对客观事实分析技术以及政治眼光上。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韦伯所展示的分析技术与政治眼光，可以说得益于他卓越的社会科学视角。作为大变革时期的德国知识分子，在韦伯看来，如果不经过理智的、科学的审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这些说法无异于内涵苍白的空洞口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韦伯在论述观察、论述俄国时，不具有作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特殊关怀。事实上，早在1887年，还处于少年时期的韦伯就注意到了“俄国的威胁”。到了1908年11月，在海德堡的国民自由党集会上，针对公法学家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的讲演，韦伯又公开进行了如下评论：“强大的俄国如果有了民主的宪法，有了议会制，事态将令人震惊。俄国是最让人恐怖的列强，正因为它现

^① 韦伯：《论俄国革命》，第259页。

在的议会和宪法毫无意义，才缩小到现在的样子。”^①在1906年论文的末尾，韦伯其实已经表述了类似的看法：“一个真正立宪的俄罗斯会是一个更强大的俄罗斯。”^②与后者相比，前面说法中的“恐怖的列强”一说，流露了他的忧国情怀，因而遭到了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批评。

正是在这些特定的表述中，我们得以确定韦伯作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品格。作为民族主义者，韦伯必然要关心德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竞争对手、甚至是天然敌人的俄国。正因为如此，当韦伯指出立宪俄国因强大而产生威胁时，他同时在警告他的德意志、乃至人类同胞：议会与宪法在现代国家建设、在实现强国过程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由分裂到整合的历史，再次证实了韦伯的“预言”。

从韦伯的俄国论来看，我们可以说，韦伯因其真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身份与立场，获得了观察近代以降人类政治生活的普遍主义视角。俄国革命论就其这种普遍有效性而言，也就成了后人思考人类普遍事务、关于文明进程的杰出的历史与思想文本。

四、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社会科学的观点

回到本文最初的话题。“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无疑具有多重的历史意义与经验教训。然而如前所述，在学者们迄今为止的论述中，意识形态成了多数论述的起点与终点——论者们倾向于在观念的某个环节上进行或正或反的论述。比如，对“苏联实验”持正面看法的论者常常运用一种可称之为“背叛论”的思维方式。他们相信，苏联的社会主义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而苏联解体仅仅意味着现实中的主体的背叛。在他们举出的背叛者名簿中，我们可以看到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斯大林、甚至列宁本人；我们还可以看到苏联精英“整体背叛”的观点。^③由于这些人背叛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才有了1991年的悲剧结局。

然而如前文所述，意识形态角度的解释无论是来自左翼还是右翼，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是转换了问题——论者将问题转换到了各自未加质疑的、特殊的、因而必然激发对立的立场上。这些解释无益于我们吸取经验教训，因而也无益于人

① 转引自今野元：『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ある西欧派ドイツ・ナショナリストの生涯』，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200页。

② 韦伯：《论俄国革命》，第263页。

③ 参见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体制的灭亡》，汪澄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类文明的进步。我们需要更高一层的普遍主义视点的分析，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

举例而言，关于“苏联解体”，多数论者都认为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然而除去价值的好恶，单纯从统治技术的角度来看，这一“专制制度”的具体内涵是什么？遗憾的是，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前，“斯大林专制”、“苏共专制”等方便的、意识形态色彩浓烈说法阻止了人们探讨的脚步。因此，本文有意提供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析视角，即官僚制。

当然，从这一角度指出俄国革命后面临的困难，韦伯之后并非无其他人。比如托洛茨基在其《忠诚的革命》（1936年）一书中，就曾注意到官僚特权的形成，指出“官僚主义在这个决定性的领域里取得了胜利”，并认为社会主义的命运就在于是否能战胜官僚。^①

本文重新讨论韦伯的官僚制视角，并非仅仅因为韦伯是首位从这一角度论述俄国革命的学者；本文讨论这一视角的原因更在于，韦伯基于社会科学的分析——因而不同于托洛茨基（及其后学者）对官僚制弊端、比如对官僚主义的直觉认识——，首次将官僚制的内在机制揭示了出来。托洛茨基提到官僚制与社会主义命运的关系，这种洞见远远超过了后来那些仅仅注意到官僚制负面效果的学者；然而他仍然未能揭示这种关系的本质。

在韦伯所进行的对现代化、合理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看到官僚制乃是经济生产合理化、统治合理化的必然手段。就其纯粹的形态而言，官僚制在效率性、严格性、可预测性、普遍应用性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与此相对，这一制度的消极性也异常突出：官僚制动辄演变为官僚机器的专制统治，作为主体的人或者成为机器的部件，或者成为其统治乃至奴役的对象。既然官僚制内在于近代组织自身，因而内在于近代企业生产与管理，内在于国家统治自身，那么如何驾驭这种技术，就成为事关文明进程、事关人类生存境遇的性命攸关的问题。

十月革命后，俄国一方面事实上屈服于官僚制管理与统治的必然，另一方面又试图在观念上消除这种官僚制统治的表象，比如，将“政府”改称为“人民委员会”等等。当然，俄国革命家更试图在制度上对这种官僚制进行控制，众所周知的以党务系统进行控制，就是革命者想到的核心对策。然而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意识到官僚制也必然内在于党务系统本身。结果，屋上架屋，官僚制无法控制官僚制。官僚制的优点未得到发挥，其缺点反倒因双重的官僚制而大行其道。

因此，从欧洲近代以来的合理化、现代化的普遍角度来看，革命后俄国走自己的道路，最初就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如何在近现代的工业生产与管理、近现代

^① 转引自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第132页。

国家治理过程中控制官僚体制，在制度上为自由创造留下空间，从而发挥人、发挥主体的选择与热情的历史作用？这个问题如果无法处理，那么俄国体制的结局只能是在官僚专政与个人专制之间摇摆。在这个意义上，苏联是否解体自身并不重要，因为苏俄社会并未解决内在于现代化进程的普遍问题，亦即上文提到的官僚制、议会制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人性普遍要求的“自由”框架内，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当韦伯在 1906 年说，俄国（还有美国）的选择是从头开始建设“自由”文化的“最后”机会时，他对俄国知识分子的主体热情表达了最高的敬意。这种表达并非同样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韦伯的惺惺相惜之情，而是源于他对近代社会组织原理的洞察。而当他在 1918 年说，如果俄国实验证明这个基础上的文明是可能的，因而“我们也许会改宗”时，他表达的已不再是敬意，因为他对俄国此后的道路，其实已经了然于胸。在作为管理技术的官僚制与作为政治主体的人之间，俄国只能回归到他所说的“欧洲发展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1991 年末苏联的最终解体，只是给韦伯的“俄国革命论”、给韦伯的社会科学分析的有效性，增添了一个事实注脚。

【Abstract】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at the end of 1991, scholars have analyzed reasons of this historical even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mong which ideological analysis has taken a prominent role. However, all these analyses are trapped in tautological defaults.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analyses based on certain facts, usually stops at so-called hind-sighted description, failing to provide effective explanations. 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ciences, what on earth does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mean? Max Weber has offered us a unique perspective in his essays on Russian revolution.

【Key Words】 Max Weber, Bureaucracy, Rationalization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конце 1991 года ученые провели различные анализы причин эт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события. Среди этих анализов видное место занимают анализы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аспекта,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в данного рода анализах прослеживаются тавтологические логические ошибки. В отличие от этого, основанные на фактах анализы часто ограничиваются лишь описанием событий и неспособны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эффективное объяснение.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что же означает развал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акс Вебер в свое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отличн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акс Вебер, бюрократия, р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责任编辑 陈大维）

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改革专论

苏联改革的两面性：从改革走向崩溃

M·坎加斯普罗*

【内容提要】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苏联突然解体了。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把苏联带入了一场典型的革命性进程之中。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非常谨慎，随后逐步扩大到政治层面，并升级为激进的政治诉求和改革，进而持续升温成为一场革命性的大动荡。旨在恢复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的苏联版“热月政变”由此出现。实际上，前苏联的这场改革并不像当下一些政客抑或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所讲述的那样，是一场有计划的、有组织性的，旨在实现民主化、西方式的民主社会类型和市场经济的改革。苏联的解体也并非因为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事实上，苏联的经济早已是一潭死水。苏联之所以会走向解体，主要在于其一系列旨在解决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改革准备既不充分，信息也不全面。历史上不乏各种经意和不经意的结果，这场改革将苏联整个社会推入了政治经济不断沉沦的漩涡，引起权贵阶层尤其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执政者的不安。这反过来又催生了一股压力，要求迅速纠正这些意料之外的结果。从本质上说，苏联解体是这场自上而下改革的结果，这场改革的开始是由于部分苏联精英利用了苏联上层社会对激进改革以及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的诉求，然而却以整个社会体系的改变而告终。

【关键词】苏联 改革 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 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K512.5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6-0029-(17)

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这场革命，其演变的先决条件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就已出现，理解这一点十分必要。苏联精英十分清楚，持续十年的经济低速增长，使得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日益明显。面对主要竞争对手美国，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落后感促使其精英乐于接受由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即苏共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所

* M·坎加斯普罗 (Markku Kangaspuro)，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亚历山大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提议的第一次改良。安德罗波夫的继任者——契尔年科保守地接受了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意愿，接着是安德罗波夫中意的继任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先生继任。

安德罗波夫的温和改革和契尔年科的保守表现使得人们不禁联想起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已准备好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改革的时机成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从安德罗波夫温和的改良走向激进的、有更多社会阶层参与的改革。部分知识分子、政治经济权贵阶层，以及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主义者开始要求更为深远的改革。这些改革最终导致了1990年8月的、类似于“热月政变”的短命的尝试。“八一九事件”的发生成为鲍里斯·叶利钦于1991年12月给予苏联最后一击的主要推力。叶利钦在其担任总统期间，希望通过“休克疗法”促使俄罗斯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从而可以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结果，新的社会体系催生出寡头治下的新兴政治精英阶层、和新的财团。部分前苏联的权贵阶层华丽转身为俄罗斯的“新贵”。2000年，弗拉基米尔·普京当选总统，开启其“热月复辟”时代。在可与16世纪末期俄罗斯“混乱时代”相提并论的叶利钦时代结束后，普京的两届总统任期具有明显的、加强中央权力的半威权主义特征。

在苏联历史上，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如世人所看待的那般非同寻常。改革只是因应成熟的社会条件、政治进程而发生的，它这为那些能够抓住机遇、利用机会实现自身社会抱负的人提供了机会。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都具备这些特质，他们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执政，从而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第一种解释

苏联解体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极世界从此变为一极独霸，冷战也就此终结。弗朗西斯·福山曾写过一篇关于历史终结的文章，热情洋溢地讨论欧盟一体化和欧盟扩大的进程，尽管如今这一进程陷入了困境^①，但在当时它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势发展着。毫无疑问，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引发了学术界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热烈讨论和深入研究，他们讨论的议题相当广泛，苏联政治社会进程、经济的作用、里根政府施加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戈尔巴乔夫的新型外交政策以及其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所奉行的新思维均在其中。^②

① 撰写本文之际，正值整个欧元区遭遇质疑之时，甚至有人预测货币联盟已走到尽头，但在当时情形远非如此。

② 罗伯特·英格力斯（Robert D. English）曾写过一本重要的作品来讨论西方影响与戈尔巴乔夫思想、外交政策演变之间的相互关系：*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Gorbachev, Intellectual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发生的这一切，有一种至今仍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由于经济停滞以及对美军备竞赛所导致的经济恶化，使得苏联解体在所难免。然而，过去十年间，人们对这种将经济恶化及里根政策作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的说法进行了重新考量，人们得出了一些多元视角的、有关整个事态发展前因后果的分析和结论。然而，关于改革的原因、新思维以及苏联解体，争议之处颇多^①。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解释仍据有一席之地。安德斯·阿斯拉德（Anders Åslund）于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中他分析问题并得出与1991年时同样的结论。当时，他强调1991年苏联经济的不健康因素，并得出结论，认为苏联难以为继。“时势造英雄，叶利钦就是那个英雄。他知晓苏联即将覆亡，但他得找到一条能让俄罗斯人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方式来结束它。”^②阿奇·布朗（Archie Brown）以及稍后笔者将提到的一些学者，他们都相当重视政治代理人的政治选择以及制度的推动力，这些制度关注诸如共产党及其不同政治派别的不同机构的利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矛盾的定位及其不一致的政策、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情绪所发挥的作用、新制度的出现（比如，国家主席和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政策公开等问题也是这些学者所关注的问题。

第二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的角色和意图。这又要回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意识形态、政治、魅力型领袖、反对意见的作用和力量，苏维埃各机构内部相互矛盾的利益的存在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第一个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即是在哪些历史转折点，社会各阶层如何在不同的选项中做出的抉择。他们的决定将会带来预期之中和意料之外的结果，并为他们自己创造新生活。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情况即是如此。弗拉基米尔·什拉片托赫（Vladimir Shlapentokh）曾断言，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之前，苏联确实“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大部分的难题并没有危及政体的存亡。”什拉片托赫认为，苏联在很多方面可以算作“正常的极权主义国家”。与其说苏联的解体是苏联体制中的“顽疾”（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停滞）所致，不如说是改革时期政治领导人的一种政治选择。^③

戈尔巴乔夫本人曾明确表示，他是基于国内因素而决定进行改革，但同时核战

① 参见：“Power, Ideas, and New Evidence on the Cold War’s End. A reply to Brooks and Wohlforth”,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4, Spring 2002, pp.70-92;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From Old Thinking to New Thinking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4, Spring 2002, pp.93-111.

② Anders Åslund, “Revisiting the End of the Soviet Unio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8, July-August/September-October 2011, p.47.

③ Vladimir Shlapentokh, *A normal totalitarian society: how the Soviet Union functioned and how it collapsed*, Armonk, N.Y.: Sharpe, 2001, p.179.

争的危险“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而且也包括文化及道德领域的更深层次的变革，这些变革致使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有所改变。文化尤其是文学在苏俄社会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知识分子在界定俄罗斯人关于是与非、道德与不道德、是否平等正义，是否存在剥削关系等的世界观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改革与开放促使人们得以对之前批评苏联体制、对苏联体制持反对意见的作品进行公开讨论，同时，政治及艺术领域的跨国交流也得以可能。这种文化改变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政治、社会活动家均受益匪浅。

改革不仅仅是横贯整个东欧，出现意外后果（如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的一个历史悠久的过程。改革与开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惠及苏联及其他地区。大家普遍认为，至少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匈牙利和波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经济改革以及波兰在八十年代的团结工会运动是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和新思维的前奏。安德斯·阿斯拉德声称，至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团结工会反对运动之时，社会主义已丧失了生命力^②。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即从1975年开始的赫尔辛基进程）也为东欧国家的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使他们的内政较少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影响，从而为其与西方的关系腾出空间^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尚未向统一的目标发展。很多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如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伊戈尔·沙法列维奇（Igor Shafarevich）^④、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均对政体表示不满。然而，什拉片托赫认为，总体而言，反对运动并没有对当时的苏联产生太大的影响。反对运动甚至可以完全忽略，撇开其自身的弱点，它还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路线，完全不能组织相互之间更广泛的合作^⑤。

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Perestroika）、1986年在苏共二十七大会上提出“公开性”（Glasnost），这两个政策不仅对苏联社会，而且对整个东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欧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冷战史学家低估了东欧小国对苏联

① “Gorbachev on 1989”, Interview by Katrina vanden Heuvel & Stephen F. Cohen, *The Nation*, November 16, 2009.

② Anders Åslund, “Revisiting the End of the Soviet Union”, p.46.

③ 参见: Katalin Miklóssy, “Elite and Perestroika before Perestroika in Hungary”, *Perestroika.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 Edited by Markku Kangaspuro, Jouko Nikula, Ivor Stodolsky. Helsinki: 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 2010, pp.107-108.

④ Krista Berglund 曾写过一篇非常出色的文章来讨论伊戈尔·沙法列维奇，参见: Krista Berglund, *The Vexing Case of Igor Shafarevich, a Russian Political Thinker*, Helsinki: Helsinki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2009.

⑤ Vladimir Shlapentokh, *A normal totalitarian society: how the Soviet Union functioned and how it collapsed.*, 2001; Ben A. McVicker, “The Politicization of Aleksandr Solzhenitsyn in the Soviet Union, 1987-1992”, *Perestroika.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 pp.208-209.

发展及改革和开放的影响。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整个过程中，双方是互动的。苏联越开放，其受西欧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就越深。此外，之前的思想、价值观（如地下出版物）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并开始取代苏联的观念。显而易见，当今俄罗斯的很多结构性、体制性方案以及政治文化，都回到了苏联时代，或者说倒退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总统叶利钦与议会之间进行权力斗争的时期。

二、改革的根源

作为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初衷并非进行改革或者开放。面对苏联经济的衰退，他希望能通过“加速”计划（uskorenije, ускорение）^①促进经济的快速繁荣，并引入新技术。这些改革都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框架下进行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打着“重回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旗号，在反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寻找指引人们前进的方向，其中也包括尼古拉·布哈林的著作以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新经济政策。这也引起了关于苏联历史转折点、斯大林政治及二战前后苏联领导人的选择的广泛讨论。人们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实际情况和种种可能与苏联早期及新经济政策时期做比较。其实，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伊始，即1985年，改革（perestroika）的概念甚至无人使用。经济加速增长才是1985至1986年间的主导思想。

尽管经济的放缓甚至停滞都具有警示作用，但却并没有给苏联体制带来巨大的灾难。苏联历史上曾经历过几次更严重的危机，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30年代的全盘集体化以及1937-1938年间的大清洗运动。更有甚者，苏联领导人不用直接对其人民负责，也不用依靠人民的支持。就苏联政体而言，人们的被动同意即已足够。此外，苏联还有对其政党绝对忠诚的镇压工具，比如军队和克格勃。另一方面，苏联的反对者和反对运动也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不能组织任何群众运动，根本不能与波兰的团结运动相媲美。

因此，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最值得关注的是其经济的停滞（尽管经济停滞并未危及重要的社会活动），苏联的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经济停滞之所以被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主要是因为这使得苏联在与美争霸的两极体系中处于弱势。在这种背景下，苏联是实力不断衰退的挑战者，因此苏联对任何不利于它与美国抗衡的苗头都十分敏感。此外，苏联在1975-1980年间经济增长率下降

^① 1982-1984年期间，时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就已经使用了“加速”（uskorenije, ускорение）这个概念。“加速”作为一种理念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它与苏联经济中无数次的提高效率的运动如出一辙。

一半，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苏联焦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技术的落后，尤其是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军事技术的落后。^①苏联领导人深知，苏联作为一个整体很脆弱，而非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由里根总统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所引发的美苏军备竞赛，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苏联解体的要素之一。

然而，以安德烈·格拉乔夫（Andrei Grachev）为代表的其他人则认为，苏联与西方的军事对抗以及经济的停滞本身并非苏联解体的充分条件。他表示，尽管根据官方统计，苏联的军费开支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6%，远高于美国军费开支（6%）在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但苏联在防御方面的开支并未将其经济推向国家难以承受的境地。格拉乔夫指出，苏联领导人为其经济状况忧心忡忡，却并未对其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表现出足够的担忧；他们不会削弱战略野心，亦不会削减军费开支。格拉乔夫声称，意识形态上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潜在侵略性的恐慌，尤其是考虑到苏维埃军事工业联合企业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对于政治局和外交部的决策者有着重要的影响），使得苏联继续在与美国的角逐中寻求战略平衡^②。

如果不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强化和发展苏联的科学和工程能力的尝试，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在1982-1984年^③的任期内，他面对经济衰退的第一反应就是开始“经济加速”政策。^④契尔年科1984-1985年短暂的执政之后，相对苏联往届领导人而言十分年轻的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他延续了安德罗波夫的“经济加速”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经济毫无起色，于是他认为苏联需要进行更为深远的结构性改革。1985年4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必须调整旧的经济结构。安德烈·兹德拉沃米斯洛夫（A.G. Zdravomyslov）认为，正是在这次全体大会上，“发展社会主义”的概念第一次被摒弃，并且没有从理论或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此进行任何的讨论。苏共领导人关注于每天所要面临的众多挑战。决定是对假想的挑战做出的反应，而非依据任何认真的分析总结。苏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被要求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人的著作基础之上提炼出民主的概念。^⑤这是朝着

① Stephen G. Brooks, William C. Wohlforth, “Pow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evaluating a Landmark Case for Ide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3, Winter 2000/01, pp.19, 26.

② Andrei Grachev, *Gorbachev's Gamble.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 Malden: Polity Press, 2008, pp. 20-21.

③ 安德罗波夫曾经是克格勃的领导人，这一点可能让他对苏联政治经济的状况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④ Sari Autio-Sarasma 曾讨论过苏联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技术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努力以及苏联经济结构性缺陷，参见：Sari Autio-Sarasma, “Soviet Economic Modernisation and Transferring Technologies from the Westin”, *Modernisation in Russia since 1900*, Edited by Markku Kangaspuro & Jeremy Smith. Helsinki: Studia Fennica Historica, 2006, pp.104-123.

⑤ A.G.Zdravomyslov, “Perestroika i reformy. Nabljudenija sociologiya (1987-1991)”, Unpublished presentation in October 1997, p.2.

改革迈出的第一步，两年之后发展新思维和普遍的自由价值观，成为改革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不过，改革背后似乎并没有确切的理论支撑。关键在于，带有些许修饰的开放使得旧的中央权力政治结构完全暴露于新型分裂势力的挑战面前。

1985年4月的全体会议是第一个信号，苏共领导层意识到，要想确保成效，就必须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这种社会危机的观念为戈尔巴乔夫的论证注入了新的元素。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第二十七届党代会上所做的演讲中，第一次正式使用“开放”的概念。尽管戈尔巴乔夫的重点仍然是经济以及为1987年的国有企业法和1988年的合作社法做准备工作，但开放和民主的概念1987年仍被涵括在“改革”的概念之中。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推出其著作《改革与新思维》。这是苏联外交政策上的新篇章，同时，对于国内的保守强硬派来说也是一次沉重打击。

朱卡·佩耶提兰尼（Jukka Pietiläinen）已经注意到在开放的过程中，大众传媒逐步得到发展并扮演了相对独立的角色。改革初期，大众传媒被认为是将苏共政治运动合法化并推向深入的工具，打击腐败以及官僚主义，继续贯彻落实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指出甚至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出现开放运动。从这一点说，改革和开放起初只是温和的尝试，并没有时下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激进。在第二阶段，大众传媒开始批评并揭露苏联的缺陷及罪行。媒体甚至夸大缺点，误导民众以为这些缺点无法弥补^①。由于戈尔巴乔夫寻求自由媒体的支持，这些媒体通过揭露丑闻诸如斯大林时期的罪行以及领导人的错误行为来攻击党内保守派。这一切导致戈尔巴乔夫逐渐失去民众的支持。

然而，根据有关评估，《国有企业法》和《合作社法》等法律的出台为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一新兴社会阶层事实上推动了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前苏联的权贵阶层也渐渐浮出水面。他们与共青团的领袖以及私人合作伙伴开始将新的西方观念带入苏联。这些观念包括：创业、中产阶级、消费主义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规范。在马克斯·韦伯对此现象的分析中，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改革使得苏联的“管理”阶层进入人们视野，并且得以从苏共的政治控制和意识形态限制中解脱出来。

学界一直对这个议题争论不休，即：在绝境中开始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是否为时已晚，布拉格之春是否是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后一次机会。当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待过去时，总会发现那个时代所难以超越的危险始终存在。马丁·丹泽菲尔德（Martin Dangerfield）声称，在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前，经济互助委员会内部已对改革前景表现出万分的怀疑。他们强调一个根本的困难：如何既能让经

^① Jukka Pietiläinen, “Perestroika and changed reporting of social problems in newspapers”, *Perestroika.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 pp.78-80, 95.

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发生真正的改变，又能保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框架？即使是在匈牙利那样不甚相同的体制下也几乎是难以想象的^①。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仍为旧思想所左右，而这些思想早已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抛弃。

一些学者一直强调一个事实，即：在苏联 80 年代进行改革之前的数年，匈牙利即已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卡塔林·米克罗西（Katalin Miklossy）指出，从东欧的视角来看，苏联改革并非新鲜事，相反正是依靠赫鲁晓夫的试验阶段才有机会建设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对赫鲁晓夫的解冻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改革进程的一系列连锁反应^②。丹泽菲尔德强调，匈牙利的改革有其历史渊源。早在 1968 年，匈牙利就开始了最初的向着市场型经济转变的实验，即新经济机制。在这次改革中，他们取消了指令计划，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③

值此之际，苏联也开始推行改革。阿列克谢·柯西金于 1956 年-1968 年间在经济领域进行了温和的改革。1968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取代了民意支持度不高的安东宁·诺沃提尼成为党的领导人。杜布切克即刻开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大的改革。随着布拉格之春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到来，改革戛然而止。

丹泽菲尔德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很多匈牙利经济学家开始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猛烈的抨击，他们呼吁全面地、综合地运用市场力量。他总结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在匈牙利道路的鼓动下开始改革，然而当时匈牙利的很多经济学家以及决策者已开始怀疑市场力量和社会主义是否契合。^④

最终，无论是之前的匈牙利激进的改革派还是后来的戈尔巴乔夫都达成共识，认为经互会并非解决经济问题的良方。他们都力图超越社会主义而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从与西方的经济联系中寻找启示。其中既有结构上的也有政治上的缘由。

三、1988-1989 年新变革及无法解决的问题

实行新思维政策之后，苏联的党纲、阶级观以及世界观不再是其外交政策的根基。戈尔巴乔夫所提倡的新型价值观与欧洲的、普世的价值观无异。这使得苏联不再与欧洲、西方划清界限而是向他们靠拢。

英格力斯强调说“新思维是建立在基本的信仰和价值观基础之上、历时一代人

① Martin Dangerfield, “Perestroika and the reform agenda for 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 new direction or dead end? ”, *Perestroika.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 p.121.

② Katalin Miklóssy, “Elite and Perestroika before Perestroika in Hungary ”, *Perestroika.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 p.98.

③ Martin Dangerfield, “Perestroika and the reform agenda for 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 new direction or dead end? ”, p.122.

④ *Ibid*, p.123.

的转型过程，在这之后则是为期十年的对内公开、对外开放的过程。”他总结说，并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振臂一呼，改革就随即展开了。几十年思想的沉积，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和开放奠定了基础。^①

1987年，当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提出人类共同价值观和新思维时，它的第二个主题便是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坚持认为，苏联政府的政治权力必须由苏共移交给苏维埃人民。这一说法提出的根据是，人的价值高于阶级价值。因此，已经没有阶级之分的苏联，完全可以放弃以阶级为基础的纲领。就宪法而言，从原则上讲，其逻辑是严密的，苏联被界定为一个没有阶级之分的社会。至少在这个层面上，新思维者摒弃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独立于西方、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念。他们认为，倘若苏联不接受普遍的人权和民主观念，冷战就不会终结，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东方也适用于西方。“政策”的定义在苏联的实际政治中产生了效应：戈尔巴乔夫同意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性武器、从阿富汗撤军，并承诺苏联将“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普通一员”。^②

新路线毫无疑问地激起了党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强烈的反对，并引发了对新政策的激烈讨论。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政府的执政地位摇摇欲坠，苏共分裂为两派。传统主义者即所谓的“右派”，于1988年3月在安德烈耶娃的信中表达了其纲领性批判。^③她的声明公然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政策。僵局是显而易见的，4月的“真理报”公开指责这封信^④。苏共领导人决定召开会议，要求大家专注于政治发展和改革进程。该次会议上，最具决定性的决议被提出，即苏共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苏共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均势被重组，天平开始倒向人民这一边。

1998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制度改革。通过这次改革，政治权力由苏共移交到政府机构手中。苏共不再是政治领导力量，而仅仅作为没有实权的思想组织而存在。戈尔巴乔夫努力使这些试图剥夺党的权力的决议得以通过，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走上政治舞台。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励了自由主义改革派和追随戈尔巴乔夫的同志，同时也削弱了党政机关的权力。改革的本质是一次新的力量制衡。宪法修正案最终确立了机构改革，设立了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职位。曾削弱党的绝对权力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志当选为这一新型政治机构的主席，实权在握。1990年，这场“革命性的改革”以在宪法中删去“党的领导地位”（第六条）而告终。

安德烈·德拉沃米斯洛夫认为，三个基本决策导致这场改革出现分水岭：首先

① Robert D. English, *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Gorbachev, Intellectual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p.235-237.

② Ibid, p.222.

③ Sovetskaya Rossiya. 13 March 1988.

④ Pravda. 5 April. 1988.

是开放的决定；其次是对政府和经济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最后是通过削弱苏共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来促进社会的民主化。实质上，这些举措试图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将党的权力转移到苏联人民手中^①。这种对改革和开放的新诠释促使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概念有了新的理解。民主运动将苏联的本质界定为绝对的统治，认为苏联需要新的宪法，并在广泛范围内发起对苏联历史、斯大林罪行，尤其是十月革命的本质的讨论。尤塔·谢勒（Jutta Scherrer）在她的文章中指出，开展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为那些被斯大林打压的杰出领导人和重要科学家平反昭雪，这些人包括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皮达可夫以及孔德拉季耶维奇等等。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不公开的平反相比，这次公开平反的决定性差异在于其是开放过程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真相被揭露，苏联的合法性基础以及苏共在道义上的正当性受到质疑^②。

1988年6月，由于对苏联历史尤其是其种种镇压罪行的揭露，所有学校取消了苏联历史课的考试。这种情形与人们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反应相类似。谢勒强调指出，取消考试这一举措反映出苏联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陷入混乱。在历史课上，媒体和文学取代了教科书，被解密的一切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然而，谢勒认为，仅仅通过新闻路径来理解“斯大林”，是不会得出任何结构性解释的，历史学家更公正的分析显得尤其必要^③。就这一点而言，1990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尘封已久的档案被公之于众，一场前所未有的、基于新档案材料的学术讨论得以开展。

一场有关苏联历史、尤其是十月革命的看法和描述的革命性讨论从此开始。这场讨论中，对1917年革命的解释与之前的理解大相径庭甚至相互矛盾。对苏联官方历史构成挑战性的解释更是不计其数。有人认为，1917年俄国有一个更开放的选择，即走西方的发展道路。还有一些民族主义者和传统的苏联人则认为苏维埃政权是战时俄国唯一的、历史的选择。绝大多数观点都否认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它只不过是一场政变。这些观点提供了新的视角，让人们意识到除了苏联政权，俄罗斯还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认为，十月革命使得罪恶的社会得以稳固，但这个社会却最终因作为支柱的党的瓦解而崩溃^④。作为一位民主先驱和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雅科夫列夫的表态被视为其对抗苏联体制和苏共的公开宣言。雅科夫列夫退党导致其与戈尔巴乔夫等激进改革派走向彻底决裂，他与戈尔巴乔夫私人关系也最终破裂。

① Zdravomyslov, “Perestroika i reformy. Nabljudenija sociologiya (1987-1991)”, p.3.

② Jutta Scherrer, “Perestroika in retrospectiv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responsibility”, *Perestroika.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 p.45.

③ Ibid, pp.45-46.

④ Zdravomyslov, “Perestroika i reformy. Nabljudenija sociologiya (1987-1991)”, p.5.

在社会上充斥着应“社会需求”而重新编写的“伪历史”的出版物。谢勒撰文指出，姑且不谈这些出版物的科学价值，这股风潮的显著贡献在于其有助于“范式改变”。如果没有媒体发挥作用，可能历史学家研究几十年的前苏联历史都不会引起这样的社会讨论。作为一个新范式的后果，很多社会团体也被重新评估。包括标志历史延续性的罗曼诺夫崇拜，旧日承载着俄罗斯伦理规范道德基础的贵族已俨然成为历史记忆。根据民意调查，革命前的政治家，例如维特和斯托雷平^①，名列历史人物排行榜前茅。人们认为他们代表着“有用的”或“积极的”过去。现在他们被视为俄罗斯现代化建设的倡导者。1988年，随着俄罗斯东正教千年庆典的进行，过去国家所推崇的正统观念在俄罗斯大地开始复苏。随后，1990年一部新的关于信仰自由的法律颁布实施。这一切都冲击着苏联的无神论教育。^②

由媒体操控的公共舆论在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舆论不仅重新审视过去，而且还突出社会和政治问题，甚至还影响了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朱卡·佩耶提兰尼认为，在开放时期苏联社会中的社会焦点问题以及新闻业的角色将公众的不满公之于众，这激励了公众的自我表达。他指出：苏联领导层出于政治考量，鼓动媒体夸大苏联的经济问题。佩耶提兰尼坚信，媒体在暴露社会问题方面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似乎发生变质，而面对日益增多的经济问题，自由的评论却越来越多^③。

戈尔巴乔夫努力通过向知识分子敞开胸怀、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甚至激励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持批评的态度的方式来赢得更广泛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文化上乃至意识形态上的转变是他释放了安德烈·萨哈罗夫，并且在1990年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平反。此前，萨哈罗夫曾被流放到高尔基长达七年，戈尔巴乔夫打了那通著名的电话，并且邀请萨哈罗夫为改革做出自己的贡献。本·麦克维克尔（Ben McVicker）认为，当索尔仁尼琴重新恢复其苏联公民身份时，这才是苏联改革中思想上的真正转变。麦克维克尔的结论是，“苏联领导人曾寄希望于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能有助于建设苏联文化，但是结果却发现民众醉心于其民族主义的影响。”^④大部分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其开放和改革政策中从未理解民族主义在苏联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深远影响。

索尔仁尼琴并非左右人们对苏联领导人的看法和评价的唯一因素。二十世纪八

① 在2008年Rossya电视台和Mayak广播电台共同组织的最伟大的俄国历史人物评选中，斯托雷平排名第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排名第一，而斯大林排名第三，比领先者少了5500多票。

② Jutta Scherrer, “Perestroika in retrospectiv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responsibility”, pp.51-53.

③ Jukka Pietiläinen, “Perestroika and changed reporting of social problems in newspapers”, p.95.

④ Ben A. Vicker, “The Politicization of Aleksandr Solzhenitsyn in the Soviet Union, 1987-1992”, *Perestroika.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 p.213.

十年代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对所有东欧国家如何看待苏联领导人和苏联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苏联领导人特别担心美国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企图，以及美国通过煽动反对运动尤其是团结工会运动而获益^①。

阿奇·布朗认为，从本质上说，苏联解体既不是因为团结工会运动以及柏林墙倒塌这些事件的负面影响，也不是因为东欧政权迅速脱离共产主义阵营，而是苏联内部发展的结果。他强调苏联国内的两大重要变化：社会的自由化和多元化以及社会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作用；苏联于 1988 年宣称不会通过军事干预的方式维护东欧政权^②。这无疑给反对运动火上浇油，致使他们敢于挑战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并且为西方支持反对运动大开方便之门。

对一党专政的第一次真正挑战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1989 年 3 月，选举在众多的候选人之中进行，出乎意料的是反对党获得胜利。事实上，选举的结果代表着共产党机制的重大失败。这是苏联统治者第一次在一个相对公开的、选民有权从不同候选人中进行选择的选举中寻求民众的支持。人民抓住了这次机会，反对党获得了代表大会的多数席位。这几场选举被认为是改革中的一次高潮，权力得以从党政机构移交至代表人民的苏维埃手中。

新的权力结构构建了新的政治局势，并为反对党、反集权主义者以及民主运动的演练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一场新的政治运动的萌芽便是全国性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成立，该党自称完全独立于共产党并反对共产党领导。最终，最激进的政治人物最后都加入了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该党喊出了内战时期的口号“苏维埃不需要布尔什维克”。他们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公开反共运动。这场运动所取得的真正成果是该运动的领导人叶利钦于 1990 年 5 月 29 日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这引发了滚雪球效应。仅仅一周之后，即 1990 年 6 月 8 日，俄罗斯联邦通过了关于俄罗斯主权的新立法。

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戈尔巴乔夫废止了党的领导地位。1990 年 3 月 13 日，苏联宪法（1977 年）中的第六条，即苏共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这一条被废除。第二天，即 1990 年 3 月 14 日，戈尔巴乔夫被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国家主席。尽管他仍然是党的总书记，但他却在某种程度上终止了党的领导。结果他的权力、职位都有赖于人民代表大会，他不再得到党内的无条件支持。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他开启了一个给予他本人更大施展空间并且淡化苏共角色

① Archie Brown,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22; Andrei Grachev, *Gorbachev's Gamble.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21.

② Archie Brown,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p.221.

的进程。然而，事实上，他作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新职位仍然是建立在他是执政党主席的基础之上的。吊诡的是，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成功地削弱了苏共的力量，但同时他们也削弱了自身的组织和政治力量，没有得到一丝回报。各加盟共和国扩大了它们的自治权，通过了主权宣言。结果，苏联的中央权力和主席地位都丧失了实力及合法性。阿奇·布朗提纲挈领地指出了戈尔巴乔夫面临的困境：他一方面削弱了党的统治地位，但同时也降低了自己的行政权力^①。

这一阶段，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是一个既没有得到加盟共和国青睐、亦没有忠实军队的统帅。自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并宣布主权以来，戈尔巴乔夫是国家元首、苏共总书记，拥有不争的权力和合法性。他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普选中人民的一致认可的基础之上的，而是源自于旧有权力结构的提名。然而，这一合法性却遭到了新的政治运动、反对党甚至他本人的言论和决定的质疑。在1990年末1991年初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开始与最激进的改革派们保持距离，其中就包括他的老伙伴——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布朗指出，戈尔巴乔夫战略性的撤退是一系列离心作用的结果。大部分激进的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已不再支持戈尔巴乔夫，转而支持叶利钦。这迫使戈尔巴乔夫向社会中的保守派寻求支持^②。事实上，这一转变促使戈尔巴乔夫变得更为脆弱。他失去了之前左派的支持，同时也未能得到右派的支持。结果，他在两派之间陷入两难，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戈尔巴乔夫这样描述这一历程，“改变体制、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是一件极其困难、危险、冒险的事。”他不断主张，改革“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显然需要激烈的手段，但潜移默化的演变也是必需的。^③

离心倾向也致使苏联加盟共和国和民族自治的地方士气低落，中央权力日趋瘫痪。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阵线加强了他们对权力、媒体和舆论的控制。最突出的是波罗的海国家及其民族主义阵线，还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以及乌克兰等等。民族主义是一股可以动员大众的强大力量。在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中，民族主义政治或曰族裔化政治在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苏联的演变似乎遵循着这一逻辑：不同行为者之间进行利益争斗，导致出现意外的政治决策及后果。人们通常将注意力放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个矛盾的角

① Archie Brown,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p.24.

② Ibid, p.280.

③ Michail Gorbachev, *Ponyat' perestroyku...pochemu eto vazhno seychas*. Al'pina Biznes Buks, Moscow, 2006, p.21. Quoted in Archie Brown,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p.284.

色身上。布朗曾说，虽然“在苏联解体的前几年，叶利钦有时在苏联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为了个人的远大抱负，他时刻准备着推翻苏联政权。”^①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的角色还更多地取决于其改革政策的客观后果。布朗认为，如果没有以下的政治决定，苏联也许并不会走向解体：允许体制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接受东欧国家的独立；不再使用任何武力干涉分裂势力^②。布朗结论的关键是：苏联的解体在于其蓄意做出的政治决定，其后续的发展却如滚雪球一发不可收拾。

四、改革之后

1991年3月17日，进行了一次决定苏联命运的全民公决。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九个国家的大部分民众要求保留苏联。这次公投给予戈尔巴乔夫些许激励。1991年夏天，八个加盟共和国同意并签署新的联盟条约，苏联差点成为更为松散的联邦。然而，早在同年三月，苏联进行过一次关于设立总统职位的公投。在已登记的选民中，有刚刚过半的选民支持这一提案。1990年7月12日，结果公布，叶利钦的总统地位以及俄罗斯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确立并较苏联和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更强。

1991年8月19日，为挽救苏联的最后一搏仓促上演。在离签署新联盟条约仅剩两天的时间里，党内强硬派、安全机构以及军队才采取行动。在这场政变失败之后，叶利钦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而戈尔巴乔夫的光环则逐渐褪色。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平衡发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天平倒向了加盟共和国这一边。1991年8月，紧随政变，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效仿1990年的立陶宛，重新恢复独立。同时，其他的12个加盟共和国仍在讨论新的、更为松散的联盟模式。

在“八一九”政变失败之后，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垮了苏联。俄罗斯不再沿用苏联国旗，转而采用三色旗。祸不单行，在八月至十月间，各加盟共和国纷纷投票，决定是否独立。时至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的总统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来取代苏联。独联体以松散及脱离文明关系为特点。当人们尚对《别洛韦日协定》是否有权解体苏联存在疑惑的时候，1991年12月21日，除格鲁吉亚以外的所有加盟共和国代表，包括那些签署《别洛韦日协定》的国家的代表们，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苏联不复存在，独联体和俄罗斯联邦登上历史舞台。

苏联解体后，新生的俄罗斯着重于在其社会凝聚力及“有用的”过去的基础上打造未来。没有诉诸法律来处理斯大林的罪行，1991年至1992年的对苏共的法庭

^① 在安德斯·阿斯拉德看来，叶利钦摧毁苏联的决定显示了他是一个真正值得尊敬的政治家。

^② Archie Brown,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p.318.

诉讼也并未取得任何实质结果。在这方面，苏联和俄罗斯选择了一条与许多中东欧国家不同的路径。关于历史上的一些黑洞（内战、斯大林主义、二战期间的几次事件）的讨论以及重新撰写俄罗斯“辉煌历史”的尝试从未结束。无论是教育改革，还是近几年采用新历史教科书的举动，抑或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委员会为弥补因篡改历史而对俄罗斯利益有所损害的尝试，这些都是俄罗斯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必然举措。

一方面，西方不愿接受俄罗斯为一个同等重要的欧洲强国，俄对此深感失望，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发展也一直令西方颇感失落。苏联解体已有二十载，但俄罗斯并未像西方转型理论以及政论家们所预想的那样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俄社会也未曾遵循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世界性”趋势，当然，这一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产权关系基础之上的。事实上，俄社会和民众的表现与理论预期并不一致。新兴中产阶级成为消费主力，却并未要求更广泛的民主和人权；叶利钦治下亲西方的民主派已失去民众的支持及社会影响力。总体而言，叶利钦任职期间最大的一个错误在于当时政府并未进行政治改革，而是专注于实现私有化并确保私有化进程的不可逆转。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苏联改革的确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尤其是深远地影响了前苏联空间。对于俄罗斯的领导人而言，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悲剧^①；而对于大多数西方政治家而言，苏联解体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成就。现在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一直束缚在自己的幻想中，固执地期待苏联能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到自由民主制度。在苏联解体近二十年之后，西方仍在质疑缘何俄罗斯依旧走自己的道路。尽管遭到强烈的抵制和批评，俄罗斯整个社会，上至总统下至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热烈讨论俄罗斯的现代化道路：当今俄罗斯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借鉴西方经验；如果借鉴，又是哪些经验。

最后要提出的是关于俄罗斯“特殊道路”这一永恒的话题。这一思想在普京的表述中有所体现，他将俄罗斯的模式定义为“东方的民主”。按照西方的说法则是被操纵的民主。另一方面，梅德韦杰夫总统在接受《新宪报》（2009年4月15日）的采访中曾暗示，不仅在知识分子中，而且在整个社会中仍有西化的主张。梅德韦杰夫强调民主的普遍性以及市民社会的重要性。他对人权组织也持积极的态度。此外，尽管他曾提及“民主的历史性”^②，但却压根未提俄罗斯或者东方的民主模式。

当然，西方广泛接受“民主的历史性”的观点，同时，这一观点也与俄罗斯的传统思想相契合，即特立独行的俄罗斯文明。在这方面，不论是戈尔巴乔夫的，还

① 这让我们不得不起普京总统对于苏联解体的评价，“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就是没有良心，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就是没有头脑。”这是所有俄罗斯政治家共同的信念，无论他属于哪个党派。这也是所有俄罗斯民众的共识，虽然他们并不渴望回到旧的苏联模式。

② Deklaratsya Medvedeva. God 2009// Novaya Gazeta. 15.4.2009. <http://www.novayagazeta.ru/data/2009/039/01.html>

是叶利钦的或是普京的抑或是梅德韦杰夫的核心现代化理念，都没有任何的原则性区别。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都会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世界中走她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面对俄罗斯经济的现代化和多元化，俄罗斯该如何抉择、该如何调整日益关联的社会，这对于 2011 年 12 月新选出的国家杜马和 2012 年大选中选出的新总统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杨茗译, 张红校)

【Abstrac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happened suddenly and unexpectedly without alarming warnings beforehand. Party leader Mikhail Gorbachev's perestroika followed typical evolution of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Perestroika was started with cautious reforms which escalated political processes to radic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demands and reforms and continued through revolutionary upheaval to Thermidorian counter reaction designed to restoration of order and societal stability. My claim is that Perestroika was neither planned nor controlled process aimed at to democratization, western social democratic type of society and market economy as several contemporary politicians and Gorbachev himself have claimed retrospectively. Nor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was a result of destructive economic crisis which it couldn't manage any more. Instead of all of these explanations it was a series of poorly prepared and informed reforms aiming at to correct certain acute societ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As often in history its result was both intended and many times unintended results. This drove the society to worsening spira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using growing unrest among the nomenklatura and in particular in Soviet Republics. That in turn produced again a new stress for immediate and often inconsistently realized corrections of unintended results. Essentially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was a result of top down reforms which ended up the change of the whole social system carried out by the part of the Soviet elite using the impetus of radicalization of upper classes of the society and nationalistic tones of the Soviet republics.

【Key Words】 The Soviet Union, Perestroika, Mikhail Gorbachev, Boris Yeltsin, Russia

【Аннотация】 Крах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оизошел внезапно и неожиданно, не предупреждая заранее.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возглавленная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м партии Михаилом Горбачёвым, следовала типичной эволюц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Она началась с осторожных реформистских шагов, которые привели к эскалац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оцессов, от радикализац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требований и реформ через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еворот, и завершилась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й Термидорианской реакцией,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ной для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орядк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Моя ключевая идея -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не была запланирована, а так же не являлась управляемым процессом, нацеленным к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 западному социальному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му типу общества и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как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но утверждали несколько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деятелей и сам Горбачев. Пад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е было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которым больш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было управлять. Взамен всех этих объяснений,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была серией плохо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х и обоснованных реформ,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исправление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остр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 и как часто бывает в истории, итогом стали как намеченные, так и нередко не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Это вело общество к ухудшени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ледствием которого стало растущее недовольство среди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особенно в совет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ах. Э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снова вызвало новую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для безотлагательных и часто снова не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реализованных исправлений не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По существу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был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реформ команды Горбачёва (сверху вниз), которые закончились изменением цел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осуществленным частью советской элиты, использовавшей стимул радикализации высших классов общества и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настроений совет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ев, Борис Ельцин, Россия

(责任编辑 封帅)

建构、重建与解构：从概念史视角看苏联解体*

K·彼得罗夫**

【内容提要】以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概念史为指导，通过概念性的术语来分析苏联解体，可以得出很多与众不同的结论。改革、公开性、改良、革命、社会主义多元化以及加速等一系列概念，在苏联解体过程中都曾扮演了工具性的角色。将语义学和语用学置于知识分子和政治背景之下，研究者就能够以概念为视角来解释事件的进展，那种认为改革政策只是某种陈词滥调的一般性观念毫无意义。

【关键词】概念史 改革 公开性 社会主义多元化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K512.5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6-0046-(25)

绪 论

苏联解体已经被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民族、社会和文化因素等诸多不同的方法进行过解释。我并不打算发展或是修正这些方法，也无意呈现总括的综合分析。我的目的是希望完成苏联解体这幅宏图，并证明概念史观点的普遍适用性。^①我认为，

* 本文原发表于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杂志 2008 年第 3 期。经作者本人及该刊授权由《俄罗斯研究》予以独家中文发表。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周保巍副教授的推荐。遵循我刊编辑标准，译者及责任编辑特将转写为对应英文字母的俄文书刊名称恢复原状。特别感谢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候选人娜丝佳的帮助。

** 克里斯蒂安·彼得罗夫（Kristian Petrov），瑞典哥德堡大学科学理论与思想史专业教授。

① 早期研究从观念的角度分析苏联末期的政治发展的尝试包括（Brown, A.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21-129; Каганская. Марксизм и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Двадцать два. 59(22).1988.C.117-155.; Moskovich and Mossman, “Changing patterns of Soviet political discourse: 1985 to the present”, in K. Armes (Ed.), *ISCIP Publication Series, 7*. Boston, M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 Ideology & Policy, Boston University, 1991; Gross, N., “Glasnost’: Roots and practice”, *Problems of Communism*, 36(36), 1987, pp. 69-80; Goban-Klas, “Gorbachev’s glasnost: A concept in need of theory and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 1989, pp.247-254.; Geller, pp. 129-164)。这些尝试——其中一部分只是试验性的研究——意在确定关键性的政治概念是如何适应特定环境的，以及其如何能释放出新的可能性（及局限性）。我的方法更进一步，我希望突出这些已经消亡的概念，以及它们在埋葬自身所处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概念史角度复原苏联解体，能够阐明事件的进程，是展现社会矛盾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基本要素。本文将通过关注通常被视为空泛模糊的概念，证明那些认为改革政策修辞是陈词滥调或是委婉说法的普通观念是错误的。关键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意义丰富而又颇具争议的，关于其使用的知识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加综合地理解共产主义衰落的原因。一些评论家将改革的概念描绘为：用于掩饰缺乏实质内容的传统或矛盾政策的专制标语^①。另一些评论家则将这些概念誉为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最激进的衡量政治体制标准的神秘意符^②。而我持中间观点。戈尔巴乔夫的一些专业术语可能被认为是激进的，但同时必须与社会主义传统中既定的概念相比较来理解。戈尔巴乔夫散乱无章的策略在某些方面确实有质的创新，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通过与苏联的过去有意识的对话表现出来的。

在科塞雷克（Koselleck）浓墨重彩留名的概念史传统中，概念被视为可以对利益的本质和内在矛盾进行明确表达的活跃资源。概念反映并记录了现实，并且创造了现实。^③虽然我们的概念总结过去并反映社会发展，但是概念内涵的变化使得周围世界的新体验变得具有可行性，因而产生了对另一个未来的期望。

当代社会的基本概念（例如革命、文化、民主）一般是科塞雷克所说的集合单数。这些概念一般表示制度和实践的复合体，并将这些制度与实践结合为一个指向未来的最主要的整体。戈尔巴乔夫时代改革政策的几个关键词有理由被看成集合单数。随便举其中两个概念——“改革”和“公开性”——为例，就符合这些标准。在德国概念史或语言学研究中，这些标准通常被归类为最重要的、也是具有争议性的概念或关键词。这些概念出现频率高，并富有活力；不断受到挑战，得到广泛关注，并彻底地成为公共辩论的主题。这些概念承载着一个计划，通过一些同义词产生了新的含义，并且短暂地以复合词的形式出现。^④戈尔巴乔夫时期政治语言强烈地意识形态化和世俗化。“公开性”和“改革”获得了普世地位，并且被当作面向未来的集体行动概念进行推广。

科塞雷克的概念有将共时与历时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的优势。其概念史将概念当

① Gerner, K., & Hedlund, S. *Ideology and rationality in the Soviet model: A legacy for Gorbachev*. London: Routledge, 1989, p.352.

② Galtung, J., & Vincent, R. C., *Global glasnost: Toward a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1992, p.231; Gellner, E., “Conclusions”, in C. Merridale & C. Ward (Eds.), *Perestroika: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1, pp. 231-237.

③ R.Koselleck, Einleitung. In O.Brunner, W.Conze, & R. Koselleck (Eds.),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Vol.1, pp.XIII-XXVII). Stuttgart: Ernst Klett Verlag, 1972, pp.XVII; R.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79, p.300.

④ C. Brylla, *Die schwedische Rezeption zentraler Begriffe der deutschen Frühromantik: Schlusselwortanalysen zu den Zeitschriften Athena'um und Phosphoros*.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2003, p.38.

作语言学实体，并追溯它们的发展历史；还在背景交叉的地方解释它们的社会动态。从本质上来说，概念史的方法是非形式主义的，因为它与某个特定内容相联系。在与一些不同形式的话语分析的对比中，科塞雷克的概念史倾向于处理一类有着明确定义的历史概念，即那些起源于启蒙运动，或者用科塞雷克的话说，18至19世纪中叶的当代社会基本概念。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许多关键词可以被视为当代社会的基本概念，这也是我觉得概念史的综合研究方法有效的原因。我的立场是不仅仅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概念当作基本概念，而且用比较的视角与基本的西方概念进行对比。

但是，科塞雷克的方法并不是毫无问题的。从方法论上说，他深入挖掘历史遗迹，从实际经验主义的意义上构建了这些概念。对人文科学的大部分学科来说，他的贡献是提供了一个卓有成效的矫正工具。但是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个不断上升的，理想主义的冲动。当他最终描述一个时期时，这些概念在一些情况下，往往会变成自发的施动者；它们自己创造历史，而科塞雷克是从这段历史中抽取这些概念的。这些概念拥有无所不能的品质，而且有着沦为解释某个现象的原因的工具的风险。^①

本文将探讨戈尔巴乔夫使用的改革苏联体制的概念。首先，将集中观察戈尔巴乔夫的表述，而非社会对这些概念的接受。^②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沉醉于一种苏联学传统，这种传统相对来说是不加思考地以垂直权力为出发点。我却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总书记的讲话不能与政治体系在实践中如何运作相分离。这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相反。^③本文的选择局限于这些核心概念。据我估计，这些概念构成事件过程中的工具因素。我对这些概念的适得其反的方面，即政治概念化的初衷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差异，特别感兴趣。

“改革”（Perestrojka）

① 有时不清楚概念的使用者或是概念本身是否有所作为。参见科塞雷克如何介绍“时间”概念及“保守主义”这一新词（Koselleck, R,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79, pp. 339, 341）。

② 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更为深刻地研究过戈尔巴乔夫概念的历史，关注它们的起源和最终消亡，但是甚少分别论述它们在苏联解体中的实际作用。然而那样的范围包括了概念化易被接受的方面。我还试图理解晚期苏联现代性的改良主义基本概念是如何在那时所谓的俄国后现代主义内部获得承认的。Petrov, K. *Tillbaka till framtiden: Modernitet, postmodernitet och generationsidentitet i Gorbacevs glasnost' och perestrojka* [Back to the future: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generational identity in Gorbachevs glasnost and perestrojka]. Sodertorn Doctoral Dissertations 11, Huddinge: Sodertorn University College, 2006.

③ Brown, A.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45.

“改革”是改革政策中最重要的标志，甚至成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代名词。“改革”（和“公开性”）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以一个直接借用词的形式出现，我将深入探究使得“改革”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概念的一些历史的和传记性的因素，然后调查对这些概念的使用在多大程度上反过来影响历史环境本身。

社会主义的（重新）建构

“改革”可以译为（对房子、组织、社会的）的“重组”或“重建”，也可以译为（对一种乐器或一个人的性格和态度）的再调和或再调整。这是一个以未来为导向的概念，同时也有回溯的余地。当该词于彼得大帝时期在词典上确立的时候，便与拉丁语词汇“修复（*restauro*）”相联系。^①“改革”从语义上来说，是在创造或恢复某种分别属于未来和过去的事物的意义上，对特定事态的干涉。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向前或向后的对立，成为苏联晚期发展问题的焦点。虽然“改革”在前革命的政治辩论中也扮演了一定角色^②，但其最大的作用还是总结苏联经验，特别是自斯大林治下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经验。当时，这个概念在一个充满强制工业化、意识形态标准化、动员、政治清洗和强制效忠的时期使用。^③如果你需要重组，你也只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构造自身，^④而且必须通过公开道歉或在劳改营里劳动的方式改进你的生活方式。^⑤“改革”意味着一种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潜在地否定或谴责某些发展趋势。然而，当对变革的要求产生于这种框架之中，这些概念的使用者用催生这种发展的相同命令来标记自己；从定义来看，答案和解决方案作为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内化于当前形势之中。和谐的前提始终存在于不和谐之中。

“改革”（*Perestrojka, перестройка*）就像许多当代苏联以“ka”为后缀的概念，产生于苏联时期丰富的语言学创新之中。这个词含有建造的隐喻，充分符合苏联时

① F.Polikarpov-Orlov, *Leksikon trejazycnyj Dictionarium trilingue: Moskva 1704: Nachdruck und Einleitung von H. Keipert. Munich: Verlag Otto Sagner. 1988, p.436, 517.*

② J.Jaroslavcev, *Liberaly. Ogonek, 1989, pp.39, 16-18.*

③ Л. Каганович. О перестройке массовой работы и партий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Под ред. Л. Кагановича. О перестройке массовой работы: сборник, 1935. С.92-136. Киев: Партиздат; Каганская. Марксизм и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С.117-155; О. Kharkhordin,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in Russia: A study of practices*,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СК ВКР(б) (1932, April 24). О перестройк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ЦК ВКП (б) от 23 апреля 1932 г. Правда.

④ AN RF: Институ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онца XX в.: Языковые измене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Фило-пресс, 1998, p.461.

⑤ 有一本半自传体的书详细描述了这种对劳改营中犯人的“成功”重建，参见：Зощенко.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й жизни.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36.

期的背景。在某些时候，苏联拥有世界上近一半的工程师，绝大部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拥有技术类教育背景。^①戈尔巴乔夫围绕着“改革”的概念来组织他的政策，这种选择由于苏联的生产力意识形态而获得合法性。

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刚夺取政权时，列宁就宣布是时候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将持续到一切准备就绪，开始建设无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通过将政策描述为对社会主义“建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的“改革”——这两个词有着相同的词根，строй，那么改革就需要一种一致同意的言外之意，在小范围纠正与改进问题上有一致的立场。最初，戈尔巴乔夫与传统精英之间没有明显的分歧，但是老道的苏联移民失望地预测到，将不会有本质上的改革出现，因为领导层还在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重建。相反，怀疑者提议建设一种超越苏维埃视角的新建（новостройка，建设一种新的）。^②但在稍后，能明显看出大部分人低估了“重新”（пере, пере）这个时髦前缀的能量。考虑到改革一词的概念包括相对和绝对、建设和摧毁的双重内涵，围绕如何翻译该词出现了一些争论，即是译成措辞较平和的“改善”（improvement），还是译成对苏联既有的社会、经济和历史进程的彻底“改变”（change）^③。

然而，戈尔巴乔夫对改革这一概念的运用会逐步否定事关苏联的生产力意识形态。他^④强调还原、修补、重估和再定位，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建”。^⑤这就与之前追求产量最大化的各项措施背道而驰，其中也包括之前那些假借改革之名的建设运动。早期的那些措施着眼于未来，但却毫不考虑对生态造成的影响、人类需求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群体经历的多元化。

戈尔巴乔夫因而创设了一项新的政治进程，旨在重建、还原、改造和重新接受在那时因被谴责、被消灭、被忽视而未完成的上述种种事项。戈尔巴乔夫勇敢地承认，错误的长期积累已达到了临界点。然而，这场回归运动随即遭到来自几个方面

① Graham, L. R., *The ghost of the executed engineer: Technology and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73; Graham, L. R.,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Russian experie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71.

② Бабурин, В.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Радио свобода: <http://www.svoboda.org/programs/HR/2002/HR.040302.asp>

③ Lapidus, G. W., & Mel'vill', A. (Eds.), *The glasnost papers: Voices on reform from Moscow*,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30.

④ Горбачёв,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XXVIII съезду КПСС и задачи партии, 2 июля 1990 г.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0. С.11, 14.

⑤ 在计划经济中，首要目标是完成计划（“增进”），而非是调整（“重建”），因为后者在生产能力表中不得分。至于对指令经济片面地关注积累，数量和增长——赤字、资源浪费以及低质产品制度化——的描述性分析。作为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较早地评判了苏联经济中的无限支出、总额关注、忽视消费者及数据修饰。

的质疑。传统人士认为，损害苏联传统的金科玉律是危险的^①。那些流亡的苏联政府的批评者则认为，回归过去，看似一种防守策略，却意在将改革与巩固苏联遗产联系起来^②。然而，改革蕴含着以重建为目标的结构性需求，意味着那些过去与资本主义挂钩的“不合理”的因素应该被认定是社会主义的。^③改革就这样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留下了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制度缺陷。

对过去的重建同样改变了苏联人对未来一词的理解。有迹象表明，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初期，他在谈论中不再提到“共产主义”^④，而是重复表示改革有其内在价值^⑤。等在剧变之后的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改革^⑥。这种对改革概念的特殊运用，因此发挥出彻底的反对苏联的功能，因为其使得未来变得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而在以前，未来告诉人们，当前的各种缺陷是有必要的。苏联人的注意力转向迫切要求对现状进行彻底的改变和纠正。

历史紊乱

早在戈尔巴乔夫^⑦成为第一书记之前，他就已将改革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使用。为何他偏爱这个词，并区别于它的本意，喜欢赋予它一个更有人情味的运用？为何一个省级官僚会变成大改革家？

首先，戈尔巴乔夫并不类同于其他苏共领导人，他的教育背景不是技术而是法律^⑧。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政治前途始于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戈尔巴乔夫和他同时代

① Андреева, Н. Не могу поступиться принципами//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март 13, 1988. С.3. А.

② Kurav, M. "Perestroika: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past or the invention of the future?",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2(90), 1991, pp.227-236.

③ 在马克思（1991 [1867/1890], pp. 162, 454）概念中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其中暗含了理性的过程，人们通过更自觉地使用技术来发展其工作。列宁（1962 [1917], p. 309）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残余的“非理性”因素只能被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废止，因为后者的计划和统一的特征不允许任何因为例行公事、偶然或者分裂竞争的浪费。可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媒体不再关注社会主义建设，但内在的问题和缺陷让其沉没（Mcnaair, B. *Glasnost, perestroika and the Soviet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64）。

④ “共产主义”一词使用频率的减少在戈尔巴乔夫（1987-1990）的索引中得到反映。

⑤ Hosking, G. *The awakening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Heinemann, 1990, p.138.

⑥ Горбачёв, М.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неотложна, она касается всех и во всём.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 4, стр. 35-52).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

⑦ Горбачёв, М. Новому методу-широкую дорогу.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1, стр.154-15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

⑧ 与其他系相比，法律系的课程相对比较多元。教材除了有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读本的原文之外，还包括了一些西方思想史名著的选节，如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罗马法和美国宪法（Remnick, D., *Lenin'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p. 159）。

的优秀代表一样，证实了斯大林之死给他们带来的集体冲击^①。这种加剧的中断感反映出更深层次的不确定感，这种感觉最初由改革进程对社会结构带来的损害造成，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②。这些无法改变的损失迫使这代人在缺乏指导的条件下进行自我探索。有人可能会想到，在当时，斯大林之死为戈尔巴乔夫那一代人留下了真空，使得他们之中的部分人能够创造出一种氛围，最终通向新型文化和新型政治^③。从这个角度看，解冻是一种催化剂，解放并在短时间内满足了年轻一代内心的期待。自由主义的暖风在这个动荡的国家唤醒了一种目标感。勃列日涅夫掌权后的布拉格之春，民主社会主义之梦被粉碎，又让人们经历了一场重大退步。在新的更为冷酷的氛围中，这代人解冻的希望成为政治不可能，只能保持缄默。当在 80 年代改革的气息被辨别出之后，这代人从睡梦中觉醒，重新开始了曾在 50、60 年代的对自由的呼唤。有关无差别的社会主义的愿景成为真实的追求，60 年代的这批人也已身居高位，有能力在政治上推动理想变成现实。

60 年代这批人的经验世界因而也可以说暗藏着一种与历史保持一致的探索。经历过短暂而积极的解冻阶段，又历经了截然不同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他们的视角有一定的历史紊乱性。这种感觉似乎激发出对意识形态重建的不同前景的不断识别。改革因而看起来是一种永久的关乎存在的状态。所以改革政策不仅是手段也是归宿。改革一词的意蕴出自一个概念，即时间是紊乱的，由此滋生的欲念是要将历史推回到它正确的轨迹上去。

有了这层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或许会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与形容他是历史的“奥秘”和“谜团”等看法恰恰相反^④，这些观念看到了戈尔巴乔夫有意识地坚持本意为增强国力的改革进程的做法存在不合理性，但该进程加快了帝国走向解体的速度。

戈尔巴乔夫藉由一个理想化的过去迈向未来，借助各种隐喻例如“还原”

① 戈尔巴乔夫对二战爆发、斯大林之死、赫鲁晓夫新社会思潮的记忆，本质上同解冻时期那一代人中最典型的代表相似，这表明了一代人共享经历的影响（Cf. Alexeyeva and Goldberg 1993 [1990], pp. 3f）。

② Suraska, W. Gorbachev as a postmodern hero. In B. Strath & N. Witoszek (Eds.),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Perspectives east and west*, Amsterdam: Radopi, 1999, pp. 243-261.

③ 我对解冻时期那一代人个人情况的存在主义和心理学分析解读，受到了 Toews 对早期黑格尔哲学经验世界研究的启发。他描绘了法国大革命背景下历史中断的感觉，这种断裂性是与父辈的世界完全决裂，革命不可逆转地为他们开启了全新的体验。在解冻时期那代人的身上，我也感知到了一种间断性，然而，这种间断性却源于他们的无力感，他们最重要的努力和希望最终都归于沉寂。参见：Toews, J.E, *Hegelianism: The path toward dialectical humanism, 1805-18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11.

④ Castells, M,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End of millennium. Malden*, Vol. 3, MA: Blackwell, 1998.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更新”(обновление)和“改革”。这种回溯的方法类似于宗教表述，都是预先假设，一个理想化的过去被歪曲了，因而需要重新恢复过去。对宗教改革运动而言，这是在审判日到来之前为个人寻找改善自身的历史机会的问题，以返回被教皇掩盖起来的纯洁的本初世界的方式实现。作为一个“60年代的人”，通过对苏联传统的教条和假设的历史修正，他所朝向的是一个与盛行于苏联宣传中的未来不同未来。

“改革”的概念使得过去与未来在当下得到短暂的调和，在这条道路上高贵的初衷已经变形。通过确认这些偏离，并去除其神圣性，人们可以从混乱的立场中回归，并循着可能的发展道路前进，虽然这种道路在苏联历史中从未被实现过。

社会主义的解构

对列宁来说，社会主义存在于未来。关于社会主义的真实知识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实现来获得^①。戈尔巴乔夫希望的社会主义似乎存在于过去。戈尔巴乔夫从一种他视为“正统”的社会主义的角度批评“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获得了一种更加乌托邦主义的隐喻。戈尔巴乔夫^②力争一种对于列宁后期文本扩展的思考，这可能反映了更强烈的妥协意愿，还有对于政治体系批判的尝试。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妥协能够成为对未来有指导意义的一个模型。巴尔戈乔夫更倾向于布哈林的恢复政策，及其如何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理想。

戈尔巴乔夫开始谈论体现在苏联体制中的不同“变形”^③，并将其与一种假设的原始社会主义“思想”相比较。虽然戈尔巴乔夫因为在执政后两年采取的暧昧态度而臭名昭著，但他对于“改革”的定义却越来越大胆。他从这个概念中抽离的意思

① Souvarine, B, “Ideology of Soviet communism”, in P. P. Wiener (Ed.),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 (Vol. I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74, pp. 560-564.

② Gorbachev, M. Speech in Vladivostok.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 4, стр. 9-34).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С.34; Горбачёв, М. Октябрь и перестройка: Револю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5, С.386-436).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С.398.

③ Горбачёв, 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перестройке-идеологию обновления.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6, С.58-92).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С.65; Горбачёв, 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дея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С.13; Горбачёв,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XXVIII съезду КПСС и задачи партии, 2 июля 1990 г.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0.С.38f.

是“分裂”(ломка)、“否定”、“否定之否定”和“拆除”(демонтаж)^①。而后的这些含义原本是保守派对改革的轻蔑批判。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助手一开始就完全忽略了将“改革”翻译为一个否定和解构的过程^②。但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以一种线性的过程概念继续下去变得不可能了。

解构的目的，是社会即中央集权和威权主义特征的变形。但是，社会主义改革的议程被苏联本身是否能够存在的怀疑所掩盖了，这就产生了新的隐喻，即革新和恢复又变成了主导。^③只有存在将社会主义作为评判基点的共识，解构的隐喻才能发挥作用。当社会主义本身受到批判，谈论变形就毫无意义了。

随着苏联的崩溃，“改革”和其他重要概念被从政治地图上抹去。这些概念被用来包含各种分歧越来越大而相互矛盾的意见，这些概念随着事件的进展而扩展。这种概念的一般化条件不仅存在于作为基本概念的民主化和普世化倾向之中，用科塞雷克的话说，还存在于“改革”作为外部结构转型和内部具体重新定位的双重含义之中。最后这些概念达到了包含社会生活积极和消极方面的程度。^④但在随后的阶段，当苏联分崩离析时，这些概念完全没有表达任何意义。

1990年，一群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哲学家诙谐地建议，俄语中的“改革”可以被翻译为法语的“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个词由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分析西方思想史的威权主义文本时创造。即使在苏联哲学家的建议背后并没有什么理论主张，德里达于1990年春天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及以后，仍试图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他自己的“解构”之间可能的联系作为一个主题进行研究。^⑤他的结论是，即使两者有些有趣的相似之处，这两个词只有在有一些重要保留的情况下才是

① Горбачёв, М.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С.49; Горбачёв, М.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и делами углублять перестройку.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5, С.208-220).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С.210; Горбачёв, 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перестройке- идеологию обновления.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6, С.58-92).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С.66; Горбачёв,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XXVIII съезду КПСС и задачи партии, 2 июля 1990 г.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0.С.8.

② Правда, Принцип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сть мышления и действий.1988. апрель 5.С.2.

③ Гообачёв-Фонд.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га: Док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о политике М. М. Горбачёва по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хранению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 апрель -85, 1995.С.186; Sakwa, 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1917-1991*, London: Routledge, 1999, p.473.

④ СК КПСС. The last party program [excerpts of the draft to the last party program of the KPSS]. In R. V. Daniels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in Russia: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3, pp. 379-383.

⑤ Derrida, J, “Back from Moscow, in the USSR”, in M. Ryklin (Ed.), *Жак Деррида в Москве: Д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Москва: РИК, “Культура.”1993.С.51ff; Derrida, J., et al. *Философия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Беседа с Жаком Деррида*. В Под ред. М. Рыклина, *Деррида в Москве: Д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Москва: РИК, “Культура.” 1993.С.165ff.

同义词。^①另一位是被德里达的论述影响、并继续这个主题研究的俄裔美国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爱泼斯坦 (Mikhail Epstein)。对他^②来说,“改革”可以被视为解构,因为其开始了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毁灭。“公开性”和“改革”显示,社会主义能够通过随意展示自身缺乏语义学内容而完成自身的毁灭。^③当“改革”到达包含全部现实的阶段时(公开性则包含了全部立场),官方意识形态就达到一种普世的位置,并溶解了所有特殊的立场。“改革”所带来的创新在这种基础上获得了确认,即改革同时属于一种古老和一种不兼容的结构,此种结构意味着一种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又极力将对手融入自身。戈尔巴乔夫时期这种普世而完整的意识形态,足以兼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性质。^④当“改革”发起时,十月革命所开启的意识形态的扩展达到了量上的极限。按照爱泼斯坦的说法,一种似是而非的去意识形态化开始了,这与持续的意识形态化成反比。这里的去意识形态化应理解为意识形态的特定身份残余的消失(比如,其特定的阶级特征)。当这种意识形态开始包括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时,就很明显了。^⑤因此,我想说,在其他事物中,“改革”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地扩展,使更多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化了,而付出的代价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初的具体特征。爱泼斯坦在1991年确信,这个极权主义国家正是利用反映在当代社会危机中的意识形态的空洞内容,才稳固了它的权力。他没有意识到,更广泛的概念使用将成功地破坏这个体制的权威。

① 德里达解构的并非文字本身,而是文字含义中的极权主义主张。他的目的是重构一种不同的含义。相应地,“改革”并不是对于体制的破坏。通过“改革”,戈尔巴乔夫寻求表达分歧的各种方式,并以此为资源改革这个体制的前提。但可以看到,德里达不愿将去建设化和“改革”视为同义词。戈尔巴乔夫“否定之否定”的观点针对的是黑格尔“创造”和“克服”的概念,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德里达的观点。

② Эпштейн, М. К философии возможного: Введение в посткритическую эпоху//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6.1999. С.65.

③ Epstein, M., “Relativistic patterns in totalitarian thinking: An inquiry into the language of Soviet ideology”, in P. McNerny (Ed.), Occasional Paper, 243. Washington, DC: The Kenn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ussian Studies: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91, p.4.

④ 虽然爱泼斯坦的分析很好地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妥协意识形态的矛盾本质,但他倾向于将这种意识形态与历史背景相分离。指令性经济的构想来源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一战期间一致的大规模生产。(Ленин, ВУдержат ли большеви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власть?//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4.С. 287-33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2. С.309) 确实,爱泼斯坦的评论将自身卷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论之中,即苏联是否代表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支持者将苏联官僚阶层视为一种新而有力的统治阶级,因为对劳动工资的保护,剩余价值的积累,持续的剥削和工人阶层的异化,以及为了与外部世界进行军事竞争而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和解等。但是所有这些条件都只是资本主义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一份批判研究调查中,霍华德和金(Howard and King, “‘State capit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 34, 2001, p. 123)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假设在分析论上是愚蠢的,因为其理论应用从属于它贬义的谴责性作用,更不用说其掩盖了苏联体制的独特性。

⑤ Epstein, M., “Relativistic patterns in totalitarian thinking: An inquiry into the language of Soviet ideology”, pp.76f.

改良的革命 (Reforming a revolution)

从语义学上说,“改革 (perestrojka)”可以被视为表达一种改良 (reform) 的概念,在其自身包含的建筑学寓意中,它表示“继续他人已经建设了的”,与改良主义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渐进改良类似。^①在执政一年后,戈尔巴乔夫开始觉得将“改革”说成是改良主义更为合适。^②他向他的听众保证,现在还有争议的改革将会是“革命性的”而非“进化的”,“羞涩的”或者“缓慢的”。^③人们必须意识到改革的概念从整体上假设了一种苏联式修辞所隐含的立场,但当领导人需要利用它作为针对反对者的词语而滥用时,这种立场就不存在了。“改良主义”可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 (Alexei Kosygin)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进行的经济改革的失败相联系。^④确实,改良主义可以更明显地与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派意识形态,特别是被镇压的 1968 年布拉格之春所开启的民主化进程相联系。^⑤

因此,当改革的概念被用作为一个主导性口号时,便也被加上了消极的含义。阿奇·布朗 (Archie Brown) 证明了为什么“改革”适合作为一个新计划的象征。这个概念的模糊性和否定含义的缺乏,最初使得保守派和改良派都认为其具有可行性。一些人可能认为这个政策是“对上层建筑温和的修补”,其他人则选择将其视为对于整体结构的重建,从头开始建设。^⑥这完全符合“改革”相对而又绝对的改变的含义。“改革”可以指“扩展”,“重建”和“建设新的”行动。^⑦所以其同时拥有保守和进

① Bernstein, E. Der Kampf der Sozialdemokratie und die Revolution der Gesellschaft. *Die NeueZeit*, 16, 1897-98, p.556.

②就笔者所能判断出的,戈尔巴乔夫首次将“改革”一词用于其政策是在 1986 年二月末三月初的苏共二十七大会上。因此,他避免了在其完整担任总书记的第一年中使用该词。当他推出“彻底改革”的共产党经济政策时,他引用了列宁的一段文章。列宁将后革命社会不受约束的从事革命,评论为最适于“彻底改革”一词。这样一来,戈尔巴乔夫对这一概念的引入就会较少受到争议。

③ Горбачёв, М.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С.48.

④ Brown, A,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4.

⑤ 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区别在 20 世纪初就有定论。布尔什维克将其名称从“社会民主党”改为“共产党”,并对资产阶级秩序采取强硬态度。在他们的革命力量中,他们与改良主义倾向保持距离。改良主义首先出现在法语中,但可能在德语中最多,最后也出现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中。第二国际这种分裂的源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在更大程度上容忍资产阶级的秩序——这突出表现在他们在一战时投票赞成战争债券。在斯大林时期,人们被教育是革命而非改良能够取得政治成功。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应通过革命性转变来建立,通过改良主义者渐进改革的方式是无法实现的。

⑥ Brown, A, *The Gorbachev factor*, p.124.

⑦ Даль, В.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3).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ВА М. О. Вольф, 1907.С.912; АН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Т. 9). Москва: Изд. АН. 1959.С.216.

步的含义。其模糊的前缀使得用一种温和的，革命性的，偶然的而又绝对的方式解释这个概念变为可能。因此，此概念的模糊性可能反映精英们的利益，并同时引发对于这个概念的应用多种不同的批判。正如布朗^①说强调那样，正是这个术语在严苛的苏联式语境下的中性特征，使得对变革的管理成为可能。同样也是这个术语的模糊性给予了发展以综合性的语义连续性。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所发生的激进的、创新性的、停滞的抑或甚至是反动的过程都可以被改革这个概念所认可。

然而，当改革概念本来含义的谨慎恢复逐渐达到了苏维埃体系无法满足的程度时，所需的答案就只能到苏联传统之外去寻找。审视亚历山大二世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大改革^②、马列主义同十九世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和修正主义的关系^③、西欧坚持中间道路的党派^④以及瑞典模式^⑤，这些都已成为习惯的做法。然而，国内改革的参照物数量太少，并且受到禁锢。当外国模式被引入议程之后，苏联原本自给自足的一套概念就被逐渐地削弱了。与此同时，那些改革概念所要求的前提条件——用以支撑内部系统改革的意义——也受到了破坏。

矛盾在于，戈尔巴乔夫^⑥在同一时间坚持认为改革最重要的同义词是“革命”（其政策是要“完成”十月革命）。他于 1986 年夏开始使用革命的隐喻^⑦。几乎同时，改革获得更加宽泛的意义，并逐渐取代了加速（uskorenie, ускорение）成为主导性概念。戈尔巴乔夫肯定地宣称改革是在其自身意义上的一场“革命”，但他同时暗示这是在另一场革命（十月革命）中的一场革命。这种将改革定义为一场巩固革命的革命的语义学背景也在革命这一概念的发展史中被反映出来了。

革命的概念最初被用于天文学。当它在近代早期被用于政治学时，其周期性和自然性的特征得以保留^⑧。即便此概念在法国大革命时褪去了过去的含义，并且被转

① Brown, A, *The Gorbachev factor*, p.124.

② Шляпентох, В. Александр II и 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ёв// *Время и мы*.97.1987.С.104-122.

③ Ципко, А. Хороши ли наши принципы// *Новый мир*.4.1990.С.173-204.

④ Перегудов, С. Фактор Горбачёва и '8216'систем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8217'// *Полис*.6.1996.С.129-135.

⑤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一年，其长期支持者但那时已对其不抱幻想的雅科夫列夫私下里问他是否能指出世俗世界中真正的社会主义例子。戈尔巴乔夫犹豫了一会儿但给出了答案：“瑞典”。

（Yakovlev, A. Speech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wedish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ussia,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Stockholm: The Swed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3, March 18)）。

⑥ Горбачёв, М.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С.46f.

⑦ Горбачёв, М.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неотложна, она касается всех и во всём.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4, С.35-52).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С.37.

⑧ Koselleck, R., et al., “Revolution, rebellion, Aufruhr, Bu`rgerkrieg”, in O. Brunner, W. Conze, & R. Koselleck (Eds.),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Vol. 5).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4. pp. 653-788.

化成为一种绝对的、由人所发动的变革的标志，它原来的含义仍然不时地再现实化（re-actualised）。比如在法国和俄国革命中被作为新时代的制度化^①、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以及葛兰西关于革命与复辟之间存在钟摆效应的消极革命观点。

在苏联公民作为行为基准的经验性框架中，革命的时代意义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我看来，使用葛兰西的消极革命概念具有一定的意义，虽然其解释力可能受到削弱，因为它本来是用于解释早期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条件。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将其“革命性改革”定义为对某些失去之物——一个更人文、更温和、更实用的社会主义的老式布尔什维克观念——的“恢复”。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反思以及在变换意义上的周期性特征，是某些批评家可以参考的东西，借此他们可以确认政策缺乏它所宣称的非常进步的内容。

但是，无论是否有意，革命性的修辞显得同改革性的修辞一样不确定。正统的共产主义者可能会把将改革和革命划等号的做法视为反革命的，因而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令他们相信自己并未将改革和十月革命看成一回事，即便他自己坚持将其看作革命。通过引证列宁，戈尔巴乔夫指出，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发生的那些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必然伴随着几十年的反复巩固过程，以显示其历史意义并巩固进步阶级的权力。如果社会主义必然优于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评论道^②，那末它可能非得好好地走完几个革命阶段。通过这样的类比，改革可以被理解为在巩固十月革命意义上的革命。这样，戈尔巴乔夫就成功地回避了批评——它们来自于那些对改革是新革命的说法持怀疑态度的人，同时也使得迫在眉睫的改革的革命范畴正当化。

即使改革因为与十月革命——所有事情的源泉——相联系而被赋予了正当的涵义，后者自身却又失去了其本来的价值，其意义变成了改革结果的函数表达式。这种“贬值”又会间接地影响改革。如果“世界历史上最具有显著意义的一件事情”没有了曾经被承认的能左右一切的影响力，而可以与之相对地被视为葛兰西^③所描述的那种被动的、长期的且需要连续“重建”的革命，那么苏联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空心的了。按照葛兰西的说法^④，被动革命太弱小，以至于不能完全驳倒其反题，因而就在某种程度上注定要带上过去的瑕疵和问题。对葛兰西而言，持续巩固是被动革命的必然结果。十月革命正是缺少了葛兰西所坚信的那种群众参与，而这样的

① Koselleck, R.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79, P.341; Cohen, I. B., "The eigh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 1976, p.259..

② Горбачёв, М.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С.47

③ 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Electric Book Co. 2001, p.308. Available at: <http://site.ebrary.com.ezproxy.ub.gu.se/lib/gubselibrary/Top?id=10015105&layout=document>.

④ *Ibid*, pp.287, 294

参与是清晰明确的进步性剧变所要求的。当后来的苏联公众开始聚焦于民主授权缺失的问题时，改革的设计者们发现，自己居然只有更少的空间来施展拳脚。

戈尔巴乔夫持续地试图说服苏联人民，体制的改变是 20 世纪 30 至 70 年代错误政策的结果。通过对 20 年代已经成型的一条发展之路的重建，就有可能实现十月革命的真正抱负并使之驶向更好的未来。

然而，十月革命出乎意料的失去价值，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这个事件看成是毫无希望的困局。现在是时间恢复一些革命前的价值——它们可以使得俄罗斯回到文明和正常^①。

具有历史性讽刺意味的是，戈尔巴乔夫为自己对社会的社会主义基础进行的关键性重建所取的名字与斯大林当年所使用的相同。戈尔巴乔夫^②不仅重新使用了“改革”，而且其政策的定义也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个概念来自于伊曼努尔·康德^③，但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手，在两人于 19 世纪 50 年代批判与路易·波拿巴相联系的盲动主义时被赋予了特别的涵义^④。在苏联的语境下，这个概念主要是与斯大林相关，当时它被用来表示实行计划和命令经济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跃进^⑤。如果对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的革命性清算（没收非法占有者的财产）和对贫农的强制性集体化被认为是否定的最终否定，通过窃用熟悉的术语，戈尔巴乔夫将从特洛伊木马的立场来否定这种斯大林式的归纳，并且恢复非常个体化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在早先被谴责为资本主义的壁垒。不得不说，这匹马被证明为潘多拉魔盒，就像我不久就将更深入阐明的那样。具有启发意义的是，戈尔巴乔夫对“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个譬喻并不感到非常舒服（他在引入这个术语时所作的许多保留都表明了这个事实）。然而，他似乎坚持使用它，以便将改革作为一个有指导的过程加以推进。但是，与斯大林政策不同的不仅是内容。戈尔巴乔夫意在开启一个社会必须跟随与发展的过程。^⑥信号将从上面以禁令的形式发出。与之相反的是，对斯大林而言，这

① Cooper, J, “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deconstruction”, in C. Merridale & C. Ward (Eds.), *Perestroika: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1, p.166.

② Горбачёв, М.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С.52f.

③ Koselleck, R.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79, p.78.

④ “波拿巴主义”指武装反革命者夺取政权，并交替采取民粹主义和独裁措施以中和阶级斗争。

⑤ ЦК ВКП(б). История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Москва: Изд. ЦК ВКП(б) “Правда.”, 1938. С.291f.

⑥ 戈尔巴乔夫长期以来一直坚信党肩负着社会领导力量的特殊使命，但是他早先强调党只“引入了”新思维和“提议”政治变化。他认为先前所有知名的革命都有一个缺陷，即它们本身没有成功转变为“底层”革命。但这却是现在所发生的，因为“底层”大众将拥有“所有的民主权利并开始习惯性地、称职负责地实行这些权利。”（Горбачёв, М.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С.54, 56）

是引入新规制并在每个层面上监控其执行情况。

但是，正如社会不接受其对“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定义这个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戈尔巴乔夫并不能逃出隐藏在他所解放的概念中的权威的含义。戈尔巴乔夫企图解放的自发性——颇具悖论意思——被上面所控制。然而，当领导层声称他们需要社会金字塔底层时，后者必须继续把改革进行下去，这样的观念在1989年被乌克兰的近四十万苏联矿工以字面含义加以理解。以“自下而上的改革”为名，他们发起了自1920年代以来的苏联的首次罢工。这次自发的运动演变成了一场民众运动，英雄般地挑战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产思想，并因此实现了布哈林的长期遭受批判的“工业民主”概念^①。在直接指导和自行发展的支持者之间进行的关于改革意义的竞争，强调了改革内在的概念矛盾（正如前面所说明的那样）与关于其解释的社会论争之间的辩证关系。

这次罢工还表明改革自身的不一致性。至此为止，改革对不同的阶层采用不同的标准。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这对知识分子意味着公开性，对工人却意味着纪律（加速）。即使罢工的需求在很多情况下回应了改革的精神，它们仍然将一枚楔子打进了体制的正当性之中。罢工部分地证伪了自上而下的革命原则，根据这种原则，人民是可以被外在的命令以不对称的方式加以塑造的被动者。罢工用运动的激进成分对改革、对讨论和批评的鼓励作了补充。变化可以自下而上地发生，并且民主化和公民积极主义的主动权不再是仅仅攥在国家手中。从此以后，两极化的趋势开始成形，不仅在知识界的和工人的改革之间，也在国家的和人民的改革之间。

罢工还证明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很多方面已经适得其反，作为一种在国家和公民主动性之间摇摆的中庸之道，戈尔巴乔夫改革依靠的是这种对于“改变”模棱两可的定义。一方面，在党内腐败和改革遇到阻力的环境下，罢工者对官僚组织的批评减少了戈尔巴乔夫政策所受到的阻碍^②。另一方面，矿工的罢工构成了一次并不希望看到的先例，在分裂的加盟共和国手中成了一件爆炸性的武器。

公开性

与戈尔巴乔夫相关的最著名的概念中，第二个便是“公开性”（Glasnost', гласность）。公开性代表开放（openness）或公共宣传（publicity），但是由于其与教会斯拉夫语有词源关系，glas, глас（声音）被翻译成“有声性（vocality）”或“声音

^① Friedgut, T, “Perestroika from below: The Soviet miners’ strike and its aftermath”, *New Left Review*, 181, 1990, p.31.

^② *Ibid*, p.12.

性 (voiceness)”。在过去二百年间, 这个概念在俄国讨论中有时扮演着非常显著的角色。它在 19 世纪 50 年代那些厚杂志里变成了一个丰富的概念, 不但是对于西化者, 而且在斯拉夫主义者以及那些为 19 世纪 60 年代大改革打下基础的自由派官僚中也是如此^①。在苏联时期, 作为党内一种对开放性和自我批评的需求, 同时也作为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再教育的先决条件, 这一概念被列宁主题化了^②。在斯大林时期, 其被颠倒成为公众参与法庭审判的扭曲性原则。公开性给予原告一种被明确认可的将公众的愤怒导向被告的可能性。它提供了一个展示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打击其它观念、向公众灌输恐惧的理由, 从而使得工人严守纪律, 正如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所说那样^③。尽管其有着官方的苏联历史背景, 这个概念还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人权运动中被重新使用, 并因此成为了颠覆性的武器。在公开性的名义下, 一个人可以站在国家自身原则的立场来批评国家^④。1977 年, 勃洛日涅夫试图通过将其整合进新苏联宪法的办法来消除其潜在的激进主义。

由于这一概念用途广泛, 因而承载了隐含的紧张状态。公开性是更为人道和法治社会的象征, 同时却也为专家治国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⑤。这是自相矛盾的公开, 矛盾的两方面都隐匿于对真理的绝对要求之下, 并都成为完善的宣传工具。与其他现代的基本概念相似, 公开性面向未来, 虽然它也同改革一般, 仍与过去理想的民族国家有关联性^⑥。戈尔巴乔夫^⑦在一次关键性的演讲中利用了这种可能性, 他赋予

① Belknap, R. L., “Survey of Russian journals, 1840-80”, In D. A. Martinsen (Ed.), *Literary journals in imperial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01; Lincoln, W. B., *In the vanguard of reform: Russia's enlightened bureaucrats 1825-1861*,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② Ленин, В. Что делать? В Под ред. В. Ленина.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6.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59. С.138; Ленин, В. Очередные задачи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6.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2. С.149.

③ Гласность суд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 Под ред. Б. Введенского,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11.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ние. ‘8216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52. С. 488.

④ Alexeyeva, L., & Goldberg, P, *The thaw generation: Coming of age in the post-Stalin era*,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3, pp.108f, 120.

⑤ Ленин, В. Очередные задачи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36). Moscow: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2. С.149; Lincoln, W. B. *The great reforms: Autocracy, bureau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change in imperial Russia*.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4; Сахаров, А., Турчин, В., и Медведев Р. Письмо А. Д. Сахарова, В. Ф. Турчина и Р. А. Медведева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 парти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 Р. Федосеева, Собр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ов самиздата (Архив Самиздата) (Vol.5). Munich: Research Department, Radio Liberty, 1973, p. AS 360.

⑥ 索尔仁尼琴在回应 20 世纪 60 年其被逐出作家协会一事时说, 从真正人性的角度来说, 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开放的名义之下。与西方虚伪的政治权利相反, 亲斯拉夫的康斯坦丁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将开放视作人类的权利, 假定在圣彼得大帝前的俄国精神世界里已能行使这种权利, 那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将建立起一种天然的联系。

⑦ Горбачёв, М.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и делами углублять перестройку.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5. С.208-220).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С.215,218.

了这一概念显著的怀旧色彩的释义：公民应该“大声”揭露过去的真相。

随着公开性的引进，社会氛围得到了本质上的改变。虽然通常被翻译为公共开放，公开性在语义层面上并没有暗含任何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差别，^①因为其不指“公众”，公众一词已被预设为更紧密相关的“публичность”来表示。这可能促使了所谓俄罗斯厨房文化的新公共领域的突然绽放。而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这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合法公共领域空缺的状态下完成的。在某种意义上，“公开性”是对于公民自决的实践，因为其预设了词语自由流出声腔的表现。它假定真实声音是具体存在的，而不是像“言论自由”一样，仅仅是一个消极的概念。这一消极概念要求政府不要对个人的自由表达进行干涉。因此，公开性可以被视为一个扩展的过程。其最终不是对个人的保护，而是对权力机关和公民的一种命令——更多的出版和讨论。官方编撰的《简明政治词典》（«крат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第六版^②对公开性的定义是“最大程度的公开和坦诚。”因此，任何意图隐瞒真相的人都是不够公开的。所以很有可能说，这一概念的本质中就蕴含着将跨越领导人试图强加的限制。事实上，公开性使得民族意识及各共和国方面独立的需求得到公开宣扬，这一概念与官方支持者的本来意图（巩固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大相径庭。

公开性与自 19 世纪早期以来作家及作品习惯性地俄国文化中享受的崇高地位有关，这与俄国和苏联政府的文字统治相一致，即使用文字统治的技术和勾勒虚幻的现实。举例来说，这种政府的文字统治已经在臭名昭彰的审查制度的长期传统、以及政权通过意识形态标语转变现实的信心中体现出来。一些评论家认为，改革政策无法成功的原因，可以用俄国人偏好用理论表达情势而非做出实践上的改变^③来解释。在爱泼斯坦^④看来，苏联社会迟早将会充斥着无所不在的公开性，因为文字生产的最大化将是这种政府文字统治的自然之道，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以词语为中心的发展。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巩固了俄国和苏联的传统观点受到的逆向解读的挑战。玛利亚^⑤则断定公开性的引入使得苏联掀开了神秘的面纱，这与传统的数据失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真相打破了维持苏联体制的政府文字统治的魔咒。

这些对立的观点是公开性概念所隐含的俄国与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紧张

① Случевский, В. Гласность. В Под ред. К. Арсеньев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 16).1893.С. 820.

②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 3),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180-280.

③ Moskovich, W., & Mossman, E., “Changing patterns of Soviet political discourse: 1985 to the present”, In K. Armes (Ed.), *ISCIIP Publication Series*, 7. Boston, M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 Ideology & Policy, Boston University, 1991, pp.2-5.

④ Эпштейн, М. После будущего: О новом сознани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Знамя.1.1991.С.230.

⑤ Malia, M., *Russia under Western eyes: From the bronze horseman to the Lenin mausoleum*,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07.

状态的症状。苏联解体后，公开性从政治议程中消失。制度化的言论自由好似不需证实公开性意指的那种自相矛盾的公开，尤其是因为后一概念显然只同后苏联的俄罗斯已经撇在身后的旧体制改革相联系。公开性政策能够提炼为言论自由的想法不仅在苏联解体后，而且在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也明确提出过^①。激进的政治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②同样将 19 世纪六十年代的公开化政策定义为在没有真正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官僚政治的替代品。

据布朗^③所说，戈尔巴乔夫周围的圈子认为公开化是他们给予人民的恩赐而非人民本可索求的权利。人民得到上层批准通过公开言论提出想法，而党的领导人能够同时利用这种声音作为合法批准经济措施的工具。在 1987 年，正如布朗所留意到的，公开性已经逐步演变，包括了下层人民宣扬与改革派领导人理念不相容观点的运动。

然而，随着新观点通过公开讨论展露，旧观念的存在已成为不可能，苏联经验世界的连续性似乎将会被打破。现今的定位地图不断过时。但对苏联现实的史料编纂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因此而使得历史知识无效。反之，对反现实历史的可能性预计却与苏联计划推动的未来方向背道而驰。如果俄国的文学自由没有被废除，20 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哲学家们没有被驱逐，那么又会发生些什么呢？斯大林的恐怖行动如何真正影响到苏联的精神状态呢？俄罗斯人本质上是否仍是苏联人民？到什么程度才有可能恢复在 1917 年中止的“常态”？

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让人民讲出过去的真相来改变未来，但是真正转变的是现在，这不是被灌输早期苏维埃自由化精神的当权者所希望的。相反，现政权的建立是一个历史错误的观点越发成为定论^④。20 世纪三十年代的恐怖专制和 20 世纪七十年代指令经济的停滞似乎越来越成为体制固有的部分，这促使了现时启示情绪的压抑，为每日艰苦的积聚提供了黯淡的背景。20 世纪二十年代理想化的经济和文化自由无法抵消三十年代斯大林时期的衰退。体制的缺陷成为现在而非过去的一部分。^⑤

① Benn, D. W., *From glasnost to freedom of speech*,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2.

②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Письма без адреса. Москва: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83.

③ Brown, A., *The Gorbachev factor*; p.125.

④ Clark, K., “Changing historical paradigms in Soviet culture”, In T. Lahusen (Ed.), *Late Soviet culture: From perestroika to novostroik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00.

⑤ 这在批评政权的海报艺术上得到完美的展现，这些海报艺术影射了早先成为禁忌的该国历史上的不同时刻。瓦加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ганов, Ваганов, А.,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1929. В Под ред. Д. Волкогонова и М. Аввакумова. Сталинс нами?.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 Панорама, 1991.С.2）对斯大林主义影响的符号表现，“Kollektivizacija 1929”，暗示了斯大林和苏联事业、过去和未来不可避免的一致，这持续不断地限制了苏联未来的道路。

合众为一 (E Pluribus Unum)

戈尔巴乔夫需要公开化政策以实施其改造。这是揭示体制变形及激发对抗体制变形热情的前提。但是公开化本身也需要其他概念以获得合法性，即 1987 年引入的社会主义多元化。虽然这一概念被谨慎地限制，而且明确指出是只应用于观点而不应用于政党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戈尔巴乔夫可能是苏联历史上首位以官方名义、从积极的意义上使用多元化概念的人^①。社会主义多元化是要在多元化中寻找一致，戈尔巴乔夫^②主张创造多种意见的综合体。允许存在不同观点，但是只能有一种政策。

然而，尽管多元化概念被框定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但其仍然无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相一致。因为在那里，多元化、形式民主、绝对自由和客观主义等概念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自欺欺人。真正的政治和科学自由只能在被迫地、尽管也是清醒地为基于特定阶级的立场服务时才能实现^③。更确切地说，社会主义多元化概念出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④，虽然苏联的话语总是偏好辩证的、但却似非而是的观念，如爱国的国际主义，被承认为必需的自由。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主义多元化概念逐渐被引入实际行动，事实上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几乎没有引起注意的是，在仅仅几年的时间内，一整套新引入的政治概念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标签，如“(社会主义)多元化”，“(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竞争”，“(社会主义)民主”^⑤。限定定语将保证潜在的颠覆性概念被制止，并成功地运用于明确的目标。但是，一旦社会主义遭受无法达成共识的危机

① Brown, A, *The Gorbachev factor*, pp.126ff.

② Горбачёв, М. Нарастивать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7.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0.С.246; Горбачёв, М. Об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7.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0. С.589.

③ Ленин, В.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12.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0.С.24ff; Ленин, В. (1961 [1909]).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и эмпириокритицизм: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заметки об одной реакцион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18) ,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1.С.195; Bukharin, N. (1971 [1931]),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N. Bukharin, et al. (Eds.), *Science at the cross roads*. London: Frank Cass & Co. Ltd. 1971, pp.12, 29.

④ 除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还有与俄国 19 世纪斯拉夫主要的有趣比较。霍米雅科夫 (Alexsei Khomyakov, А. С. Хомяков) 将农村公社的聚合性 (sobornost', соборность) 定义为“多重性的统一”，假定其没有受到彼得大帝欧洲化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个人在与他人的共同沉思和精神联合发现其意图 (Hosking, G, *Russia and the Russians: From earliest times to 2001*.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1, p. 275)。参见: Haug, W. F, *Pluraler Marxismus: Beitrage zur politisches Kultur* (Vol. 1), Berlin: Argument, 1985, pp.10ff.

⑤ Андрей Грачев. Горбачев. М: ВАГРИУС, 2001. Electronic edition: [http:// lib.ru/ MEMUARY/ GORBACHEV/ grachev.txt](http://lib.ru/MEMUARY/GORBACHEV/grachev.txt).

时，这些限定将会一条接一条地消失。在转变概念之一“多元化”的名义下——戈尔巴乔夫^①在1990年2月舍弃了社会主义的限定词——共产党的立宪特权被废除，直接影响苏联能否存留的普选也在1990年举行了。

因此，从由马克思和黑格尔那富有启发性的术语——“消失的中介”（Vanishing mediators）的视角来看，改革政策的关键词是有吸引力的。例如，这一概念被齐泽克（Slavoj Žižek）^②用于塑造具有民主思想的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人以及他们在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所扮演的角色。^③“消失的中介”也可被视为瞬态的概念，它们在完成使命、不再服务于相关目的后，也将从政治词汇中消失。其后，它们将在更高层面以新的形式重现出现。一整套曾被“社会主义”属性限定的词汇转变成了新形式。用黑格尔^④的话来说，它们被“否定”而“超越”，被保留而改变（扭曲）。同时，当争论中的概念完全被取代时，我们便可以谈论进一步的转型。即使是混合经济市场（一定程度上进行价格控制的管制市场）^⑤，也能够走得比戈尔巴乔夫^⑥最初所称的社会主义市场（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ынок）更远。在对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和西方宪政民主的要求增加时，“社会主义市场”便变得不再适用了。^⑦在这一阶段，同样进入公开的辩论商讨、甚至理论上更为一致的概念——市场社会主义（рыноч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也成为多余。^⑧1990年初秋，戈尔巴乔夫不同意将苏联变

① Горбачёв,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XXVIII съезду КПСС и задачи партии, 2 июля 1990 г.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0.С.1.

② Žižek, S,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26ff.

③ “消失的中介”能被视为黑格尔“aufgehoben”或者是“verschwindenVermittler”。齐泽克从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那里借用而来。弗雷德里克将此作为一个理论工具来解释马克思·韦伯如何组织他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思想。

④ Hegel, G. W. 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Erster Band Die Objektive Logik*. In F. Hogemann & W. Jaeshke (Eds.), *Gesammelte Werke* (Vol. 11).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78, p.104.

⑤ “Democratization: The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excerpts from the congress’ first session], In R. V. Daniels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in Russia: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3, pp. 381.

⑥ Горбачёв, М. Перестройка работы партии-важнейшая ключевая задача дня// Правда. Июль 19.1989.С.1-3.

⑦ 最终受到无情的批评的“社会主义市场”这个词，最早见诸于1986年3月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使用这个词的人是当时刚被任命的农业，工业，供给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超部门的主席，弗塞沃勒德·穆拉霍夫斯基（Vsevolod Murakhovsky），他与戈尔巴乔夫关系非常密切。

⑧ 戈尔巴乔夫本人并未使用“市场社会主义”这个词，但倾向于具有较少争议性的“社会主义市场”。但是，前者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非常流行，并且毫无疑问的是，“社会主义市场”以前者为条件，前者在理论上也更加一致。更确切地说，在“计划经济”的情况下（Planwirtschaft），“市场社会主义”（Marktsozialismus）有着德语或者日耳曼语的语源。（D.M.Nuti, “Market socialism: The model that might have been-but never was”. In A. A slund (Ed.), *Market socialism or the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pp. 17-3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pp. 20f）.

为分散的市场经济的 500 天计划^①已经很明显。戈尔巴乔夫^②曾用来描绘改革——并依照列宁的说法——预示社会主义不同阶段转变的“过渡”概念，获得了彻底改变体制的意思^③。改革概念似乎无法独自包含和支持如此深远的改变。^④ 隐隐出现的“过渡”因此而甚至会撤下改革。在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正式的个人言论自由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取代了公开化和改革。

一日千年（1000 Years in one day）

最初，改革是与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进步大加速的号召一起宣布的。^⑤“加速”在修辞上居于特权地位^⑥，但是由于经济效益未能显现，它将会逐步被遗忘。

政治上加速的想法可以经由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进步观念追溯到宗教改革运动，找到神学上的类比。时间紧迫，每个人都有必要在审判日到来之前改进自己的行为方式，在宗教战争和神学争端期间坚持正确的信仰。路德认为，在神圣的上帝帮助下，百年间所掩盖的已经在过去十年里完成了。罗伯斯庇尔的“加速”并不是上帝缩短时间以拯救众人的方式，而可能是个人受到革命的影响，更快地完成了人类理想的进步^⑦。最终，理智的构建回归到《新约》中保罗的第二封信（3:8），信中提醒道：人类千年不过是上帝的一日。

当然，“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是在前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及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努力克服勃列日涅夫时期^⑧萧条的产物，但是这一口号中有一些历史出处。个人责任感的道德涵义显而易见，隐藏在审判日修辞之中^⑨，这令人联想到路德神学的几个方面。在苏联的背景下，加速的概念不仅会回归到赶超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或是在四年、

① 500 天计划变成了自由化反对派对于越来越被“市场社会主义”所指定的计划的替代方案。

② Gorbachev, M. Speech dur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5.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С.439.

③ Под ред. В. Максимова. Словарь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златоуст, 1992. С.157.

④ 这里不仅相对校正的语义学含义在起作用，戈尔巴乔夫规定了不同的改革的范围，“对于生活所指出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从我们体制框架内寻找，而不超出社会主义的范围……”

⑤ 在 1984 年 12 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戈尔巴乔夫在同一背景下提到了公开性（glasnost , гласность），改革（perestrojka (перестройка)），民主化（demokratizacija,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和加速（uskorenie, ускорение）。

⑥ 在 1985 年 4 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加速发展的战略，并在 1986 年 3 月苏共二十七大的的一份决议中得到通过。（Горбачёв, М. О созыве очередного XXVII съезда КПСС и задачах, связанных с его подготовкой и проведением. В Избр.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2).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 С.154f; ЦК КПСС 1986.С. 85f)

⑦ Koselleck, R,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79, pp.21f.

⑧ Рыжков, Н.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стория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а. Москва: Новости, 1992.С.71f.

⑨ Горбачёв, М.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С.48.

三年或是两年的时间内完成五年计划的政治运动，甚至在早期，就企图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制造理论根据，为努力“加速”发展提供动机。恩格斯称，如果一个国家恰当地对经济进程作出反应并朝着同一方向发展，那么该国可能会加速发展^①。只有在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时，加速才有可能实现。这个想法是，在来源于实际、并与现实相一致的进步理论的帮助下，国家能够动员人民，所以法律管理下的发展也会更为容易。一项关键的假设是，历史有目的地前进，而加速起了促进作用。量变能通过体力劳动以比预测更快的速度转变为质变——共产主义。

苏联的加速概念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双重身份。这一概念适用于两种经分析可以辨识的传统，虽然两者互为前提。上文所关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加速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起源于法国的启蒙运动。但是也有将苏联的加速的修辞视作（列宁主义者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队的自我意识的延伸。一群阴谋家（或一个上帝垂爱的国家或一个天才型的人物）能够推动历史的想法，始于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经过了法国社会主义的激进思潮和 19 世纪俄国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卡乔夫及涅恰耶夫等人的政治思考。党可以作为历史先驱的观念可以被视为知识分子弥赛亚意识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意识认为知识精英将执行人民的使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精神（Weltgeist）的目标提前实现。

然而，有观点认为，官方的加速修辞事与愿违地在概念层次部分削弱了真正进步的机会。1988 年，西方观察者和苏联知识分子都开始质疑同时‘加速’和‘重建’的可能性^②。上升的增长率（现存体制影响的最大化）似乎与重建（意味着临时的拆分）相左，而这正是戈尔巴乔夫^③对政治和经济的“再定位”^④。此外，正是在这种对于“加速”政策过于理想主义的喋喋不休，才使得苏联的预算赤字以及对于物质的需求引起了格外关注。^⑤领导人越多谈及，越努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似乎便越萧条。1988 年，经济加速的说法被舍弃，却好像被实际的、不可预料的

① Marcuse, H.,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8, p.121.

② Gerner, K., & Hedlund, S., *Ideology and rationality in the Soviet model: A legacy for Gorbachev*, London: Routledge, 1989, p.358.

③ Горбачёв,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XXVIII съезду КПСС и задачи партии, 2 июля 1990 г.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гиздат, 1990. С.11, 14.

④ 即使在这一讲话发表的时期加速的概念也并不是那么普遍，戈尔巴乔夫讲话的背景是经济的新定位和经济加速。

⑤ 1988 年夏天“加速”这个词的使用频率下降了。苏联领导人都严肃地觉察到 1989 年夏天的经济危机，但在 1988 年秋天，领导层已经承认 1987 年和 1988 年之间预算赤字大幅增加。（Aslund, A. *How Russia became a market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pp. 36, 47）耐人寻味的是，1988 年夏天苏共中央的期刊《共产主义者》（Коммунист, коммунист）的第一部分名称改为“改革：理论与经验”。这意味着与党的代表会议决议的分裂。值得注意的是，在 1986 年 3 月和 1987 年 1 月，“改革”并未出现在相应的期刊部分里，那个时候期刊主要部分的标题为“加速的战略：理论与实践”。从 1987 年春天到 1988 年夏天，这一标题又改为“加速与改革：理论与实践”。

政治加速所取代，这一过程无须领导层的指导。概念的辩证逻辑类似于‘革命论’和‘改良论’的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戈尔巴乔夫最初试图说服民众，其指导改革的思想不是“改良性的”。然而，当发展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变得过于激进时，改良路线恢复了，改革的革命性定义淡化了。随着国内主权声明的增加和要求体制向市场导向及分权转变的呼声的上涨，戈尔巴乔夫^①开始提倡改变，当然是革命性的实质、改良的形式和速度。^②

结 论

戈尔巴乔夫所用的概念适应了苏联体制，然而它们也积极地改变甚至超越了体制。公开化、改革和其他概念是苏联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同时，曾用于异议者运动的公开化概念暗示了体制内部发生的权力转移。改革政策的负极大于 20 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时期制定的一切政策。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积极点是共同的。公开化、改革和加速成了许多斯大林主义式行为的工具。在这些概念的帮助下，戈尔巴乔夫试图进行全面的创新，却又不希望放弃许多苏联制度。公开化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效仿 20 世纪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做法。改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同政见者的批评在苏联拥有市场。在经验的修正空间里寻求预期，但历史视角使得苏联的参考标准分崩离析。概念化的驱动力带有怀旧的寄托，而公共讨论大部分都是指向历史的本质问题。

改革意味着提高人类道德水平上的微调，但同时也是指现代化结构逻辑的微调。公开化也曾被利用来进行道德和技术上的服务。这是对未来的允诺，也是与历史上理想民族国家的联系。改革用尽全力将自身送入未来，却被其复指的前缀所局限。晚期的苏联改革政策受制于这种概念性特性所形成的局限和可能性。

戈尔巴乔夫概念化其政策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国际形势。如果他没有选择用这些概念来构建其政策，这段时期很有可能完全不同。根据这些概念，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更大的公开性、增加的参与度、知识分子的评判、大规模的反省以及强烈的身份寻求。当苏维埃事业寿终正寝时，戈尔巴乔夫概念化的改革失去了有效性，因为其目标是开放及改变已不复存在的体制。改革与特定的体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苏维埃体制）相关，并意欲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奏效。改

① Горбачёв, М. О проекте платформы ЦК КПСС к XXVIII съезду партии// Правда.1990.февраль 6.С.1-2.

② 这一重新定义与戈尔巴乔夫 1991 年之后的态度是一致的（Горбачёв-Фонд,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десять лет спустя (апрель 1985- апрель 1995). Москва: Апрель-85, 1995.С.16.

革的一个含义正是“在建设中产生变化。”^①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人民如此疏离这一概念。^②

戈尔巴乔夫时期本质上可以通过其改革政策中所使用的概念来表示。改革创造了一个能够被交替性愿景的不同投影所填满的开放模型。一些自由派相信，重建并非巧合，索尔仁尼琴^③提出了新东斯拉夫联盟的解决方案和前景图，一些民族主义者描绘了自己对戈尔巴乔夫^④称作“精神复兴”的解读。逃离危机的需求、世界末日的心情和怀旧倾向都得到了改革影射含义的鼓励：隐于前缀实为修正的根本性改变。

这些关键概念伴随着苏联的解体灰飞烟灭，但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概念使用本身可能也促成了这场社会主义体制的葬礼。追溯性的概念化（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将公开性定义和改革定义为对革命传统的恢复）在逐步阐述理念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影响，这些概念清晰地告诉我们无论是就当前情势还是未来远景而言，苏联都可谓气数已尽。我们只能在已消逝的过去和社会主义传统内外来寻找新的答案。^⑤

然而，如今很多苏联解体的理论都是事件最后决定的反映。解体之前有很多相似的转型，有时原因可能与影响一样多。所有趋势殊途同归，因而无法歪曲某个特定方面的主张。然而，我无意于在这里做出总解释，而只是想补充现有的观点。我试图展现指导性的、阐明社会政治发展的改革政策语义学及语用学知识。正如上文所述，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有的意识形态的主观意图和实践结果惊人的差异，在几个方面证明而非驳斥了改革概念在社会进程中的工具性作用。但是尚不能充分地证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基本概念是触发苏联解体的自发因素，正如无法将其简化为附带现象性质的标语。晚期苏联概念史的真正挑战在于意识到其复杂性并辩证地理解。

当今大多学者和评论家倾向于认为“改良共产主义”概念是矛盾修辞。而当代研究似也证实了该观点。不过任何戈尔巴乔夫意图使用的概念都没有加速这个将要面临制约的进程。但是，为了从历史而非守旧的观点使改良共产主义失去效力，必须要考虑到用于证明其不可能性的论证，即改革（及其失败），这直至1990年——柏林墙倒塌一年后，苏联解体前一年——仍被视为对立的结论的无法反驳的论据。

① АН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Т. 9). Москва: Изд. АН.1959.С.912.

② VЦИОМ1994年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公众准备积极评价戈尔巴乔夫的历史贡献，但对“改革”相联系的事物的态度相对冷淡。(Brown, A., *The Gorbachev factor*, p. 344)

③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Как нам обустроить Россию? Посильные соображения. Париж: YMCA- PRESS, 1990.

④ Горбачёв,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XXVIII съезду КПСС и задачи партии, 2 июля 1990 г.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0.С.32

⑤ Эпштейн, М. После будущего, ил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арьергарда. В Под ред. М. Эпштейна, Постмодерн в Росси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еория. Москва: Р. Е. Лина, 2000.С.160f; Ципко, А. Хороши ли наши принципы// Новый мир.4.1990.С.-204.

(胡彦、罗甘本译, 封帅、韩冬涛校)

【Abstract】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is analysed in conceptual terms, drawing on Reinhart Koselleck's Begriffsgeschichte. The author seeks to interpret the instrumental role of the concepts perestrojka, glasnost', reform, revolution, socialist pluralism, and acceleration in the Soviet collapse.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are related to a wider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and the conceptual perspective is used to help explain the progress of event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ommon notion of the reform policy concepts as cliché's is not valid.

【Key Words】 Begriffsgeschichte, Perestrojka, glasnost', Socialist pluralism, Ideology

【 Аннотация 】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анализируетс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х понятий, и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Истории понятий Райнхарта Козеллека. Автор пытается объяснить инструментальную роль понятий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гласность, реформы, революц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плюрализм, и ускорение крах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емантика и прагматика связаны с более широким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м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контекстом,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ая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с целью помочь объяснить ход развития событий. Автор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общих понятий концепции политики реформ как клише необоснованно.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История понятий,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гласность,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плюрализм, идеология

(责任编辑 封帅)

苏联解体·实证篇

国际油价波动与苏联解体*

庞昌伟**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的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大的谷物和食品进口国,苏联当时已被深深地卷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80年代中期,在国际油价急剧下跌的情势下,苏联政治高层对策失误,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把握世界经济的周期性规律,对于制订应对经济危机的举措和规划危机后的发展战略大有裨益。

【关键词】国际油价 战略失误 苏联解体

【中图分类号】K512.5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6-0071(14)

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后,美国在遏制苏联、与之争霸的过程中实施两手战略:一是把苏联引上与美进行军备竞赛的快车道,从经济上消耗苏国力;二是通过施压 OPEC 增产,使世界石油价格低位运行,切断苏联军备竞赛所需资金来源,拖垮苏联经济。世界经济周期影响着石油供需的平衡,进而刺激油价的涨落。西方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周期一般为5-6年一个循环。国际油价走势与之相契合:3-5年短波段、10-12年中波段、28-30年为长波段。西方经济当时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欧为了抑制本国通胀、刺激经济复苏并打压苏联石油收入,怂恿沙特于1986年燃爆战后国际石油市场最惨烈的价格战。美国发动的全球油价“逆危机”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与全球油气资源重点区域合作研究(09JZD0038)》的阶段性成果。真诚地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初审、复审和最终审查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具体修改建议。文中错漏一概由本人负责。

** 庞昌伟,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国际石油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石油、经济周期与苏联解体衰亡

沙皇俄国 1898-1901 年的石油产量（1911 年俄国产量 1120 万吨，全球 2124 万吨）曾一度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之后，美国又夺回石油产量第一的宝座，并保持到 1974 年。1975 年，苏联石油产量超过美国。而苏联解体后，1992 年沙特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2007 年，俄罗斯夺回石油超级大国的桂冠。但 2009 年美国发生“页岩气革命”，取代了俄罗斯天然气第一生产国的地位。俄罗斯能源大国地位的兴衰与国运休戚相关，并影响了世界格局变化。本文主要论述苏联晚期油价震荡走低因素与苏联解体的关联性。

1986 年国际油价急剧下跌，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石油成为国际关系中结盟和断交的推进剂以及战争与革命的缘由。在 1985-1999 年世界油价低迷的 15 年间，俄国经历了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和叶利钦时代痛苦的、接近崩溃的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转轨过程。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苏联在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的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大的谷物和食品进口国。苏联当时已被深深地卷入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到了 80 年代，苏联一半以上的外汇收入靠石油出口，而一半以上的外汇支出用于进口粮食和食品。因此，苏联经济状况直接取决于世界油价和谷物价格的波动，取决于世界对石油和粮食的总体需求态势。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至中期，苏联经济学家和政治决策领导层都没有对苏联卷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后果做出相应评估。因此，1980-1982 年间，世界经济出现连续衰退并伴之以石油价格下降时，苏联没有人预见到这一情况将给苏联外贸以及外汇金融系统带来何种灾难性的后果。

经济学家早就发现了苏联计划经济增长速度的衰减：从 50 年代的 6%、70 年代的 4% 到 80 年代的 3-3.5%（А·Г·阿甘别吉杨认为，苏联经济 70 年代已为零增长，80 年代中期则下降 8%）。苏联经济持续 20-30 年增速递减，甚至增长停滞。但尽管如此，也不至于导致经济崩溃。1991 年苏联出人意料地解体，不仅给苏联学者的声誉投下了阴影，而且也令外国的苏联经济学和政治学家脸上无光。1992 年以后，上述学者开始研究苏联解体，并马上抛出了一系列非常主观的论断。一类学者断定，苏联解体是以 1985 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决策失误造成的；^①另一

^① 持此说法的如原苏联新闻出版部部长 М·涅纳绍夫（М. Ненешев）。Последне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93. От катастрофы к возрождению: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разрушения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99.

类学者则认为，是1982年美国里根总统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弱化了苏联经济而导致了苏联解体。^①

90年代苏联档案放开之后，学者才有机会据此来分析苏联最后20年的历史，苏联衰亡的体制原因显露无疑。至少可以明白的是，苏联解体的机制包括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苏联档案资料和解密的美国文献表明，在各种因素中居于特殊重要地位的是对外政策的作用，亲美力量对苏联领导层和专家的影响，对苏联解体进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催化剂作用。解体的客观原因则是苏联大厦的根基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苏联政治领导人没有搞清本国已经有限融入的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在错误评估局势的基础上作出了错误的决策。

20世纪80年代，苏联极度依赖油气出口收入来维持经济运转，油气价格下跌使苏联国力遭受重创。能源出口收入占苏联外汇收入最高曾达到54.4%（1984年）。随着世界油价走低，石油出口收入从占苏联外汇收入的38.8%（1985年）下降到33.5%（1987年）。苏联只得靠提高出口量来弥补油价下跌造成的外汇收入的下降。1971-1989年苏联石油出口增长90%，1989年达到1.847亿吨（其中原油1.273亿吨，油品0.574亿吨）。出口量占开采量的比重不断增加：1970年为25.8%、1980年为27.7%、1987年为29.1%、1988年为34%。1985年俄罗斯联邦出口能源4.74亿吨标准燃料，1990年4.62亿吨标准燃料。1988年俄联邦石油产量比1981年提高2100万吨，出口增加4800万吨，但收入却下降了50%。而苏联天然气出口占外汇收入的比重1989年为29.2%，当年出口天然气1010.5亿立方米（对经互会46.7%，南斯拉夫联邦4.8%，西欧45.5%）。苏联1975-1990年油气产量见表1。

表1 苏联石油天然气产量

年代	1975	1980	1985	1988	1989	1990
石油/亿吨 苏联	4.908	6.032	5.953	6.243	6.072	5.7
俄联邦	4.113	5.467	5.423	5.688	5.549	——
天然气/亿立方米 苏联	2893	4352	6429	7700	7961	8150
俄联邦	1152	2540	4620	5898	6158	——

资料来源：《1989年苏联燃料动力综合体》，莫斯科，1989，第112页、134页；《1990年苏联数字》，莫斯科，1991年。

苏联1970-1986年对石油天然气工业的投入提高了1-2倍。1970-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石油工业占工业总投入的8.8-9.3%，1986年则提高到了19.5%。苏

^① Schweizer P. 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4.

联石油产能 1970 年为美国的 74%，1986 年增长到了 140%；在此期间，天然气产量从相当于美国的 30%增长到了 133%。苏联从西方进口的机械设备包括成套石油开采设备，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29.8%提高到了 1990 年 43.8%。

另外，苏联从 1975 年变为粮食净进口国，粮食进口激增。1970 年净出口 350 万吨，1974 年粮食进出口持平，1975 年进口上千万吨。1984 年仅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粮食达 2680 万吨。1986-1988 年，食品短缺约为 210 亿卢布（在食品生产总额为 1360 亿卢布的情况下）。^①除大量进口粮食外，1989 年进口肉类 60 万吨，奶油 24 万吨，植物油 120 万吨，砂糖 550 万吨，柑橘 50 万吨。^②

在 1973 年和 1979 年两次石油危机期间，苏联大幅增产，拒绝与欧佩克限产保价相配合。其与欧佩克争夺西欧市场，争当西方的“可靠伙伴”。^③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陷入了用增产维持石油美元收益的怪圈。

始于 70 年代中期的经济停滞到 80 年代演变为关键经济部门的危机：经济结构失衡，技术工艺落后。苏联 80 年代初已形成极度的军工经济特征。军品占机器制造业的 60%以上，军事支出占国民总产值的 23%；80 年代末上述指标分别提高到 80%和 28%。^④苏联农业增速从 60 年代的 4.3%降至 80 年代初的 1.4%。在此期间，工业增速从 8.4%降至 3.5%。消费部门长期衰退，限制了民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戈氏上台正面临苏联综合国力下降、内外交困的局面。^⑤阿富汗战争还在持续，^⑥1986 年 4 月又发生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与美国军备竞赛消耗了苏联国内资源的 40%。戈氏实施加速战略，计划“十二五”期间（1986-1990 年）GNP 增速为 2.8%，2000 年前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翻一番。为此，五年内燃料—原材料工业产量需要增长 15%，而投资需要新增 30-40%。资金来源只能依靠向西欧市场大规模倾销石油等原材料。戈氏经济改革时期国家订货占 GNP 的 90%，严重扭曲了实体—财政金融平衡。

① Н·И·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第 259 页。

② В.В. Хлебников. Топлив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России в XXI веке. М.: Научтехлитиздат. 2006. С.66,68.

③ Mashall I. Goldman, *Petrostate: Putin, Power, and the New Russia*. Kindle Edition, 2008, p.83.

④ Самохин Ю.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2001.С.304.

⑤ 苏联 1986-1990 年每年要向越南援助 25 亿美元，外加 10 亿美元军事援助；五年间对蒙古要援助 30 亿美元，对古巴援助义务为 35 亿美元。据巴黎《青年非洲》周刊 1987 年 10 月 7 日。1986-1989 年苏联对外无偿援助 600 亿外汇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 1.1%。1986 年对发展中国家援助总额为 165 亿外汇卢布。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第 245 页。

⑥ 阿富汗战争每天需要耗资 1200 万美元。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6 年 2 月 18 日。苏联发动阿富汗战争 9 年耗资 400 亿美元，投入兵力 11.5 万余人，死伤 3 万人；阿富汗人民死伤 130 万人。马行汉：《外交官谈阿富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第 49 页。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石油政策的战略失误

石油是苏联崛起的关键因素。20 世纪 60-70 年代西西伯利亚发现巨型油气田，恰逢世界油价上扬了好几倍。当时，对西西伯利亚油气工业每投入 1 卢布，经过 3-4 年就可以收回 30-40 卢布的利润。这种迅速和巨大的收益在世界经济史上尚无先例。得益于这种聚财效应，苏联通过石油出口获得了巨大的外汇储备。苏联经济状况不用任何经济改革就得到了改善，可以大量购买外国先进设备和消费品，还保障了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财政基础。

70 年代，由于中东政局动荡不安，国际油价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上涨。许多人认为，油价上涨到一定高度之后就会稳定下来。这一错误判断让包括苏联在内的产油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80 年代中期的局势表明，高油价是与具体的突发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状况紧密相关的。1985-1986 年世界油价下跌了一半，^①这使得严重依赖石油出口创汇的苏联受到沉重打击。苏联预算、外贸平衡、数千万吨谷物的进口、外债偿还、军队和军工综合体拨款等均陷入了捉襟见肘的窘境。但苏联政府仍不知道，应对这类危机情况应当采取哪些反危机措施，以及世界油价暴跌对苏联经济将产生一系列什么样的后果。

1985 年 8 月，美国里根政府迫使沙特增产，实行“逆向石油冲击”战略（与 70 年代初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战略相反），向已显萧条的世界市场注入石油，打压油价，抑制西方的通货膨胀，使热钱回流美国股市并投入房地产市场。1985 年 10 月，欧佩克会议未能就出口配额达成共识。美国的授意与沙特削弱正处于两伊战争中的伊朗和伊拉克经济的意图相契合，科威特也在美国的授意下继续违反欧佩克配额增产，而伊拉克则没有超产能力。萨达姆迫切要求欧佩克制定严格的配额政策限产保价，以维护 21 美元的价格底线来提高石油收入。油价下跌 1 美元，伊拉克的损失就高达 10 亿美元，这刺激了 1990 年伊拉克对债权国科威特的入侵。美国石油进口量则从 1970 年的 300 万桶增加到 1990 年 800 万桶。

1985 年，沙特的石油出口从不足 200 万桶/日猛增到约 600 万桶/日，秋末更达到 900 万桶/日。11 月，国际石油价格从 30 美元/桶一路下跌，在不到 5 个月之后跌至

^① 尽管 80 年代初期经济衰退和对石油的需求下降幅度不是很大，但世界油价下降幅度却很大。经济衰退和油价下降幅度之间不成比例。后来有分析家披露，这种油价异常下挫是由于 1985 年美国中情局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了秘密协议，沙特在 1985 年末把本国石油产量提高了 2 倍多，从而造成油价急剧下滑。参见：Tremblay V.G., Ellman M., “Debate: Why did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Collapse?”, *Radio Free Europe*, vol.2, 1993.

12 美元/桶。这使得苏联在一夜之间损失了超过 100 亿美元的硬通货，几乎是其硬通货收入的一半。^① 每桶石油价格下跌 1 美元，莫斯科每年的收入就要减少 5-10 亿美元。天然气的价格形成与石油价格挂钩，因此苏联出口天然气的收入也减少了数十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元贬值使莫斯科收入每年减少大约 20 亿美元。军火是苏联继能源之后的第二大出口商品，大部分军火出口到了中东国家以换取美元。由于油价暴跌，1986 年上半年，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石油收入减少了 46%。结果，苏联军火销售量在 1986 年减少了 20%，莫斯科又失去了 20 亿美元硬通货。^② 由于油价下跌，苏联经济雪上加霜，致使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美欧则享用了低油价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红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 1979 年苏联不出兵阿富汗，沙特就不会听从（而会顶住）美国有关石油增产以打压油价的建议。苏联占领阿富汗让沙特十分担忧，尽管石油价格下跌也同样损害阿拉伯世界产油国的经济。按照苏联能源部官方统计，1985-1988 年世界油价下跌，从 1984 年的 212.6 美元/吨下降到 1988 年的 93 美元/吨，下降了 129%，致使该国四年间共计损失 400 亿卢布。^③ 1985 年年底开始，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直线下降，到次年 4 月 1 日，国际市场石油价格跌至每桶 10 美元大关，下跌幅度近 70%，创 13 年来最低纪录。油价如此暴跌史无前例（参见图 1），苏联等产油国为此而深感震惊。

苏联是世界上石油产量最多的国家。1983 年产油量达 6.18 亿吨，1984 年产油量为 6.13 亿吨，出现了战后以来年产量首次下降，1985 年又进一步下降为 5.953 亿吨。仅在 1988 年曾达到历史最高产能，但也不过 6.24 亿吨。石油产量下降，加上石油价格“逆危机”，使苏联经济雪上加霜。因为石油和油品出口是苏联获取硬通货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苏联 2/3 的外汇收入靠向西方出口石油获得，而又要用这一收入来进口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粮食。西方估计，1984 年苏联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石油及石油产品 9000 万吨，换取外汇 190 亿美元，大约占从西方获得的出口外汇收入的 67%；1985 年虽有所下降，出口石油和油品不超过 5550 万吨，但仍占从西方获得的出口收入的 60%。

①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年，第 271、272 页。

② 同上，第 291 页。

③ Топлив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1989. М, С.3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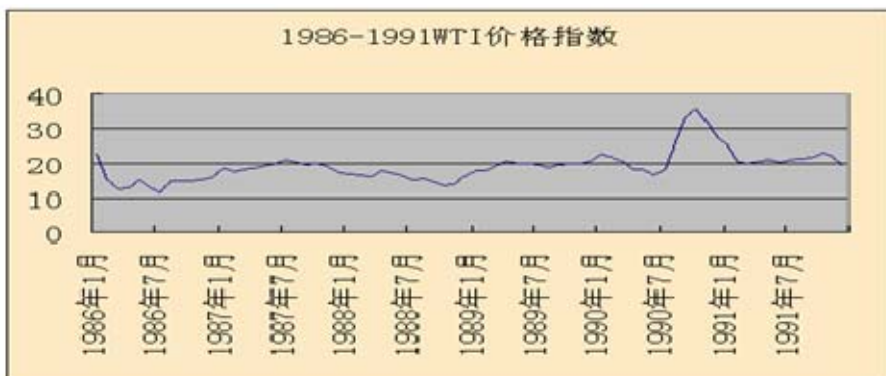


图 1. 1986-1991WTI 价格指数

苏联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石油及油品与技术设备交易时，由于苏联石油产量下降，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下跌以及美元贬值，苏联在西方市场特别是西欧市场上失去了相当部分的购买力。缓和外汇紧张的其他两条重要杠杆黄金和军火，也由于国际市场的供需状况以及市场容量等条件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小了。再加上苏联国内“没有可代替油气的其他商品出口”，因而外汇日趋紧张，进口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高科技货物发生支付困难。

苏联官方则认为，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下跌，并不会引起苏联经济上的困难，苏联的生产潜力和科学技术潜力足以使他们能够迅速地调整生产，苏联可以更多地出口柴油、喷气机燃料、天然气、化学原料、电力，以弥补石油跌价造成的损失。为使自己在石油价格暴跌中受到较大影响，苏联 1986 年 1 月宣布停止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原油，并力求增加天然气出口。此外，苏联国内还认为油价下跌只是转瞬即逝的暂时现象。这充分表明他们对油价暴跌的持续性估计不足。^①

苏联解体前夕，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1991 年 11 月 18 日在休斯顿美国石油学会（API）对访美的苏联炼油和石化专家发表题为《我们是如何搞垮苏联的》的演讲时说，“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②她还准确地预测出苏联将在一个月内在宣布解体。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如她所料。

世界油价下跌对苏联石油工业的影响十分明显。苏联有一半以上的石油产自西

① 崔日明：“石油价格暴跌对苏联经济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 4 期。

② О докладе Маргарет Тэтчер о развале СССР (США, Хьюстон, 11.1991 г.) [http:// www.kprf.org / showthread.php?t = 10660](http://www.kprf.org/showthread.php?t=10660)

西西伯利亚的六大巨型油田，产量增长一度很快。

苏联政府为石油工业确定的方向是增加石油出口，因为苏联极其需要石油美元来购买谷物和进口设备。但是，加快开发大油田战略导致易采石油的枯竭，剩余可采储量质量下降。到 80 年代初期，继占苏联石油产量 25% 的最大的萨莫特洛尔油田的产量下降之后，西西伯利亚其他巨型油田的产量也开始出现下滑。

西西伯利亚拥有巨大的石油资源潜力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石油产量下降的原因不是地质层面而是经济层面的。主要是因为，按照原来的产量和价格水平靠投入 1 卢布产出 30 卢布利润的投资逻辑已经不可持续。巨型油田中，易采而便宜的石油已经枯竭。西西伯利亚稍小一些的复杂油田则需要巨额投入。为了维持原来的产能，需要有更多的金融和物资投入，但国家预算中已经没有这笔额外的投资了。

许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深知石油工业在整个苏联经济中的支撑地位，但他已无力回天，扭转局势。的确，1985 年他上台伊始就考察了西西伯利亚，并划出了一笔资金，稳住了石油产量。但两年之后，石油产量又出现下降。为了扭转石油工业的这一局势，必须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戈尔巴乔夫在当时的讲话中已流露出对石油工业前景的忧虑。但是，戈氏仍没有意识到国家必须对石油开采业划拨巨额资金。这一事关苏联经济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没有被提到政治局层面讨论，因为他们认为，还有另外的解决产量下降问题的方案——开发新的成本较低的大油田，可供选择的有里海、东西伯利亚和极地油气产区。

70 年代末，上述地区已经发现巨型油田。当时的战略任务是，在发展西西伯利亚主要产油区的同时，开始开发新的战略接替性产区。西西伯利亚油田大开发走的就是这条路径：当鞑靼斯坦共和国在 70 年代初期达到产能峰值期之时，就开始积极推进西西伯利亚油田的开发。美国记者尤里·热加尔金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解密的信息作出很专业的判断——“里海石油能够拯救苏联免于解体”。^①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苏联石油工业在整个 80 年代没有实现向开发新的大油田的战略转向，来防止石油产量的下降呢？

1986 年戈尔巴乔夫开始与美国人谈判，希望能吸引外资来开发哈萨克斯坦田吉兹大油田。与美国石油公司雪佛龙（Chevron）就建立合营企业的谈判持续了两年多，之后又耗时两年时间组建合营公司，1990 年才开始工作。但时间——这一当时对于苏联最宝贵的资源却已无可挽回地流逝了。与此相类似的是，东西伯利亚新油田的开发也遭到了延宕。15 年之后，俄罗斯地质学家著文描述了东西伯利亚资源开发被延误的情况：“逻辑上令人费解的是，在东西伯利亚资源压力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不

^① Жигалкин Юрий. Каспийская нефть могла спасти СССР от развала – утверждало ЦРУ. 2001. [www.svoboda.org/archive/II usa/0301](http://www.svoboda.org/archive/II_usa/0301)

让充分利用东西伯利亚的资源。”^①美国著名的苏联石油问题专家Robert Ebel确认：“对1989年苏联石油产量下降没有预测，不是因战争和市场经济条件所致，而是对石油工业战略管理方面出现失误所引发的。”^②

苏联1988年迎来石油开采的峰值期，当年石油产量达到6.25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21%，其中俄罗斯采油5.7亿吨，占世界19%。苏联1960年占世界石油产量的14.4%，当年全苏产量为1.479亿吨，全球为10.26亿吨。1980年苏联占全球总产量的19.5%，当年全苏产量为6.032亿吨，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地区为3.126亿吨，全球为30.879亿吨。1990年苏联产量为5.705亿吨，占世界18%，俄罗斯为5.159亿吨，占世界16.3%（其中西西伯利亚地区为3.67亿吨，全球为31.683亿吨）。2000年俄罗斯占世界9%，产量为3.232亿吨（西西伯利亚地区为2.204亿吨，全球为36.044亿吨）。预计2020年俄罗斯将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10%，届时俄罗斯产量为5.2亿吨（西西伯利亚地区为3.15亿吨，全球将达52.25亿吨）。俄罗斯（及原苏联）在世界石油产量中所占的份额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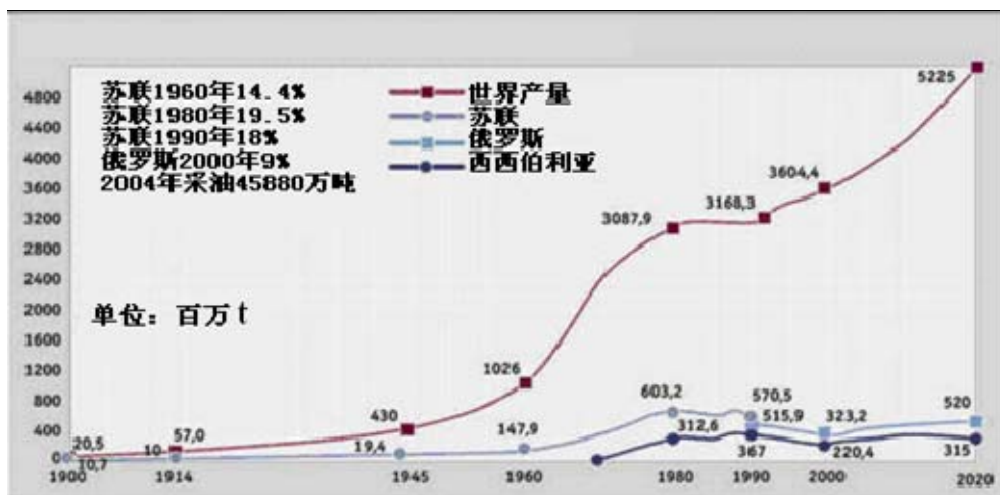


图2. 俄罗斯（原苏联）石油产量及所占世界份额
（俄罗斯指标线为下数第二条，从1990年起）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和苏联高层领导人对实现当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提高石油产量，表现出行政手段失灵的状况。苏联政权最高层的管理能量已不能“突破”

① Елисеев Ю.Б. Нефтегазовые ресурсы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Геология нефти и газа.2002.N.1. C.17.

② Ebel Robert, “Russia, Caspian and Central Asia”, 25 Annual II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berdeen, Scotland, 26-29 June 2002.

各部委和机构之间的管理体制所形成的部门私利化的壁垒。苏联行政体制“硬化”的痼疾已经严重到使政权瘫痪的地步。正是这一病症决定了苏联体制在 80 年代无力实施石油工业向新油区的大规模转向，而这种转向该体制在 60—70 年代曾很容易就实现了。

此外，还有一个方案能够改变苏联的石油政策——压缩国内石油需求量用于扩大石油出口。这是最现实的对策。苏联当时国内需求量约为 4.5-4.7 亿吨，出口 1.2-1.3 亿吨，其中只有 0.4 亿吨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西欧换取外汇。当时通过决策能够做得到的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多出口 0.25-0.3 亿吨石油，减少国内需求以赚取更多外汇。这仅需压缩 6-7% 的国内供应。但令人费解的是，在外汇出现危机的 1989-1991 年间，苏联最高经济领导层做出相反的决策——维持高水平的国内供应而压缩石油出口。^①1991 年苏联原油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仅有 0.54 亿吨。

可见，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苏联石油决策至少出现了两个战略性失误：第一，破坏了苏联石油开采的延续性——在西西伯利亚产能峰值到来之时没有准备和实施向新的富有前景的油田转移，这导致了从 1988 年起苏联石油产量的下降；第二，苏联领导层没有预见和实施最基本的经济上的机动措施——把石油从国内市场分流到国际市场，如果这样做了，本来是可以降低外汇危机的程度的。毋庸置疑，这两大战略错误都是主观层面的。

石油、粮食和外贸危机

全球石油价格下挫使苏联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对外贸易平衡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但这不足以导致苏联在 1991 年发生解体的悲剧。苏联官方认为，由于全球石油价格下跌所导致的外汇收入总额减少的幅度并不大——约 15%。但在石油出口量缩减之后，苏联外汇收入开始加速锐减，而金属、木材、棉花等产品的出口量下降导致这一情况变得更加棘手。苏联高技术产品出口量（4%）在对外贸易额中所起的作用历来不大。结果到 90 年代初，苏联外贸体系中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进口量大幅超过出口量。这样就引发一个问题——是否有可能缩减进口以防止苏联经济出现崩溃？

^① 原俄罗斯代总理（1992-1993）叶·盖达尔有机会获得了苏联后期的政府会议档案资料。根据这一史料，他在自己的著作《帝国的消亡》（Е.Гайдар. Гибель империи. М. 2007.С.281-288）里，以文件记录展示了苏联决策层是如何分析石油工业发展前景和分配石油的。盖达尔证实了石油出口量削减的事实。但他忽略了分析此文献很容易得出的结论：苏联外汇危机最初并不仅仅是由于世界油价的下挫而引发的，而是后来对流向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原油比例进行了错误分配造成的。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的主要进口项目是粮食和食品。1990 年这两种物资在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 50%。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石油收入的大部分实际上都用于购买谷物和食品上。典型事例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向西西伯利亚主要石油开采企业的领导穆拉夫连科提出请求，内容是：“面包出现问题，请增加 300 万吨计划外石油”用于出口创汇。^①可见，在粮食进口和石油出口之间形成了一种刚性联系，这种联系促使石油企业加快油田开发速度，加紧石油开采，这又成为引发为石油领域出现危机的原因。

但是，苏联依赖食品进口的情况并不常见。1914 年之前，俄国曾是世界上第一大粮食出口国。正是农产品的出口在历史上保证了俄罗斯的外汇收入，并为进口机械设备提供了资金。苏联首个关于在国外大量采购粮食的决议是在 1963 年通过的。当年粮食减产，而此前，苏联一直是农产品的出口国。苏联转而成为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引发了一系列巨大而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如果不是依靠出口石油，粮食问题很可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成为灾难性问题。无论是黄金开采，还是木材、棉花的出口以及对外举债，都不能保证用来进口农产品的稳定拨款。在此情况下，只有在西西伯利亚开发并开采大型油田，将石油大量出口换汇才能阻止粮食危机的发生。美国学者科特金写道，“如果没有西伯利亚的石油，苏联很可能会提前 20 年塌陷（解体）”^②。他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苏联农产品进口量占所需粮食总量的 40% 以上，成为苏联经济的软肋^③。苏联领导层认识到本国在地缘政治敌手面前存在战略上的弱点——苏联要向这些国家购买粮食，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但无力回天。

20 世纪 60-80 年代，苏联向农业生产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实施了一批大型项目，但 80 年代主要农产品产量依然停留在 60 年代的水平。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国家不得不支付大量外汇用于在国外采购粮食和食品。无法解决的粮食问题动摇了苏联经济的根基，限制了苏联实行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

苏联农业衰退的基础是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形成的。苏联选择了斯大林模式，彻底消灭个体经济，组织大规模生产，完全剥夺了农业生产者的物质利益，这使农业发展走向末路。而后来苏联领导层为提高农业效益所作出的所有尝试都没有超出斯大林所实行的僵化的管理模式。农业成了苏联经济中最保守的部门，甚至不允许讨论任何有关农业生产转入市场运营机制的可行性。因为政府不愿意、也不打算在

① Славкина М.В. Триумф и трагедия.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3. С.143.

② Kotkin Stephen, *Armageddon Averted: The Soviet Collapse. 1970-20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③ Hanson P.,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conomy*, London: Longman, 2003.

农业生产领域实施痛苦的但却必要的市场化改革，这种情况导致了苏联农产品消费市场在 1990–1991 年间的彻底崩溃。

严格地说，在 1986 年石油出口收入减少后，应该马上就开始缩减粮食和食品的进口量。但国家举债以及商业贷款的利用推迟了这一时刻的到来。而到了 1991 年，却根据石油出口量把粮食的进口量减少了一半。但是，对外贸易“进出口平衡”的自然恢复并不是有针对性的反危机行动的结果，而是许多情况叠加的后果。一直到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刻，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也没有打算通过不受欢迎的“保持稳定”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在位的最后几年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明显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国家是不可能从危机中走出来的。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条路是不能走的，因为这意味着彻底失去政治威信。

周期、危机与经济政策：对未来的借鉴^①

研究苏联领导层在危机暴发的危急时期所通过的决议，可以得出以下几条总结性的意见和结论，这些观点也许对于应对目前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是有益的。

第一，将世界经济发展存在周期性的特点列入经济政策是必要的。领导层和专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世界经济无论处在哪个阶段——上升或衰退，都应该制订符合该阶段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苏联政府应该具备一套在出口规模缩减的情况下切合实际的行动战略。这套战略应该限制进口规模，根据外汇储备危机的程度，缩减预算开支 10%、20% 或 30%。

第二，认清经济发展战略中的薄弱环节非常重要。对于苏联来说，粮食和食品进口就是这种薄弱环节。即在能源出口规模缩小的时期，必须考虑用于进口粮食或其他战略性稀缺商品的外汇的来源。今天，石油和天然气对于许多资源进口国来说就是稀缺商品。如果战略性稀缺商品是从地缘政治对手国进口而来，情况就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苏联就曾面临这种情况，因为它向美国及其盟国购买粮食这种战略性稀缺物资。

保证维持优先商品进口的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重要的是要拟定一份非战略性商品的准确清单，必要时可以限制这类商品进口。苏联本来是可以合理地临时缩减所有设备（除石油工业设备）的进口量的。尤为重要的是，确定外汇收入的新的可能的渠道。苏联本来可以缩减石油的内部需求而扩大其出口量创汇。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应优先制定应对主要战略威胁的决策——苏联当时的首要任务

^① Pang Changwei, “Oil policy and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Oil Market*, 07-08, 2010, p.71.

是提高外汇收入，以扩大粮食和食品的进口量，缓解紧张的社会经济—政治局势。

第三，苏联的反面经验告诫我们，同时进行深入的经济政治改革与具体实施硬性的反危机措施之间具有不协调性。戈尔巴乔夫的动机比较清楚，他想通过媒体的政治自由化树立绝对威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经济自由化。但苏联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种战略方针的无效性。首先，在危机条件下采取任何自由化的措施都无法阻止危机，只会深化危机。苏联经济管理体的效率很低，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但是，甚至就在这样巨大缺陷存在的情况下，苏联依然存在了一段时间。这种缺陷大多是由 20 世纪 20-30 年代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引起的。这些决策对苏联在 1986-1991 年间所面临的短期的、尖锐的外汇危机问题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基础性经济政治改革与反危机措施的具体实施同步性的尝试，导致了对局势的完全失控。

拥有一个意见统一的团队以及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对于克服危机是非常重要的。但戈尔巴乔夫既没有经济团队，也没有政治团队。他起初就坚持的自己的战略——平衡对立的统治精英的利益，这在危机爆发时是很难获得成功的。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深刻理解新的现实和战略威胁，制定正确而负责任的决定，并一以贯之和无条件地履行。那些曾经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的班底都不具备这样的品质。还有一个左右戈尔巴乔夫的主要问题——经济发展速度减慢。这是由于上几届领导班子执政能力欠缺所引起的，不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点对苏联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他们的共同弱项。在全球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重要内容的今天，深入研究苏联解体的石油政治因素，仍有历史教训值得汲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后果，都不是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合力”使然。但是，领导人个体因素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具有决定作用，戈尔巴乔夫是造成苏联经济崩溃而最终解体的核心人物。

始于 2007 年 7 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在 2008 年 8 月向实体经济扩散，把世界经济推向了新一轮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世界经济经历了 2004-2007 年高速增长之后，增速递减，需求下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WTI 油价在 2008 年 7 月 11 日达到本轮最高点 147 美元/桶后迅速下跌，12 月份跌破 40 美元/桶关口并最低下探至 33.87 美元/桶，2009 年均价 62 美元/桶。由于欧佩克严格执行减产协议，2010-2011 年世界油价震荡上行，目前保持在 80-100 美元/桶。俄罗斯作为世界能源大国，占世界能源储量 8%（其中天然气储量占 1/3，石油储量占 1/10，煤炭储量占 1/5）。燃料—动力综合体是俄罗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行业，占俄 GDP20%以上。财政收入 30%、联邦预算收入 50%以及工业产值 25%以上来自能源行业。当下受金融危机和油价波动困扰，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俄罗斯经济 2009 年 GDP 下滑 7.9%，2010 年

增长 3.8%，2011 年为 4%。油价低迷无疑是导致苏联民族分裂、国家解体的传导性因素。以往几十年周期性经济危机只局限于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展和深化，这种经济发展周期效应和影响几乎辐射到全球所有国家，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全球经济为实现整体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呼唤国际政治民主化，推进不同文明经济体间的对话，促进世界多极化时代的到来。

【Abstract】 In 1970s, as No.1 oil exporter and the biggest grain and food importer, the Soviet Union had already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the western-driven international trade system. With a rapid decline in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in the middle 1980s, countermeasure miscarriage of the Soviet Union high-ranking politicians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leading to its disintegration. Grasping the cyclical law of world economy will benefit related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and after-crisis development as well.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Strategy Miscarriag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Аннотация】 В 1970-е годы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тем, как СССР стал крупнейшим в мире экспортером нефти, он также стал крупнейшим в мире импортером зерна 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я, уже тогд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был глубоко вовлечён в ведомую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Западом систем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В середине 1980-х годов в условиях резкого снижения мировых цен на нефть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были допущен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шибки на высоком уровне, что стало одним из важных факторов развала СССР. Позн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циклич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меет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выработки инициативы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 кризису и планирования стратегии 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ировые цены на нефть,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ошибки, развал СССР

(责任编辑 韩冬涛)

中俄和解研究*

任琳**

【内容提要】 研究中俄两国的和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与历史上其他的和解案例相比,近现代历史上两国间交恶的根源迥异。因此,中俄之间的和解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中俄两国之间的和解进程,开始于两国互相积极作出让步,发展于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建立,但是也体现了一定的曲折性。相较于一些欧洲国家间的和解进程,中俄之间的集体身份建构缺乏社会基础,具有一定的难度。

【关键词】 包容性态度 机制化与区域一体化 集体身份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图分类号】 K512.6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1)06-0085-(11)

一、案例选择的学术意义

对于中俄之间是否存在和解的必要性、中俄之间是否实现了和解,政界和学界众说纷纭。分析中俄和解这一案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和学理意义。但是,在回答以上问题之前,需要反思国家间和解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以此做出的研究才具有可信度和科学解释力。区域和国别研究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备受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案例的选择不符合科学的标准,对相应案例在整个案例集中所处的地位不清楚。通过单个案例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具有代表性,无法适用于更广的范围。因此,研究者必须思考“单个案例或者小样本案例的集中研究如何可以启发更大范围的案例分析”^①。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对单个案例和整个案例

* 本文曾于2011年11月8日至12日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亚历山大研究所举行的第11届年会上发表。该届会议主题为“龙与熊: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选择”。感谢与会的亚历山大研究所副所长坎加斯普罗(Markku Kangaspuro)教授等评论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柏林自由大学达雷姆研究院资助了该研究的开展与参会经费。

** 任琳,柏林自由大学全球政治中心,博士候选人。

① Gerring, J.,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67.

集合极其熟悉，并可以就案例的归类作出准确判断。

做国家间和解问题的研究，不可回避的就是分析各种类型的国家间和解案例，包括典型案例、极值案例，甚至异例。如何判断案例的种类，需要对各种案例极其熟悉；此外，需要对和解的定义以及程度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衡量标准。不熟悉相关案例，无法对案例作出有说服力的归类；而没有对和解进行精准定义和衡量基准的准确选择，整个研究就失去了科学性。对整组案例集合的无知，则会导致通过该单一案例或者小样本案例得出的结论难以对其他相关案例的分析产生借鉴作用，因此大大降低了该案例分析的现实和学术意义。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致力于定位中俄和解的案例种类，但在作出任何定论之前，本文首先对现存的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对国家间和解提出科学性的定义；同时，为分析国家间的和解提出一些可供衡量的指标（变量）。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观察某一案例中是否具备这些有理论相关性的变量，来衡量一个案例是否可以作为典型案例^①。

二、和解的定义

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和解定义作出了努力。但是关于和解的定义，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争议。例如有的学者质疑，和解到底是一种过程还是一种结果^②；有的文献也将和解的实现等同于和平^③。之所以出现这些争论，原因之一是，和解作为一个研究选题，具有很大的测量难度。

同样，国家间和解的概念很容易与冲突解决（conflict resolution）的概念混淆。更多的时候，将两者混淆也是因为对国家和解的程度进行测量有一定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和解与冲突解决后的国家关系表现形式相类似。相对来说，通过和平的稳定程度来测量冲突解决的程度已经比较成熟。然而，两个国家实现了和解，不仅仅意味着消除了冲突，而是如凯尔曼（Kelman）所指出的，和解是指“以往敌对国家群体之间相互认识和感受的改变，同时也指它们学会了如何共处”。^④在一定意义上，和解是维和的最高阶段^⑤。和解后的原敌对国可以超越单纯“安全困境”的思维

① Gerring, 2007, p.86.

② Bar-Tal.D., G.H. Bennink, “The Nature of Reconciliation as an Outcome and as a Process”, *From conflict resolution to reconciliation*, 2004, pp. 11-38.

③ Miller.B., and Research Group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hen, and How, Regions Become Peaceful: Explaining Transitions from War to Peace*. Research Group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roupe d'étude et de recherche sur la sécurité internationale), 2001.

④ Kelman.H.C, “Reconciliation from a Social-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 2008, p.16.

⑤ Kelman.H.C, “Reconciliation from a Social-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pp.15-18.

逻辑，进而重新审视双边关系。可见，和解更多的是指原敌对国在心理上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敌对情绪，做到与原“仇人”和睦相处。

中苏之间的交恶并非源于战争。相反，在交恶之前，中苏之间处于相对融洽的关系之中。中苏之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存在着坚实的“兄弟情谊”。苏联模式以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起着模范示范作用。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中苏合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然而，此后两国关系突然发生了急剧转折。接踵而至的是，苏联撤走了大批的在华专家，六十年代中苏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边境冲突。麦农（Menon）形象地描述这一转折：“以往的精神伙伴和同盟，一朝交恶并在大片存有争议的边境聚集了大批的军队”^①。

对于中俄之间是否需要和解的疑问产生于对和解概念的不同理解。之所以需要和解，很多定义的预设前提是国家间是因为战争而交恶。然而国家间的交恶并非仅仅源于战争。重大核心利益的冲突，也可能造成国家间的交恶与国民间的相互憎恨。如何消除相互之间的憎恨、重建互信，是和解的核心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中俄之间在二战前后一直到当代并未发生重大的战事冲突，中俄之间关系骤然恶化的案例也可以纳入和解研究的案例集合。

三、案例简介

前文已经简单介绍了历史上中苏交恶的原因。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俄两国之间陆续出现了积极的和解征兆。然而，众多文献认为，尽管恢复交恶状态几乎已不可能，但和解的进程也不是绝对的乐观。其中诺林（Norling）认为，“尽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双边关系得以改善，二十一世纪的双边关系仍然非常不稳定”^②。莫尔兹（Moltz）较之更为悲观，他观察了远东地区的社会情绪，从而得出结论：不断加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联系，不仅对改善双边关系发挥了作用，同时也“给远东地区的社会脉络带来重大的压力”^③，从而引发了远东地区人民的排华情绪。最为悲观的看法是，认为中俄之间的相互敌视在“经济上、组织上和心理上都是不可消除的”^④。麦农对中俄关系作出了最为乐观的预测。但是他也强调，“在严格意义

① Menon.R., “The Strategic Convergence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Survival* 39, no.2, 1997, pp.101-125.

② Norling. N., “China and Russia: Partners with Tensions”, *Policy Perspectives* 4, no.1, 2007, p.33.

③ Moltz.J.C., “Regional Tensions in the Russo-Chinese Rapprochement”, *Asian Survey* 35, no.6, 1995, p.511.

④ Tat'yana Smirnova, “Dyrka v Derzhavnom Zabore”, *Utro Rossii (Vladivostok daily)*, 1992, p.3.

上，它们也不受联盟关系的制约”^①。

因此，和解的最佳结果是中俄两国在战略一致的基础上结成伙伴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俄和解的表现形式。它体现了两国和解进程所达到的阶段与程度。在此框架下，中俄边界问题得以解决，两国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车臣问题、联合反恐问题上达成共识，在经贸、军事领域展开合作，这符合中俄两国的根本利益。但是，当两国根本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性如何呢？或者换句话说，各种和解努力的结果到底如何呢？

四、文献综述 & 和解的理论指标

任何分析指标的提出，都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为此，本部分将着重分析已有的相关文献中针对和解研究存在的各种理论指标，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概括和完善，以适用于本文的分析。

凯尔曼（Kelman）从心理学、行为科学的角度研究国家在和解过程中的态度转变。他将国家间的和解放在一个过程中进行研究。国家间的和解，首先需要克服原先的敌对情绪，经历表面的和解，最终达到实质性的和解。他分析了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与和解，并认为实现态度转变是和解的关键。他总结了实现态度转变的三个必经阶段：遵守（compliance）阶段、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阶段和内化（internalization）阶段^②。他并不排除三种阶段性的行为方式同时出现的可能性。通过观察国家之间是否出现了遵守行为、身份认同行为和规范内化行为，可以断定国家间的和解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在不同时期，起作用的自变量是不同的。他认为，“三个不同阶段的决定性因素可以相互区别，区别的依据是预期效果的性质不同、行为体权力的来源不同、首选的诱导反应不同。遵守阶段是指个体为了获得对方的宽容和接纳，而竭力接受对方的要求；身份认同阶段是指个体致力于重新塑造出对方愿意接受的某种身份，以获得对方的认可；内化阶段是指个体作出某种决策或者表现出某种行为模式，是由于这种决策和行为与该个体的价值体系相一致^③”。在凯尔曼接下来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他借助这种模式跟踪分析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解进程。凯尔曼的三种态度转变模式被许多学者用于研究国家间关系。他对于态度转变的重视也为研究国家间和解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① Menon, 1997, pp.101-125.

② Kelman.H.C., “Compliance,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Three Processes of Attitude Chang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 no.1, 1958, pp.51-60.

③ Ibid.

库普乾（Kupchan）也将和解分解为几个连续性的阶段进行研究。他用来衡量和解程度的理论指标依次是相互克制、社会性融合、产生新的身份认同。库普乾通过采用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主张，用以叙述不同和解阶段的表象与实质。他认为，在最初阶段，国家会出于“战略需要和客观的国家利益”^①，作出各种“缓解性”的主动让步，从而获取原先敌对国家的信任。除此之外，建构主义也辅助解释了国家如何判断对方是否是善意的。所以，他将适用于最初阶段的理论模式归纳为“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的综合”（realist-constructivist synthesis）。在接下来的阶段，和解实现了质的“飞跃”。即国家接受并且内化了新的规范和身份，并将其内化为自身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一部分。新的规范和身份产生于国家互动过程中，特别是许多国家间通过互动实现了相关领域高度的机制化，在有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德国与法国，将两国行为放置在欧盟的框架之下，实现了高度的地区一体化。国家在新的身份框架下重新定义了自身的利益，因此，此后国家表现出了不同的行为取向。库普乾认为，在这一阶段，“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综合”（liberal-constructivist synthesis）可以承担起为该阶段的和解行为与结果提供理论解释的任务。库普乾添加了机制化和区域一体化等因素对和解进程的影响分析，对凯尔曼的解释模型和理论指标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在有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塑造新的集体身份和认同，可以实现国家间实质性的和解。而在有的国家之间，为什么这条路走不通？库普乾和凯尔曼都没有作出详细和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原因在于，就集体身份形成的可能性，两者都没有从国内因素和社会性因素进行论证。

米勒（Miller）通过关注“由内到外”的和解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米勒论述了实现国家间和解“由外到内”和“由内到外”的两种渠道。其中“由外到内”的和解措施主要是指通过大国干预实现和解。但是他认为，“由外到内”的措施只能使原敌对国家达到冷和平（cold peace）的状态，无法实现实质性的和解。他认为，国内因素是影响和解成败的最重要因素。他区分了两种可能的和解结果：分别为区域性社会（regional society）和区域性共同体（regional community）。区域性社会描述了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其他特征的国家和平共存的一种状态；区域性共同体描述了一种更为融合的国家间关系：原先的敌对国家可以超越彼此间纯粹的利益计算实现实质性和解，原因是它们处于“一个创立超国家机构的过程之中，现存的国家主权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弱化”^②。因此，区域性社会和区域性共同体都是建立在国家和地区事务实现高度机制化的基础之上的。

① Kupchan. C.,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0.

② Miller, 2001, p.11.

总结并完善以上各位学者的理论探讨，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如下表所示。和解需要经历初期、巩固和实质性和解三个阶段；相应的影响变量为包容性态度、机制化与地区一体化和集体身份；作用机制分别为战略性让步、信誉塑造和规范内化。一般意义上，三个阶段是具有连续性的，前者是后续阶段的基础，但是并不排除各个阶段具有同步性，这与凯尔曼的预设是一致的。下文的分析，将依据这些理论指标展开，通过观察中俄之间的互动特征，判断中俄之间和解所属的案例类型。

和解的阶段	自变量	特征与机制
和解初期	迎合性、包容性态度	战略性让步
和解巩固	机制化与地区一体化	信誉塑造
实质性和解	集体身份与利益重塑	规范内化

五、各指标框架下的案例分析

（一）让步和包容性态度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俄罗斯和中国都表现出了包容的态度。双方保持了密切的政治关系。叶利钦在 1992 年和 1996 年访问北京，而江泽民则在 1994 年、1995 年和 1997 年相继访问了莫斯科。双方开始了频繁的政治互动。首脑互访和频繁的高峰会议反映出积极主动、相互包容的态度不仅来自北京一方，也来自莫斯科一方。

即使在此期间，和解是出于对战略部署的重估，两国政府也都对与对方协调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双方在这段时间里都采取了一系列互相安抚的措施。削减敏感边境地区的军事武装，就是对原战略性敌对方最有说服力的让步措施之一。俄罗斯从蒙古撤出了所驻扎的部队，这一过程在 1992 年完成。自 1995 年起，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削减了 15 万军队^①。俄罗斯参与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代表团，目的在于克制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军事演习。这一行动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家与中国接壤。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中国还与该地区国家签署了一系列正规的协议。例如，1996 年叶利钦访问上海期间，中国与独联体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其中包括减少军备武装、限制诉诸武力，以及保证边境 100 公里内没有大规模军事活动的规定^②。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的军力削减是出于应对燃料供应临时性短缺和经济萎缩的考虑，但这些让步措施在客观上确实有助于缓解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除此之外，就一系列其

^① Tokyo Shimbun, 30 April 1996, p.2, translated in FBIS-SOV, 2 May 1996, p.18.

^② Rossiiskie vesti, 23 April 1996, p.2, translated in FBIS-SOV, 24 April 1996, pp.13-14.

他的政治问题，两国达成了共识。例如，中国支持俄罗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俄罗斯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罗斯避免与台湾当局进行官方接触。

因此，让步和包容政策确实存在于两国和解的初期阶段，并成为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起点。主动让步是本和解阶段的主要特征，库普乾认为，与原先竞争对手的积极的外交接触和让步，是一种改善双边关系的主要“货币”。他认为，“核心国家远离对抗性竞争为和解奠定了基础”^①。“高成本”的让步和包容政策表明了消除敌对意图的决心，为实现和解提供了一种善意的“高成本的信号”。其中裁减军事力量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善意“信号”之一。

（二）机制化与地区一体化

不同于其他的和解案例，中俄之间和解的第一和第二阶段几乎同时发生。中俄之间通过一定程度的机制化重建双边关系，已经出现了超越初期的相互让步阶段的阶段特征。与此同时，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双边机制。显然，利他主义不是推动俄罗斯和中国走得更近的动力。挑战性的国际环境和各自的国内需求，是迫使俄罗斯和中国建立紧密关系的催化剂。例如，有学者提出，需要关注美国因素对中俄关系的影响：中俄“相互关系的维系不是通过信任和善意，而是计算自我的利益和渴望平衡与第三方的关系，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美国因素的影响”^②。因此，重新塑造维系双边友谊的纽带，需要重新定义共同利益并作出相应的妥协。

然而，两者之间的战略利益趋同程度如何？是否能将欧洲区域一体化的和解经验类推到该地区？通过区域一体化是实现实质性和解的一种有效路径：具体而言，以往的敌对国家可以享受高度制度化带来的稳定的双边关系；与此同时，融入区域化进程，则可以更多地从区域的利益出发作出决策。然而，中俄之间既有战略趋同，同时也存在战略分歧。战略分歧的存在增加了消除原有怨恨的难度。

将双边合作和双边共识纳入区域性机制的框架，有助于保证稳定的双边关系具有持久性。这一论述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是鉴于国家会考虑打破一个成型机构的“成本”，所以它们不会轻易破坏它。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沉没成本”(sunk cost)：“一个与经济利益相悖的行为表现为：一旦投入了金钱、精力或时间，行为体将会继续致力于相应的投资，从而维持该投入的稳定状态”。^③

中俄双边协定将双边关系纳入合法的文件框架之下，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两国在边境地区的互信，对动用武力进行了限制，从而确保了中俄睦邻友好关系的实现。

① Kupchan, 2010, p.36.

② Menon, 1997, p.101.

③ Arkes.H.R.,P. Ayton, “The Sunk Cost and Concorde Effects: Are Humans Less Rational Than Lower Animal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 no.5, 1999, p.591; Arkes, H.R., C. Blumer, “The Psychology of Sunk Cost* 1”,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35, no.1, 1985, pp.124-140.

这些协定包括：1991 年签订的《中苏东段国界协定》、1996 年达成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7 年签订的《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2001 年签订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等。

制度主义认为，越来越多的跨境贸易使国家处于更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之中。跨境贸易已占到整个俄罗斯和中国之间贸易额的三分之一^①，交易量从 1984 年的 3.7 亿美元攀升至 1991 年的 60 亿美元。然而，中俄之间的相互依存也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和不可预测性。

脆弱性首先体现在相互依存的社会基础不牢固。在俄罗斯和中国的某些边境地区，紧张状态仍然存在，例如远东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些紧张状态。正如莫尔兹所说，贸易带来的“这些新的纽带，在带来明显好处的同时，也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一地区对这些戏剧性的变化，远没有像相对较为市场化的中国那样做好准备”^②。他还指出，“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居民，认为中国欺骗俄罗斯，从他们那里偷窃、威胁他们的领土”^③。这也成为在俄罗斯国内盛行的“中国威胁论”的一种说法：他们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合法和非法的移民，以及不平等的贸易，在俄罗斯远东进行悄悄地势力扩张。面对远东地区民众的这种受威胁的感受，俄罗斯政府作出了回应：1994 年对中国游客的签证进行严格控制。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对中国公民实行严格签证限制的同一年，俄罗斯和中国官方决定打造“战略友好协作关系”。

其次，相互依存的脆弱性还体现在中俄之间的和解进程与地区一体化相融合的可能性不大。希米范尼希（Schimmelfennig）认为区域一体化是制度化的最高表现形式^④。它基于经济的相互依存而建立，但它必须确保当事国的意图是善意的。一旦当事国进入制度化阶段，它们将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并重新计算它们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和解并没有进入依存理论文献所建议的理想化模式的轨道。但是中俄在此地区的互动，呈现出另外一种特殊形式。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将中俄在中亚的战略利益协调纳入正式的机制之下。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一方面，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平衡、消减了冲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两国也逐渐被融入到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中。与德法两国和解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同步性大相径庭的是，中俄尽管在中亚一体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这种一体化并未给“集体身份”的形成奠定基础。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

① Menon, 1997.

② Moltz, 1995, p.511.

③ Moltz, 1995, p.511.

④ Schimmelfennig, F., *Internationale Politik*. Vol. 3107: Utb, 2010, p.290.

俄两国在该地区具有利益碰撞的可能性。

中亚国家对中俄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中国是中亚国家的第二大邻国，中亚国家的稳定是中国西部地区稳定的重要国际环境。中亚有丰富的能源，与中国有着紧密的经贸关系。同时，中亚大部分国家在冷战时期及以前曾属于苏联的版图，今日的俄罗斯也有想在中亚地区左右大局的“嫌疑”，加上中亚各国的能源出口与俄罗斯的经济利益有所冲突，所以对俄罗斯来说，该地区仍然具有很高的政治、经济敏感度。很多西方学者推论中俄在该地区十分容易引发纷争。因此，将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纳入制度性的合作机制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然而，两个大国通过地区一体化形成“集体身份”的可能性很低。

双边的让步政策，为和解提供了必需的基础。根据自由主义的观点，可以对接下来的国家行为逻辑作出推论：当事国逐步通过机制化的利益协调，增加透明度、巩固相应机制促成合作，激励国家间互信度的培育。国家的自我克制表现为积极参与制度化进程，这可以向以往敌对国家传递友好信息；而融入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追求一种区域层面的身份，则反映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制度化。自由主义解释的逻辑表现为“竞争让位于国际制度，通过增加透明度的方式使合作机制化、建立执法机制、以诱导国家遵守规定、并使国家可以培育互惠的声誉”^①。如果一个区域的身份诞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将有可能根据一种新的地区“成员”身份，重新计算自己的利益，如德国和法国，根据作为“欧洲共同体”成员的标准，作出外交决策，这为他们作出进一步的妥协、缓解双边关系，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然而，现有的中俄两国关系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战略安排，即实现了一定的制度化水平，但并未为培育可以包容两国的“集体身份”提供基础。地缘政治在双边关系中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增长的不平衡、权力的不对称、能源利益的分歧，仍然是中俄关系不确定性的来源。

（三）集体身份

集体身份的形成往往建立在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除此之外，国家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也可以决定它对某一集体身份的需求程度和接受程度。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寻找“自我”（ego）的历史历程。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也一直致力于寻找可以为其外交战略“量体裁衣”的身份定位。在经受解体剧变的同时，俄罗斯也面临着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俄罗斯陷入深刻的思索：如何定位新世纪自身的身份？

俄罗斯应该往何处去？俄罗斯应如何重新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进一步定位其身份，是一个紧迫的问题。然而，出于复杂的战略考虑，俄罗斯的身份定位具有巨

^① Kupchan, 2010, p.43.

大的不确定性。俄罗斯是该“游荡回华盛顿的怀抱”^①？还是应该更多地参与到东方世界，特别是向中国一方做出战略偏好的转移？寻找“自我”是俄罗斯目前面临的挑战，也是造成中俄两国集体身份形成不确定性的根源。

从叶利钦到普京执政期间，俄罗斯经历了一些身份定位的变化。在冷战结束初期阶段，具体到 1992 年至 1999 年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俄罗斯的主流是“向西方看齐”^②，但是，俄罗斯也因为地缘政治的考虑，及时将对东方的重视提上日程。主要表现在叶利钦与江泽民之间的良性互动，首脑会议达到七次之多。部分原因是因为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并未明朗决策是否“回到华盛顿的怀抱”。苏联解体后，西方的势力扩张到前苏联的势力范围（例如东欧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俄罗斯造成了战略性威胁。冷战后的短期内，俄罗斯尚未明确如何布置战略，定位自身身份。与中国和解成为朋友，远比有一个心怀敌意的邻居要更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普京上台后，尤其是后“9·11”时代，俄罗斯似乎又有向西方转移的趋势。中国开始对俄罗斯如何定义其归属愈加迷惑。然而，在西方大力推动“颜色革命”的背景之下，在一些关键政治领域，俄罗斯再次将重心摆向东方，尤其是中国。

当两个昔日的对手共享一个集体身份时，可以模糊一些旧的冲突点，放弃地缘政治的角逐。但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很难形成一种集体认同，这是因为俄罗斯对自身的定位具有极大的摇摆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通过塑造集体身份深化和解的路径在此案例中不可行。但是这并未影响中俄之间的和解，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也呈现出稳定的态势。因此，中俄和解虽未遵行理想的理论模式，但是和解却实现了，并走向了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至于这一模式的稳定性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六、结论

冷战后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没有达到最实质性和解的稳定状态，但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之间的和解，并未完全遵循本文确定的理论框架和阶段性的进程，几个阶段呈现出了同步性。但是这仍然不能说明中俄和解的案例是和解研究中的一个异例，因为主要变量与和解程度仍然是大致上呈正相关性：集体身份弱，则和解结果稳定性弱；反之，集体身份强，和解结果稳定性强。相对较弱的机制化不可能使两国走入绝对性的和解阶段，现实主义仍然是解释中俄和解以及中俄关系的主导范式。地区主义和集体身份理论在此案例中解释力有限。按照凯尔曼等学者的预设，两国之间在后冲突时代的关系，只有进入和

① Norling, 2007, p.33.

② Ibid.

解的最后阶段，即实现稳定和实质性的和解，构建出新的集体身份，才能实现理想化的最稳定状态。但是摆在中俄双方面前的主要障碍，是俄罗斯对于如何认识和定位自身的身份归属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困扰俄罗斯的仍是那个“古老”的问题：俄罗斯该向西方走近，还是该对东方有归属感？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Sino-Russian reconcili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oth practically and academically. Compared with other reconciliation cases, the origin of Sino-Russian hostility is rather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i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Therefore, Sino-Russian reconciliation is peculiar to a certain extent. To begin with, these two countries made concessions actively. Then they established a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with twists and turns. Different from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llective identity within Sino-Russian reconciliation lacks social foundation, which leads to some difficulty

【 Key Words 】 Accommodating Attitud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Collective identity,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 Аннотация 】 Изучения примирения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имеет важное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и науч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иным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и случаями примирения, вражда дву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обладает абсолютно отличными корням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имирение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проявляет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специфику. Процесс примир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начался с того, что обе страны активно пошли на уступки, процветание началось с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но и проявились также некоторые перекосы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процесса примирения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в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и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отсутствовала социальная база, ч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из себя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степень сложност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отношение про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партнёрств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苏联解体·认知篇

世界殖民帝国历史的和平结束

——21世纪初俄国人对苏联解体的认知

林精华*

【内容提要】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联解体已成为历史。对此，俄国人也越来越能摆脱当事者的情绪，冷静、理性地看待这个事件及其后果。其中，别洛韦日协定签署的见证者、又亲历了俄联邦初期诸多政治事件的俄罗斯前代总理盖达尔，退出政坛后专心研究俄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杰作《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显示了俄国人认识苏联解体问题的进步：苏联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把帝国版图扩张到了极致；相应的，就必须强化帝国治理方式，高成本地管理联盟及各加盟共和国，高代价地维护苏联帝国在全球各个角落的利益。这种帝国治理方式，最终使帝国自身难以为继，哪怕叶利钦等人强行终止苏联是违宪的，也没有产生足够的维护联盟的力量而抵抗之。

【关键词】苏联解体 帝国治理 内政成本 外交代价

【中图分类号】K512.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6-0096-(22)

2011年3月2日，正值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ёв）八十寿辰。梅德韦杰夫总统授予其俄国最高勋章“圣徒安德烈勋章”，以表彰他在苏联末期担任国家领导人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此举意味着，这不仅仅是对其后苏联俄国带来民主和自由的再次肯定，而且也可能意味着俄国人较此前释怀了苏联瓦解带来的集体创伤，还体现出对俄罗斯帝国的苏联阶段的认知有了较大的更新。因为在相对民主的体制下，这种具有国家导向性的政治举措，当然不是总统个人的心血来潮之举，背后有着俄国政治和文化精英对苏联解体之认

* 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文学院比较文学系主任和博士生导师、外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识深化的推动力，更有国民不再沉迷于往日的帝国情怀、不为怀旧苏联的情绪所左右的民意。有意味的是，我们认为这种表明俄国人能够超越苏联历史框架看苏联解体以及有关的人和事的行为，此前已产生过：2007年4月23日，对苏联解体起了更为关键性作用的叶利钦（Борис Ельцин）去世，普京总统当时宣布，25号为全国哀悼日，政府为其举行国葬，并高度评价叶利钦是“率直而勇敢的国家领袖”；前俄联邦副总理、现任统一民主运动“团结”政治顾问与“没有专横和腐败之俄国”人民自由党主席鲍里斯·涅姆佐夫（Борис Немцов）公开表示，叶利钦很爱国，却不被俄国民众所理解，“他将作为解放国家并使国民获得自由而尝试一切的领袖走入历史。若不昧良心，俄国人都会承认这一点”；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Жириновский）评价道，叶利钦最大的功绩在于让俄国获得了九年的完全自由。^①

然而，1990年代则远不是这种情景：促成苏联解体的改革和苏联解体本身，换来的不是西方支持、民生的切实改善，后苏联俄联邦在所谓“民主制”催生下出现了暴富和赤贫的合法分化，对现实失望的国民，迁怒于造成这种后果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于是，“苏联”成了获得政治自由的俄联邦居民的复杂纠结。一方面，声讨苏联罪恶的声浪如排山倒海之势席卷社会各阶层，曾被苏联当局禁止的各种文本和人士在此期间仍持续地回流，形成了“回归文学”浪潮，这使得刚刚从苏联走过来的俄国人晕头转向（不知道是要回到历史，还是放下历史包袱而前行）；另一方面，国民对苏联解体充满着无奈、怨恨、失落等情绪，对造成苏联解体的诸多重要责任者满腹愤恨。例如，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10月15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民主化兴盛的苏联，问题丛生，许多人已经看到国家不可收拾的败象，苏联许多重要媒体、党派不是祝贺，而是极尽嘲讽之能事，以至于戈尔巴乔夫当时无法亲临现场领奖、演讲。苏联解体不久，苏联最后一任驻英大使列昂尼德·扎米亚京（Леонид Замятин）的《戈尔比和玛吉：一位大师谈两位著名人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以亲历者身份说，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的角色，和撒切尔夫人没能成功维护大英帝国的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种情形，也披露了戈尔巴乔夫没能维护苏联的许多历史细节^②。而叶利钦在俄国受尊敬的程度更低：1996年6月16日总统大选，叶利钦得票率仅为35.28%，比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只多了3.24%。因支持率都未过半，7月3日进行第二轮选举，结果叶利钦以现职总统掌握选举资源的优势，操纵民主，得以连任，但当时和过后许多人都指责叶利钦徇私舞弊。两年后（1998年9月6日），著名的《新

^① 根据当日和第二日的独立台新闻报道整理。

^② См. Леонид Замятин. Горби и Мэгги: Записки посла о двух известных политиках: М. Горбачеве, М. Тетчер. М.: Оформление, ПИК ВИНТИ, 1995.

时代》杂志刊文《叶利钦时代的终结》，引发社会效应，使这年 10 月民意测验，只有 4% 民众信任叶利钦能继续成为总统^①。进入 21 世纪，人们虽然由对现实的失望转化为对苏联的怀旧，但后苏联俄联邦国家秩序的恢复、社会的重建，是以牺牲苏联末期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为代价的，因而怀旧不意味着回避苏联解体问题，只是随着时间的延伸，“苏联”越来越成为历史的认知对象。

的确，由于苏联解体及其后的俄国社会长期动荡，1990 年代国民在享受政治自由的同时，很多人对造成苏联解体的主要肇始者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不能释怀，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甚至冷战对手的智库专家——从苏联学家转化而来的斯拉夫学家杰纳吉斯（Christopher I. Xenakis），在《苏联出了什么事？美国的苏联学研究者如何又为何吃惊》中也表示疑惑：“1989 年苏联共产主义失去合法性和 1991 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改革促成的突如其来的这些戏剧性事件，为何会引发政治学家的措手不及（surprise）？为何美国绝大多数苏联研究专家会错误预言发生在苏联的重大变革（significant innovation），无论是哪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变革的可能性呢？为何大部分美国苏联学家没能触及到 1970-80 年代已经明显表征着苏联要发生巨变的迹象呢？”^②。这些疑惑，除了表明把苏联解体归罪于冷战对手的阴谋行为所致之说，缺乏足够说服力之外^③，还预示着戈尔巴乔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对他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戈尔巴乔夫时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总统委员会委员、现任俄联邦科学院通讯院士的瓦吉姆·梅德韦杰夫（Вадим Медведев），苏联解体不久推出的《在戈尔巴乔夫的团队里：内情窥探》如是说，1960 年代改革和外部经济因素的作用，使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1）成为苏联经济发展最后一个顺利时期，但此后经济发展局势迅速恶化，最后的两个五年计划全部破产，只有军工企业繁荣，国家力不从心地为庞大的军费开支疲于奔命，这与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不是没有关系的^④。俄国人是这样对待戈尔巴乔夫，斯拉夫学者的诸多研究亦然，如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在苏联尚未解体之际所出版的著作《戈尔巴乔夫及其下台之后》，以及普赖斯—琼斯（David Pryce-Jones）的《从未发生过的战争：1985-1991 年的苏维埃帝国》等都有所提及，1985 年以后苏联领导人的种种主观决定，或者所犯错误，确实在许多方面导致了苏联问题持续

① 根据独立台十月下旬的新闻节目。

② Christopher I. Xenakis, *What happened to the soviet union? How and why American Sovietologists were caught by surprise*,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2, pp.1-2, 16.

③ 近年来公布的大量档案显示，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俄改革及其解体的判断确实是很不准确的。

④ Вадим Медведев. В команде Горбачева: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М.: Былина, 1994. С.6-7.

恶化，酿成无法收拾的结局^①。但是，俄联邦最初十年进程并未能使大多数国民如意，20-21 世纪之交以来，出现对苏联的怀旧情绪，知识界也减少了对苏联和苏联解体的怨恨，把苏联解体置于更大空间和更长时段来认知。其中，鲍里斯·拉文(Борис Равин)的《当代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诠释》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并不图谋建立资本主义或效仿美国社会运转模式，而是发现和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潜力”，并为其补充以社会为取向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而叶利钦改变了这个方向——使俄国西方化(提出并推行“休克疗法”，开展发放私有化债券的“私有化”运动)，并无视 1991 年几次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同意保留联盟但要对联盟进行改革)，还秘密瓦解联盟、攻打白宫、发动车臣战争等，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改革试图是扩大社会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但叶利钦改革优先考虑的是寡头家族利益^②。这样深入苏联解体的论著还有：布兹加林(В. Бузгалин)和科尔加诺夫(А. Колганов)的《斯大林与苏联解体》，认为苏联解体并非只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造成的，斯大林及其体制已决定了苏联解体的基本趋势；科列姆涅夫(П. П. Кремнев)的《苏联解体：国际法问题》认为，苏联解体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背离国际法进程；别尔维欣(Вадим Первышин)的《苏联之解体：1946-1991 年苏联历史(历史研究)》，把苏联解体放入更长的历史时段中考察，不认为这是一个独立事件；巴纳林(Игорь Панарин)的《第一次世界信息战争：苏联解体》，把苏联解体置于更大空间中观察，看到苏联解体的世界性因素^③。当然，在苏联解体问题上，这种以反思性分析替代情绪性批判的普遍化，得益于普京任代总统前夕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国》所论，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岁月是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否定这个事实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巨大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主要错误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方式发展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点多么痛苦，但我们将近 70 年都在这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计划体制和苏共垄断全部权力必然导致国家僵化；不久(2000 年 2 月 9 日)，普京在《共青团真理报》社回答读者关于苏联解体问题时再重复了这种观点，并断言“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那就是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当时大多数人已不珍惜国家，

① Stephen White, *Gorbachev and af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In David Pryce-Jones, *The War that Never Was: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1985 - 1991*.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1995.

②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纂：《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 20 年后的评说》，李京洲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第 120 页。

③ П. Кремнев. *Распад ССС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ые проблемы*. М.: Зерцало, 2005. В. Бузгалин и А. Колганов. *Сталин и распад СССР*. М.: Е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2003; В. Первышин. *Развал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с 1946 по 1991 гг. :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 : Компания Спутник, 2007; И. Панарин.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война. Развал СССР*. СПб.(и др.): Питер, 2010.

这样的国家不为人民所需”，这种体制是“俄国人已不能承受”^①。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说西方和戈尔巴乔夫合谋瓦解苏联之声仍余音缭绕，如纳乌莫夫（В. И. Наумов）《有预谋的苏联解体：伟大的悲剧》^②，但显然已不再是主流性论述。

实际上，俄国逐渐改变对苏联解体认知的过程，也正是国际学术界对苏联解体认识深化的过程：庞大的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仅仅六年后，就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解体，这应该不是任何个人能量所能为的。若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也是由苏联政治经济局势所决定的，这期间叶利钦所起的作用更大。并且，就历史发展过程而言，苏联解体使俄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正如十月革命使俄国由刚刚结束帝制的共和时代进入更为帝国化的苏维埃政权时代，苏联解体使俄罗斯帝国又一次发生了转折。论及帝国，苏联解体意义就不仅是相对于俄国而言的，也是世界大帝国瓦解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具有世界意义。

—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的确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解体后不久，作为苏联解体过程的亲历者瓦吉姆·梅德韦杰夫，在那部《在戈尔巴乔夫的团队里：内情窥探》中如是回顾道：真正的改革始于1987年，这年苏联出现了三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对政治体制改革给予发轫性推动作用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制定经济改革综合方案的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会，十月革命70周年到来，对苏联历史及其各重要阶段进行重新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变革”^③。但这些变化并非临时出现的，有其变化过程：1973年，当时已是苏共中央委员、代理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长的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在《文学报》撰文批评苏联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他因此被贬为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十年），在得到戈尔巴乔夫重用（升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后不久（1985年12月），便致函中央说，“如今问题已不仅是经济——这是苏联进程的物质基础，关键在于政治制度……需要彻底真正的民主制度。民主，首先是选举的自由……从没有或不能选举的历史时代转变到人人参与民主的时代”^④——这是展开对苏联政治进行根本性变革的第一份重要文献。可是，一旦实施这样的改革，就要触动苏联体制。1986年9月末，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Виктор Чебриков）提议，必须释放一半政治犯，但

① 《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2年，第5页。

② В.И.Наумов. Преднамеренный развал СССР : Вселен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М. : URSS: КомКнига, 2006.

③ Вадим Медведев. В команде Горбачева: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М.: Былина, 1994. С.42.

④ А.Н.Яковлев. Омут памяти: от Столыпина доПутина. М.:Вагриус, 2001. С.372.

结果换来的不是对苏共敢于纠正错误的肯定，而是引发了更为激烈的政治诉求。还有，接下来的电影工作者协会、戏剧家协会、大型文学杂志等正常的领导换届，苏共如往常那样进行人事安排，结果所提出的候选人无一当选。可见，这样的改革已肇始了苏联解体，责任未必在“改革”，而在于改革的对象——苏联体制本身，按别洛韦日协定签署的见证者、又亲历了后苏联俄国初期诸多政治事件的俄联邦首任代总理叶戈尔·盖达尔的《帝国消亡：当代俄国的教训》所说，“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所形成的各项制度太过僵硬，不能让国家适应20世纪末世界发展的各种挑战。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遗产、超常的国防负担、严重的农业危机、加工部门缺乏竞争力，都使得这一制度的崩溃无可避免。1970-1980年代初期，这些问题还可以依靠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进行调节，但要保全最后的帝国，这可不是足够牢固的基础”^①。正因为问题是在苏联帝国本身，所以无论戈尔巴乔夫怎样努力维护苏联，都无济于事，如1991年初就新联盟国家草案进行激烈辩论时，戈尔巴乔夫根据自己所提供的方案，智慧地于3月17日举行全民公决，结果如愿—76.4%的人赞成保留苏联，并使之成为充分保障各民族权利、自由平等的主权共和国的新联盟，但也没能挽救苏联。

据此便可以说，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自行解体、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苏联红旗随之被俄联邦三色旗所代替，仅仅是苏联历史发展到最后的象征而已，其实苏联解体的实质性过程在此前就已经开始了。1991年12月8日，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了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别洛韦日协定）——“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是苏联的创始国，签署了1922年的联盟条约。我们现在指出，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我们将要停止其存在”，就已决定了苏联终结的命运（12月10-12日各加盟共和国苏维埃纷纷通过表决加入这个协定）。而且，还必须看到，“别洛韦日协定”还只是苏联解体的法律形式，如在1991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各共和国苏维埃修改通过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随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等会晤决定，本条约将于8月20日由各加盟共和国签署实施。

可是，就在这一有可能使苏联帝国平稳有序地转成新联盟的手续履行之前夕，苏联副总统、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军事工业委员会领导人、陆军总司令等，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支持下，使用武力，宣布全苏处于紧急状态，苏联政权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只是因军队拒绝执行委员会向继续游行的民众动武的命令，该委员会只维持了三天就以颠覆国家的罪名被解散了，其成员受审。就

^① [俄]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

是这个失败的“八一九事件”，连同此前持续两年多之久的社会动荡，已经从多方面表明，苏联政府和议会已无力掌控军队、安全、货币、税收、司法、经济等所有重要的内政（同时，也难以处理外交和国际事务），苏联及其政治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基础。换句话说，苏联不能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命运是由其自身决定的，而且这种情形当时就被市民意识到了：“八一九事件”后不久，《生意人报》发表M·索科洛夫的《感谢上帝，改革结束了》（1991年8月26日）称：“这次创造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先例——73年来，公民首次迫使子弹已经上膛的国家屈服”，“这次政变中触犯法律的，实际上是苏联的各领导部门：强力部门、权力执行机关、立法机构、党的权力机关。而当一个国家所有上层人物或者成为罪犯，或者成为帮凶，他们在人民面前就遭遇了毁灭性失败，这样的国家显然再无法立足。国家领导人陷入了政治虚无之中，便会从政治真空中产生某种另外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要产生，而且不只一个”^①。

其实，早在1991年7月30日，戈尔巴乔夫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已经同意用地税替代国税，代表国家的苏联政府的所有开支完全依赖各共和国政府，这实际上已在经济命脉上终结苏联中央政府的存在了。此外，一年多以前（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还这样规定苏联总统职责：要维护苏联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维护苏联宪法和法律，要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苏联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实现苏联民族国家制度原则。然而，1991年11月16日叶利钦发布10项俄联邦总统令，包括接管联盟中央一系列财政金融部门，一周后叶利钦又宣布由俄中央银行接管苏联国家银行对外经济事务、停止俄联邦境内的苏共活动、撤销在俄境内的克格勃和内务部以及军事机关中的苏共党组织、暂停共产党报刊的出版、将苏联中央电视台收归俄联邦所有等，并解除了全苏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塔斯社和苏联新闻社领导人的职务等。尤其是，签订别洛韦日协定以及其后各共和国领导人在莫斯科紧急磋商苏联解体的具体事务，12月21日叶利钦和其他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共同发表《阿拉木图宣言》，这些终结苏联的实际行动，都未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戈尔巴乔夫身为总统知道事情的进展，却无法按照宪法规定履行捍卫苏联的总统职责。可见，苏联这个庞大帝国，其带来十年之久阵痛的解体，并非肇始于别洛韦日协定，而是在改革过程中失效的苏联宪法，无法阻止苏联帝国加速崩溃的历史性结果。

然而，当苏联解体真正到来的时候，独联体国家虽未发生骚乱，但如此结果还是震惊了世界。冷战时期声名显赫的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声称，“美国总统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皆属能够赋予公共利益以

^① См. Коммерсант, 26 Авг. 1991.

实质性内容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存在，在政治上将发达社会与不发达社会区分开来。它同样能区分道德社会和非道德社会。制度化程度低下的政府不仅仅是个弱的政府，而且还是一个坏政府。政府的职能就是统治。一个缺乏权威的弱政府是不能履行其职能的，同时它还是一个不道德政府”^①。15年后，纽约州立大学洛克菲勒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霍夫曼（Erik P. Hoffmann），和弗吉尼亚州防卫分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莱尔德（Robbin F. Laird），主编了曾轰动一时的《现代苏联政治》，其中斯坦福大学和哈佛研究所资深教授罗文（Henry Rowen）之文《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经济的简要概括》这样引述美国对苏联的看法：1982年，美国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W. Proxmire）阅读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报告时得出三个关键性结论，“1）苏联经济增长逐渐放缓，但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仍将继续增长；2）经济成果并不令人满意，经济效益欠佳，但这并非意味着苏联经济失去了活力；3）苏联经济发展的成果与计划之间存在着差距，但从长远看，苏联经济未必会崩溃”^②。所以，1991年末苏联崩溃，原苏联民众如晴天霹雳，国际社会也深感震惊，——格罗斯曼（G. Grossman）的《1991年中期的苏联经济概述》、劳尔（G. Raul）主编的《苏联和东欧转变的困境》等都未看出苏联解体。而如此坚固有效率的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之后几年间就解体，本质原因自然还是在苏联体制本身：苏俄选择了斯大林工业化模式，舍弃了布哈林关于通过市场关系在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展开现代化建设的方案，确定以政治手段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这种发展模式与现代化自身的诸多本质性要求日趋背离，苏联解体是这种发展模式的自然后果。所以，叶利钦决然不让俄共执政，是唯恐俄联邦重蹈覆辙；普京—梅德韦杰夫虽然正面肯定苏联，但在相当程度上实施基层民主，推行市场经济，在欧洲框架内定位俄联邦等，以免未来俄国仍会付出苏联那样的代价。

帝国体制维持了苏联表面上的强大，实际上国家“强大”以牺牲国民日常生活、民众的主体性诉求为代价，以至于造成帝国越庞大，其体制与国民之间的冲突越甚，也就越没有能力适应社会的自然变革。我们知道，苏联八五时期（1966-1971）的经济发展很顺利，得益于1960年代改革：1965年10月4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完善规划和加强对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规定，可以扩大企业权利，增加扩大再生产和奖励员工的资金，劳动报酬取决于个人和企业绩效，肯定利润在激励员工方面的作用（当然，当时能源价格上升，也是苏联经济好转的重要原因）。但最后的两个五年计划全部破产，则因为国际能源价格暴跌，苏联又要力不从心地维持庞大的

①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26页。

② Henry Rowe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Briefing on the Soviet Economy, Erik P. Hoffmann and Robbin F. Laird (ed.), *The Soviet polity in the modern era*.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84, p.417.

军费开支，以支撑苏联的帝国身份。此情正如 1985 年 9 月至 1990 年 12 月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Николай Рыжков）之作《大国的悲剧》所说：依赖石油天然气能源出口的经济结构，已使苏联经济发展和国际市场紧密相关，而 1980 年代国际市场上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一路下降，苏联应改变出口结构，但苏联制造业技术水平低，包括最发达的冶金、石油开采、化工等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也缺乏竞争力，产品只能在经互会成员国中流通，从而使苏联整个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以至于从 1982 年开始，苏联居民的实际收入已停止增长——统计显示增长率为零。

而且，帝国治理下的农业情况未必就比工业好：废除农奴制以后，1870-1913 年俄国工业经济曾有相当的发展，但却以牺牲农村、剥夺农民为代价，如原本是保护农民的村社，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转化为征税机构，即农民要交重税方可离开村社，所得资金用于铁路和其他工业建设；入城的农民工，各方面保障都欠缺。这种以牺牲农民、农业、农村为代价的工业化模式导致政治风险，如城镇居民食品供应紧张，成为十月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在停止新经济政策后，居然实行类似帝俄时代村社的集体农庄制度，把农村经济发展政治化，使苏联时代农业问题不仅没有根本性好转，反而日益恶化，造成 1950 年代以来需要通过垦荒来解决粮食问题。1960 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改革也惠及了农业，但变化有限，结果导致原是世界上最大粮食出口国的俄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须花费大量外汇从美国、加拿大和中国购买粮食。对此，戈尔巴乔夫尝试适度的市场经济改革，以图扭转这种急剧恶化的状况。这便是盖达尔《帝国的消亡》所说的，“政府愿意朝着经济活动自由化方向迈进，以自己的方式重复中国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所历经的道路，其中第一个迹象便是 1986 年 11 月 19 日通过的《关于个体劳动活动》的法律。1987 年 5 月 1 日生效的关于个体农场经营活动合法化的决定也朝着同一方向前进。在这方面，中国经验的影响同样显而易见。这些决定对经济进程并未产生显著的作用。它表明生活在市场经济之外已三代的苏联人，与市场经济仅有一代之隔的中国人，是不同的。中国在 1979 年便已出现了最初的征兆：政府决心哪怕以有限的方式许可农民独立经营活动，这些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但在苏联，任何类似的事情都不曾发生。”^①

令人深思的是，经济改革原本是要减弱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干预作用，但有限的经济改革却迅速伤及苏联体制，苏联当局在改革受阻后反过来重新依赖帝国体制，进一步牺牲国民。1990 年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结盟，就扩大加盟共和国权力和解决经济危机达成协议，但不是扩大财政预算、提振市场经济，而是缩减预算、减少投资，500 天计划规定 1990 年第四季度缩减基本建设投资 20%、军费开支 50-70%、

① [俄]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国的教训》，第 203 页。感谢本书提供了诸多文献。

削减预算中非保护性项目 10-15%等。实施这样的计划的结果，自然是引发更大的经济危机。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全苏其他各大城市，甚至小城镇的各色人物，包括市领导、市民，纷纷写信向苏共中央告急，已买不到食品和其他日常必需的消费品了。若是相反，启动市场经济，可能可以使日趋恶化的经济状况得以改观，避免并发的社会动荡。但经济部副部长呈送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的报告《关于稳定苏联经济的整套可行计划措施的材料及 1991 年经济发展预测》（1991 年 6 月 20 日）仍主张，削减预算开支、冻结各部门工资。对此，苏联安全部门领导巴卡京（Вадим Бакагин）向苏联出版部长涅纳舍夫（Михаил Ненашев）说，“若对 1990 年春天主导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评价，除了怯懦，我再也找不到别的字眼。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雷日科夫，都害怕转向市场经济，之所以害怕是由于无知，不明白这是无可避免之事，而拖延、原地踏步则更危险，因为他们只是在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恶化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的矛盾”^①。可见，工业和农业的现实问题导致国民经济走投无路，与其说是苏联末期领导人的因素所致，毋宁说是“国家中心”的帝国体制所造成的。

实际上，苏联用帝国方式治理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格局中，不单是经济结构僵化，而且社会构成脆弱。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启了帝国瓦解的潮流，俄罗斯帝国却在这种洪流中生存下来，并急剧地扩大成苏维埃帝国。这种意外，与 1905 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有关：维特（Сергей Витте）任财政大臣和总理时进行招商引资的资本主义工业改革（1892-1903），没能使俄国在 1905 年日俄战争中获胜；于是，斯托雷平（Пётр Столыпин）在任内务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时，更强力推行资本主义农业和政治改革（1907-1911），提升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水平。但这些也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提供了基础：斯托雷平是激进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分子，以国家行政命令方式推动工业化，伤及大量的蓝领阶级，对少数族裔伤害更大，如解散了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文化团体、粗暴对待芬兰人，这些行为引发了下层民众与当局之间关系的紧张。对于这种帝国治理和工业化带来的族裔矛盾，当时引起俄国社会各阶层广泛关注，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巧妙地把族裔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列宁《关于民族政策问题》认为，即使按当时政府人口统计，俄罗斯族裔才占全俄 43%，“连小俄罗斯人即乌克兰人，也被斯托雷平亲口说成是‘异族人’。这就是说，‘异族人’在俄国占人口总数的 57%”，几乎占全俄人口 3/5，实际上也许超过 3/5；稍后，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却认为，“大俄罗斯觉悟的无产阶级爱自己的语言和祖国，我们正竭尽全力地把祖国的劳动群众（9/10 的居民）的觉悟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高度”，接着列举拉吉舍夫等大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革命家，在

^① Михаил Ненашев. Последне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ССР (личност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диалоги). М.: АО «Кром», 1993. С.73

此基础上又说，“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造就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提供为自由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①。这种论述，顺应当时改革所引发的民族冲突，因而得到了非俄罗斯居民以及俄罗斯下层居民的支持。但是，苏维埃政权延续了习以为常的帝国意识，根本没有兑现解放非俄罗斯族裔的宣言，从而使苏联诞生之际就充满着族裔诉求矛盾。此后，随着苏联的扩大，族裔之间冲突的冲突不断累积，苏共把用“阶级斗争”和“国际共运”之类修辞巧妙地掩盖这些民族矛盾，并通过各部委垂直管理的方式践行所谓区域自治制度，使苏联人无法正视族裔诉求和冲突的严重性，更不能坦然面对苏联是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联盟，甚至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之于我国和全世界》还信誓旦旦地说：“若我国民族问题没得到基本解决，就不会有今天苏联在社会、文化、国防等方面呈现出的新面貌。若没有各共和国获得事实上的平等，若没有在兄弟般团结合作、互敬互助基础上形成的大家庭，我国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②。实际上，赫鲁晓夫改革之初（1956年3月4-9日），格鲁吉亚就发生了有3万人参与的群众性族裔冲突和政治抗议事件，苏联当局动用军队才平息了事件。族裔矛盾发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更加恶化，如1986年12月，阿拉木图上万名大学生抗议任命时任乌拉尔州委书记俄罗斯人科尔宾（Генадий Колбин）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当局动用军队镇压，数千人被捕，两年多后还是撤销该任命，重新任命时任该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的哈萨克人纳扎尔巴耶夫（Н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为该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尤其是，1990年2月，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各自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结果是90%的立陶宛人和爱沙尼亚人、77%的拉脱维亚人，分别赞成自己的共和国独立。全民公决影响了这三个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的结果——主张国家独立的代表大获全胜。此举又刺激了摩尔达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共和国的独立要求，甚至俄罗斯也加入其中。而且，正因为俄罗斯加入独立于苏联的运动，更促使苏联族裔冲突面进一步扩大、程度更加加深，加剧了苏联解体的趋势。

如此矛盾，根源于苏联的帝国体制所建立的庞大官僚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成长起来的苏联高级干部，一直陶醉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迷信苏联帝国。在盖达尔《帝国的消亡》看来，“共产主义的效力到此时已荡然无存。国家领导人采取惯用的意识形态公式和口号作为世代相传、必须遵守的宗教仪式。社会则对这一套要么不予理

① 《列宁全集》新版第25卷第69页、第26卷第109页。但《关于民族政策问题》同时赞赏，“挪威和瑞典能民主地运用民族政治自觉原则。断绝强制性联系也就是加强自愿的经济联系，加强文化联系，加强这两个在语言和其他方面很接近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瑞典民族和挪威民族的共同性和亲密关系，实际上由于分离而增进了，因为分离也就是断绝强制的联系”（第25卷第71页）。
② М.Горбачев.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 С.118.

睬，要么将其当做日常生活笑话的素材。数十年中奉行的不以智力水平挑选共产党领导人的路线，至 1970 年代末形成的一个由老年人执掌的、没有能力做出任何明智决定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不过当一切都是处于惯性的作用、遵循着已经定型的规则而运动的时候，那些领导国家的人也无须乎具备高智力水平。”^①还有更为严重的情况：曾任苏联卫生部第四局局长的科学院院士恰佐夫（Евгений Чазов），1960-1970 年代负责苏联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其《健康与权力：一位克里姆林宫医生的回忆》从医学角度披露了自己所接触到的苏共高层：“既然连基里连科（А. Н. Кириленко）都被选定为党内第三号人物，那么还需要深入探究党和国家危机的原因吗？他与人交往时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可爱之人，但我们向中央领导提交材料证明，他大脑皮层已发生病变”，“从 25 大以来，对作为国家领导人和政治领袖的勃列日涅夫失去活动能力，我进行了记录……今天很难记清楚，我们究竟在勃列日涅夫最后 6、7 年中向政治局报告了多少次有关他健康状况的正式信息。或许这些信件还存在某处档案里。不过，安德罗波夫的不动声色有充分的理由，任何一封信都没有得到回应，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对此表现出哪怕最低的兴趣。”更有甚者，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份记录《关于扎夏德科同志》显示，“关于扎夏德科（Александр Засядко）：据说，已不再酗酒。那就派他去乌克兰任部长吧。”可见，苏联后期干部所受教育较之此前要好，但帝国体制难以培育懂国际市场规律、用市场经济手段实现外贸平衡、平衡国家干预和经济规律等问题的人才，新时代管理者仍如以前干部那样肤浅地看到苏联经济问题是经济增速缓慢；进而，出现上述惊心动魄的人和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样一来，政治化了的经济问题或社会危机一旦遇到挑战苏联帝国的民族主义经济活动，自然也就难以招架。1991 年 4 月 4 日，苏联国家银行行长格拉先科（Виктор Геращенко）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Анатолий Лукьянов）报告《关于银行体制的一些问题》说，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等加盟共和国，分别立法赋予各自共和国央行独立发行货币的权力。四天后，他又向戈尔巴乔夫报告《关于货币信贷制度》：“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试图发行‘自己的’货币……许多共和国的法令、实际举措，都在阻止上缴全苏预算收入。苏联财政部只得使用很有限的进款和苏联国家银行的有限借款。这将导致国家没钱支付军人津贴和供给全苏管理机构经费的状况发生。退休金发放也受到威胁，因苏联退休基金的来源同样受阻。这种状况必将导致信贷发放以及随后的银行货币发行极度失控，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螺旋，从而对全苏的国民经济，甚至对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① [俄]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第 108 页。本页下述材料出自该书 117、144、172 页。

苏联国家银行试图协调与各共和国央行在执行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方面的关系，但未得到积极的回应”。又三天后（11日），他再次向戈尔巴乔夫报告《关于贯彻统一的信贷货币政策》说，各加盟共和国加速违反《关于苏联国家银行》等苏联法律，“如果这一进程得不到遏止，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地方货币流通、全苏市场经济关系破坏，最终则导致事实上的经济崩溃。”^①实际上，在苏联经济危机难以克服的情形下，试图经济自主，是每个加盟共和国的本能，而获得经济自主的加盟共和国距离其成为主权国家也就为期不远了，此情正如安德森（Beni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所说，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普遍信仰就会衰落，“每一个民族都梦想着自由，若有上帝管辖，便可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自由，否则，对这种自由的担保（gage）和象征（blem）就只能是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②。

可见，帝国治理下的苏联，实际上遭遇了各方面的危机，但对帝国制度的依赖使之难以靠自身克服危机，这也就使得苏联无法适时放弃计划经济和苏式社会主义，并且使苏联的继承者俄联邦，为后来既要稳定货币金融又要进行大幅度经济改革，而付出了不必要的沉重代价。同时，苏联帝国赖以存在的俄罗斯—斯拉夫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危机，如军官和精英部队的主体虽仍出自斯拉夫族裔，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族裔官兵比例较之于俄罗斯有大幅上升，尤其是陆军不得不招募越来越多的非斯拉夫族裔，由这些人去各加盟共和国平息民族主义运动，显然是难以完成使命的。

二

实际上，苏联解体不仅是俄国史的又一次转折，更是殖民帝国历史在20世纪真正终结的世界性事件，哪怕苏联不曾宣布自己是帝国，还把“帝国（империя）”变成了贬义词，也没有派遣代表定期管理附属国，但苏联本质上是俄罗斯帝国的延续。

我们知道，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建立沙皇俄国到1917年，在370年历史中，先后征服了外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区，把那里许许多多原本按其文化传统在自己土地上独立生活、并讲着自己语言的120多个民族，强行纳入帝国疆域，使俄国版图扩张了8倍。历史进程显示，帝国统治曾是俄国调节社会矛盾和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但最终无法解决不同族裔的诉求问题，以至于1917-1921年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实际上得到了不同族裔下层民众的支持。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族裔许多人以为，推翻了俄罗斯帝国，就可以挣脱俄罗斯帝国的控制，

① [俄]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第258页。

② Beni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3, p.7.

获得自由和独立，于是积极支持布尔什维克政权。然而，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向世界所作的放弃沙俄帝国遗产的宣布，仅仅只是几次“宣言”而已（包括之于中国的《加拉罕宣言》）。相反，苏俄版图进一步扩大，周边若干主权国家也消融于苏俄帝国的壮大过程之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1922年底成立，当时仅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4个加盟共和国。1924年10月乌兹别克和土库曼以加盟共和国身份加入。1929年12月，塔吉克成为苏联第七个加盟共和国；1936年12月，外高加索联邦分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3个加盟共和国，同时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分别加盟共和国身份加入苏联。1940年3月，卡累利阿—芬兰成为苏联又一个加盟共和国。这年8月，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摩尔达维亚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各自以加盟共和国的身份被并入苏联。至此，苏联共拥有16个加盟共和国（不过，1956年7月，卡累利阿—芬兰并入俄罗斯联邦，成为一个自治共和国）。也就是说，苏联许多加盟共和国原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即成为其成员国（它们同时又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联名义上实行区域自治制度，以保持各加盟共和国在国家的主体地位和独特身份，但为了确保国家的统一，建立了苏共垂直领导的体系、全苏统一的计划经济体系和共同的意识形态等。可见，终结了俄罗斯帝国、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苏联，并未去帝国化，而是继续帝国式的内政外交，这也就是苏联无论怎样改革，总是在苏共垄断国家权力、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框架内进行的根本原因。

然而，终结帝国化过程、瓦解殖民体系，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曾几何时，英国人是那样为自己的殖民体系而自豪，就像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煤炭问题：论国家进步和我们煤矿可能消耗殆尽》第15章《贸易主体问题》所描述的：“哪怕英格兰是一块无法开垦种植庄稼的大岩石，北美和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和西亚是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及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就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①二战结束之际，英国仍有军队450万人，统治着“日不落”的世界帝国。但战后去殖民化浪潮，不断瓦解着殖民体系。1958-1968年英国经历着最痛苦的“非殖民化”过程，无可奈何地撤回欧洲。到1960年代末，其海外“领土”所剩无几。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更使英国殖民体系几近崩溃。哪怕英国不愿意面对世界非帝国化进程，继续利用国民的帝国情怀和殖民体系的遗产作为政治运作的资源，如21世纪还努力维系英联邦，但

^① W. Stanley Jevons, *The coal question: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 pp.305-306.

英国必须适应世界非殖民化的历史进程，回归正常国家。

维持帝国，尤其是殖民帝国，宗主国需要拥有庞大的国力和对殖民地区的各种投入。1603年有一位比利时（当时称为佛莱芒）学者致信其西班牙朋友说，“你们所征服的新世界征服了你们，削弱并耗尽了你们昔日的勇气”^①。这种判断，即使今天看来也仍有不可思议的深刻，如戴维斯（R.Davies）《西班牙的黄金时期（1501-1621）》看来，临近17世纪，西班牙在美洲和其他殖民地所发掘的银矿大多枯竭，而西班牙为了管理庞大的殖民地帝国，把半数以上的预算都用于军事开支，这就导致政府借贷攀升、物价上涨，财政危机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结果导致帝国政府加速破产^②；艾略特（J.H.Eliot）《西班牙帝国：1468-1716》列举了具体情形：1557-1653年间，西班牙政府先后七次宣布国家丧失支付能力^③。由此，试图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首相奥利瓦雷斯（Olivares），面对财政危机不断、又必须承担所谓帝国使命的困境，在1631年道出如此沉重之语：“既然这个王国的巨大成就使之陷入如此悲惨境地，那么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发现和占领新大陆，王国可能更为强大”^④；危机又延续了十余年后，这个几乎没有在战场上失败的帝国，却因依赖殖民地的黄金白银，随着新殖民帝国兴起、国际市场结构和金融体系的变化，自然地瓦解了。类似的例子还有：葡萄牙为了维持海外殖民地，1971年国防开支已经占到整个预算的43%，国家不堪重负，不得不先后放弃“海外领土”，包括1999年底同意澳门回归中国。更惨痛的例子是二战后的法国：1940-50年代，法国为了保住殖民地，试图继续控制印度支那，耗费了惊人的金钱和牺牲了数以万计官兵的生命，仅1945-1954年就有9.2万名远征军丧命、14万人受伤、3万人被俘。这种遭遇惨败的结局，使得法国当局不能再派遣一兵一卒到这一地区。然而，帝国意识在法兰西政府中却根深蒂固。宣布法国结束越南战争的总理和外长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France），1954年在国会辩论中称：“任何人都不要期望我们会做出任何妥协，当问题关乎保卫国内和平与共和国完整时，我们绝不会动摇。阿尔及利亚各省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它们也就是法兰西。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之间不可能有分界线。任何时候的法国及其国会、政府都不会放弃这一原则”^⑤。由此，1950年代初仍视阿尔及利亚为法国的一个省，并拒绝承认此地非裔和欧洲裔居民拥有平等的选举权，欧洲裔居民1票等于穆斯林居民8票。以殖民方式建构的法兰西帝国，在18-19世纪不给土著民选举权是“理所应当”的，但在战后民族独立和民主平等的浪潮中，沿袭惯

① J.H. Eliot, *Spain and its World, 1500-1700*,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5.

② R. Davies, *The Golden Century of Spain, 1501-1621*, London: Macmillan & Co., 1937.

③ J.H. Eliot, *Imperial Spain, 1468-1971*, New York: Mentor, 1966, pp.180-190.

④ J.H. Eliot, *Spain and its World, 1500-1700*, p.26.

⑤ John Talbott, *The War Without a Name: France in Algeria, 1954-1962*, New York: Alfred, 1980, p.39.

例却必然使局势恶化，因为国家认同观念的出现，已使帝国对附属地的管理变得困难。当法国当局意识到问题严重性，试图实施普选权时，情势已经发展到阿尔及利亚确定无疑地要求独立了。于是，1955年法国高调征召预备役官兵，延长官兵服役时间，使得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军人数，一年内从7.5万增至18万，到1956年秋1/3法军集中在北非一集结达40万人之巨。这场法国人开始认为只是“内部事务”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无视国际社会抗议的殖民战争，虽然得到了仍残留着帝国意识并留恋帝国辉煌的国民的支持，但作为民主国家，法兰西居民有权公开抗议政府为了维持帝国荣耀而采取的成本如此之高的军事行动。不错，法国人能够按帝国的概念理解当局的海外军事行动，以及在财力上支持海外领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包括建设属地的基础设施项目），但作为纳税人则怀疑为属地加大投入的决策，并且不满意本土诸多民生和民主问题久而未决，尤其不能容忍让法兰西子弟为此付出无谓的牺牲。1960-1961年舆论显示，2/3法国人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由此可见，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瓦解，与法国民主制度的发展相关联，为使国家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承认殖民帝国瓦解势在必行。这种结果，与当时观察家的预期——即帝国瓦解会使法兰西长期动荡——正好相反。正因法国放弃了殖民包袱并参与到欧洲一体化进程之中，使后帝国危机得以化解。

苏联的情形和法兰西帝国有某些类似。19世纪末以来，在基督教会日趋衰落的情形下，兴起了被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族独立斗争浪潮，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反对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富分化、阶级冲突的趋势。对此，苏俄机智地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替代基督教救赎方式，去解决俄国和人类的现实问题。作为这种成功“转换”的十月革命及其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把俄罗斯根深蒂固的“莫斯科—第三罗马”概念巧妙地演绎成共产国际的战略格局，使已巨大的俄罗斯帝国的版图继续迅速扩大。接着，趁二战中一路解放东欧国家之际，构筑起庞大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并随着冷战局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包括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经互会”、“华约”等）。这种情形，同国际上殖民体系日趋瓦解的格局相背离。中国和当时的南斯拉夫冒着多种危险，并付出沉重代价，相继脱离苏联阵营。也就是说，冷战时期苏联不是通过使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自愿认同苏联，以对抗美国和西方，而是采用帝国方式使许多国家卷入冷战。

对冷战的发生和发展，苏联更多的是积极参与，而非缓和，并且在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世界进程中，合法地促使西方国家残余的殖民制度继续瓦解。与此同时，苏联作为帝国，就必须以财政、政治和军事等方式，支持反对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这正好与西方把社会主义国家视为极权制度相对应。当然，苏联帝国战略蕴含着很大的风险：1907-1913年，俄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

国（占全球粮食出口份额的 45%）；到了 1980-1990 年，苏联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比例达 16.4%）。在这近百年的变化过程中，1950 年代是转折点。当时苏联为了维持冷战，加大军工和重工业投入，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并因集体农庄体制而使危机加剧，遂使粮食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但苏联对东欧的粮食供应却得照常，尤其是遇到东欧骚乱之类的事件，更要加大经济援助规模。

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苏共二十大出台。会议期间，苏联、意大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等 5 国共产党作为战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 1938 年共产国际解散波兰共产党的材料为“捏造”，并为波共恢复了名誉（因为这个错案，当时波共领导人几乎全部被处死）。此事震惊了波兰，要求摆脱苏联控制、实现国家自主之声此起彼伏。这年 6 月，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的大批产业工人上街抗议，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劳动定额和工资制度，却引发军警镇压，死 74 人、伤逾千人。对此，苏共中央主席团在 6 月 12 日就波兰局势讨论决定：“一切商品都给，黄麻织物、毛料全都给，如果他们想要黄金——那就连金子也给”，只要“社会动乱”和“反苏行动”停止^①。这样的举措当然未能产生苏联所期待的效果。苏联末期因经济局势持续恶化，当局抓紧回收向卫星国提供的贷款，但 1989 年 3 月 23 日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调整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的刚果人民共和国除外）债务，以强化戈尔巴乔夫同志在联合国讲话中所阐述的立场的建议》却表明，这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到 1989 年初，苏联作为债权国的债务达到 610 亿多卢布，其中多数为越南、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超过 320 亿……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支付能力，苏联不得定期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但“第三世界盟友却把支付对西方的欠债置于优先地位，认为我们随时都好商量。这种情况首先是我们以往总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所致，因为我们对互惠经济合作发展的利益未进行相应的考虑”。此时，苏联经济局势已越来越紧张，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管理局局长莫斯科夫斯基（Юрий Московский）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报告《关于向苏联提供贷款情况》（1989 年 8 月 8 日）说，西方已拒绝向苏联提供新贷款，“他们认为苏联信贷风险已被认为高于正常水准”。一年后（1990 年 6 月），西方诸多大型商业银行代表在旧金山开会讨论对苏联贷款问题，最后决议，继续向苏联提供贷款只有在西方主要国家政府参与下才有可能，不是在私人银行层面上进行。而且，苏联的经济危机，真正开始了西方要求改革苏联帝国的行动：联邦德国同意向苏联贷款，已不仅仅是要求苏联同意东西德统一，其他国家的贷款更不限于解决苏联的东欧问题，而是附上了苏联当

^① 原文载《苏共中央主席团（1954-1964）》，会议记录草稿和决议，第 148 页。转引自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第 126 页；下页所引材料也出自该书。

局承诺维护人权的条款——不能为了政权而对本土和附属地人民动武。这样，苏联就不得不正面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要求恢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前的主权地位的诉求。到了1991年，经济危机演化为政治危机的情势更是火烧眉毛：1991年6月26日，就关于支付希腊公司债款的问题，苏联外经贸部长卡图舍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Катусев）致函总理帕甫洛夫（Валентин Павлов）说，去年希腊积极向苏联提供财政援助，而今年贷款给苏联以购买生活必需品和支付债款的谈判就不断拖延。1991年夏，西方七国会议在伦敦举行，戈尔巴乔夫请求参加，副总理普里马科夫（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先期抵达并公开声言，若西方不提供经济援助而使苏联崩溃，会给世界带来种种威胁。但是，与会各国并未因此就真正施以援手。

实际上，因为要维持帝国格局，引发的危机是多方面的，经济危机仅仅是其中最突出的方面而已。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教授施韦泽（Peter Schweitzer）在《胜利：里根政府加速苏联瓦解的秘密战略》看来，苏联最终解体于里根政府有意识挑起的军备竞赛，为此苏联被迫迅速扩大军事开支，承受了无法负载的负担：援助社会主义同盟国、采购武器装备和武器研发费用、生产大量的武器，如1970年代苏联制造了6万多辆坦克，超过美国及其盟友多倍^①。西方学者的意见得到了苏联档案材料的证实：苏联解体近十年日子，《军事通报》提供苏联军力数据：“1991年苏联有63900辆坦克、66900门大炮、76500辆步兵战车和装甲运输车、12200架飞机和直升机、437艘大型战舰。我们的坦克比北约多出5倍”^②。不仅如此，国立研究大学经济学教授库德罗夫（Валентин Кудров）的《苏联经济回顾：反思》还说，苏联1980年代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每年约200亿美元，其中仅向古巴就支出60-70亿美元，此说与尼·雷日科夫《大动荡十年》估计的数字相当^③。“为何必须生产这么多武器？”，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沙赫拉扎洛夫（Георгий Шахназаров）当时就疑惑道，但苏军总参谋长阿尔罗梅耶夫（Сергей Ахромеев）元帅回答说，“因为我们付出巨大牺牲的代价才建成了这些一流的工厂，制造的武器不比美国人差。你难道要下令停产去制造饭锅吗？不，这是幻想”^④。而这种庞大的国防开支，几乎伴随着整个冷战过程，并且不仅仅是为了冷战军备竞赛及维护帝国的革命输出，而是和部门利益、意识形态有关，结果自然会限制军工转民用的机制。可以说，为了确保庞大苏联帝国本土的稳固、维持苏联阵营和西方对抗的军力，苏联支付了与其国民生产总值不相匹配的国

① Peter Schweizer, *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4, pp. 260-265.

② Во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 8, 2001г.

③ Валентин Кудров. Совет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е: Опыт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я. М.: Наука, 1997; [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④ Quoted William Odom, *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05.

防和军事费用，占用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征用了大批优秀的人力资源，加上军方为了维持部门利益而有意识地推动军工企业发展和军备生产，这些都延误了民用工业的发展，牺牲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从而消解了国民对苏联体制的认同。

然而，如此庞大的军力，在国家主权意识觉醒、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情势下，却没有能力用武力保存帝国。1980-1981年波兰发生骚乱，苏联正面临阿富汗战事，只好劝说波兰领导人用自己的力量解决，否决了出兵的打算。这显示，苏联帝国开始尝试改变对附属地区的治理。然而，这种趋势却急剧恶化：1989年4月，波兰团结工会就自由选举的条件与当局举行谈判，并在后来的选举中挫败了亲苏联的政府，并控制了议会的上下两院。这时，苏联再要用武力保存其境外的“自治领地”，已不可能了。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和布什（George Bush）在马耳他会晤时承诺说，苏联武装力量不会介入东欧局势。此后不到两个月，苏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东欧附属国迅速地全部失去，用来守护东欧领地的华沙条约自动消失。

同样，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独立运动，苏联当局并非没有尝试动武，而是已经付诸了行动，却没有成功：1990年4月13日，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警告立陶宛，必须撤销有关独立的一切法律，否则予以制裁。4月18日真的进行能源封锁，西方要求立陶宛当局必须和莫斯科妥协，双方不久坐下来谈判，但最终收效甚微。第二年1月11日，苏共中央民族政策部长米哈伊洛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向中央报告立陶宛要求独立的事变，分布在维尔纽斯市的立陶宛主要党政机关已被苏联空降兵控制。但是，此时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国际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立陶宛民族救亡委员会，委员会通牒立陶宛最高苏维埃，要求苏联总统承认立陶宛独立的事实。然而，戈尔巴乔夫断然拒绝，还继续派遣苏联军队进驻事发地区。此举却引发了许多加盟共和国苏维埃代表的强烈反对，甚至不少企业罢工，声援立陶宛的独立。继而，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的呼声，遍及苏联许多地区。西方对苏联当局的高压行动表示高度关切，并以拒绝贷款相威胁。对此，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切尔尼亚耶夫（Анатолий Черняев）向西方解释说，派遣军队未经戈尔巴乔夫同意，是陆军司令瓦连尼科夫（Валентин Варенников）的擅自决定。用军队阻止立陶宛独立未果的结局，迅速演变成波罗的海国家脱离苏联、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浪潮。

更有甚者，八一九事件中，即便出动了坦克，但奉命执行任务的克格勃阿尔法部队、内务部和军方互相推诿，迟迟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虽然开火可能会暂时压制群众，使各加盟共和国屈服，但历史的幽灵让军方心有余悸：1917年2月，彼得格勒曾有军官下令向游行示威的群众开枪，结果却无法挽救俄罗斯帝国，相反，加剧了沙皇制度的终结，共和制替代了帝制，建立了临时政府。同样，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将军也曾试图发布开枪命令，以图压制得到布尔什维克支持的各种群众

性抗议活动，结果也未能挽救临时政府。历史又向前走了 74 年，军人职责与国家认同之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八一九事件也只持续三天就草草落幕了。

诸多事实意味着，并非苏共不想动武，而是变化了的时代使其已经没有能力动武：若用武力保全苏联，那就意味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虚假的，结果照旧是重复历史教训，还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于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流产，已经意味着苏联局势将不可逆转地朝着非苏联化的恶化方向发展，但苏联当局也只得转而谴责暴力、解散苏共而非趁机改组苏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18 世纪以来开启的自上而下的俄国现代化历程，强盛了俄罗斯帝国，也培育了俄国民众的民主意识。解冻思潮及其后的社会变革，更促进了苏联人的民主诉求，因而当局对疆域内的民众使用武力比较谨慎（对俄联邦时代的车臣战争一直有强烈的反对声音，若不是车臣人在莫斯科、别斯兰制造的恐怖主义事件，战争是很难持续的）。由此，巴黎人口统计研究所历史学和人类学教授托德（Emmanuel Todd）的《帝国之后：美国秩序的崩溃》认为，苏联帝国的解体没有诉诸武力，而是相反，甚至消除了本国的集权主义制度，同意东欧独立，答应各加盟共和国成为主权国家，少数族裔权利得到保障，这种情形可能和民主制度的实行有关^①。这就造成了世界上最大帝国解体的独特性：作为一个领土毗连的庞大帝国，苏联的解体不像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那样充满着血腥，甚至与同一时期南斯拉夫解体后内战不断的情形也相去甚远。

如此看来，苏联帝国的发展和解体，就远不只是国际共运的话题，而是世界帝国历史变迁的一个部分。是以武力相威胁、以意识形态为掩饰、以经济支援换取政治同盟等手段建构帝国，并以帝国方式治理所辖区域的历史进程之终结。这也正是盖达尔《帝国的消亡》所说的，苏联看似牢固却没有弹性的经济政治结构，没有应变的能力，不能适应世界挑战，很难预测情况的发生，如财政危机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导致生产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带来政治不稳定，使苏维埃帝国解体成为理所当然。有鉴于此，俄联邦 20 年来吸取苏联教训，不再图谋恢复苏联，而是建立包括私有制、政党政治、可自由兑换货币、现代信贷银行货币体系、适应市场经济的精英队伍等制度，不以恢复苏联的方式去谋求国家的复兴。

戈尔巴乔夫对积苏联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进行改革，一开始过高估计了国民对苏联制度的认同度，一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被迫脱离苏联政体进行维护苏联的改革。这自然就动摇了苏联的根基，使原本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的苏联帝国，提前在殖民帝国瓦解的历史进程中画上了句号。这种结果显然不是某个人所能为的，其意义也不是当时就充分显现的，而是一个历史化过程的产物。具体说来包括：

^① Emmanuel Todd, *After the empire: the breakdown of the American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第一，苏联帝国解体，吻合一战以来就开始的去殖民化和去帝国化的世界历史潮流，而且苏联分解过程没有过去帝国瓦解那样充满着旷日持久的血腥和暴力。

第二，苏联解体让处于紧张状态中的世界得以放松下来，东欧国家也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虽然后冷战时代北约先后实施了对南斯拉夫肢解、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促进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对中国和俄国的发展不断牵制堵截等，但整体上是局部地区的实际利益之争，而非意识形态争斗。

第三，对原苏联国家尤其是俄罗斯也未必不是解放。戈氏作为苏共领袖时多次声明，苏联国防消耗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 20%-40%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军工支出和军备竞赛的确让苏联人付出了巨大代价。作为苏联最重要主体的俄罗斯，深感要维持苏联帝国的代价过于庞大，希望独立发展，并让各加盟共和国也能各自行走。

第四，得益于苏联解体，俄联邦可以公开地把自己定位于一个欧洲国家，把俄罗斯传统文化转化为重建俄国的合法资源，尝试建立政党政治、用法律框架内的议会辩论替代政治斗争，用较为宽松的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俄联邦是欧盟所承认的市场经济国家），宗教信仰可以自由化、合法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解决族裔冲突问题上阻止了俄联邦的苏联化（车臣事件没有波及更多的族裔），也停止了苏联式的以意识形态主导的学术研究制度、范式和方法，同时也终结了西方的苏联学，使西方关于俄罗斯问题研究回归到斯拉夫学科。

当然，领土毗连在一起的苏联帝国之解体，不同于跨海的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和葡萄牙帝国等的解体。它们的海外侨民可以在帝国解体后正常回到母国，所产生的任何政治问题可以通过文明途径获得正常的解决。但是，随着苏联帝国延伸，曾自由或被迫迁徙到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苏联解体后成为这些独立国家的少数族裔和侨民，难以回到祖国。另外，俄国对后冷战以来国际人文学界盛行的对后殖民主义的批评，少有感觉，很少有人把苏联视为帝国，而把苏联解体看做是帝国解构历史的则更少。在这个意义上，盖达尔的《帝国的消亡》则显示了俄国人对苏联解体和苏联历史之认知的进步。

【Abstract】 Over tim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has become history. In this regard, Russians are gradually able to take this event and its consequences calmly and reasonably by getting rid of their emotions involved. Among them, Yegor Gaidar, the former acting Prime Minister who witnessed the signing of Belovezhskaia-Pushcha Agreement and also experienced numerous political events during early Russian federation, published his masterpiece “Death of the Empire: Lessons for Modern Russia” concentrating on history and practical issues of Russia after his bowing out from politics.

This book shows Russians' progress in viewing USSR disintegration: the Soviet Union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Russian empire and had expanded its empire to the extreme; accordingl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its imperial governance, managing the Union and its republics at high costs and paying a high price in maintaining the empire's interests in all corners of the whole world. This means in imperial governance ultimately led the Soviet empire unsustainable in itself. Even if it's unconstitutional that those like Yeltsin who forced termin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still there was not enough resistance to maintain presence of the union.

【Key Words】 Disintegration of the USSR, Imperial Governance, Domestic Costs, Diplomatic Prices

【Аннотация】 Развал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уже стал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фактом. Это даёт русским всё больше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избавиться от тогдашних настроений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х участников и спокойно, уравновешенно взглянуть на это событие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Например, можно отметить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Гибель империи: Уроки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автором которого является свидетель подписания Беловежско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а также свидетель мног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обытий в России, вышедший из политики с целью изучени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вопросов и.о.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 Егор Гайдар, данная работа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а прогресс понятия россиянами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был основан и развивался на осно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расширение империи было в нём доведено до крайности; это требовало укрепления формы имперск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платы высокой цены за управление всем союз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союзными республиками по отдельности, несения высоких затрат по поддержанию интересов совет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о всех уголках мира. Такая форма имперск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привела к трудностям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амой империи, и даже если бы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е прекращ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Ельциным и другими было не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м, не было сформировано достаточных сил дл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прочности союза 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этим процесса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азвал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мперский контроль, внутренние затраты,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цена

(责任编辑 封帅)

转型的迷茫与困惑

于滨*

【内容提要】对于1990年前后苏联的激进“转型”，美方的对策可以归纳为老布什政府的“三部曲”：苏解体前消极观望、以不变应万变；解体后的短暂震撼与迷茫；以及随后的惊喜和庆贺。然而自诩为“赢得冷战”的布什，由于美国经济不振，民心浮动，在苏联解体后不久也输掉了大选。至此，尽管布、戈二人在外交方面的业绩可圈可点（戈1990年还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都被各自的人民所抛弃。其实冷战的结局远非输赢可以定论。冷战是延续数百年的“西方内战”、即西方强权和主要意识形态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巅峰和最后阶段；各方均付出沉重代价。此后20年间，美国为追求绝对安全和绝对行动自由，耗损了大量软硬实力。冷战结束的真正意义在于，西方在整合内部以后，得以转向针对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冲突”。在学界，苏联解体使西方“苏联学”顿失目标和动力，西方国际关系学主流也集体失语，面临着非主流和新生派的强力挑战。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死而复生，成为美国的“苏联研究”转向“俄罗斯学”的缩影；西方的俄罗斯研究既面临转型的挑战和契机，也不乏巨大的想象和操作空间。

【关键词】苏联学 转型 俄罗斯学 后共产主义研究 西方主义 西方内战 文明冲突

【中图分类号】K512.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6-0118-(19)

1991年底苏联的突然解体，对国际体制、地缘政治、以及美俄关系，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在对待俄罗斯社会激进“转型”的问题上，美国有若干并行、相互关联、但又十分不同的趋向。在政治层面，苏联的突然解体所带来的震撼和迷茫，

* 于滨，美国文博大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兼东亚项目主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太平洋论坛俄中关系特聘研究员。

迅速转变为惊喜和庆贺，并在美国 1992 年的总统大选中迅速发酵，衍生成为一场“到底谁赢得了冷战”这种极为政治化的党派辩论。

然而冷战的结局远非输赢可以简单定论的。在历史的坐标上，冷战其实是西方主要意识形态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巅峰和最后阶段。此后，意识形态的前苏联以硬着陆的方式转变为文化的俄罗斯，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而美国为了追求绝对的安全和绝对的行动自由，也耗损了大量软硬实力。冷战结束的真正意义在于，西方在整合内部以后，得以转向针对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冲突”。

在政策层面，美国的两任政府（老布什和克林顿）对苏/俄剧变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即布什的消极观望、以不变应万变，以及克林顿的以美国价值观（自由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为目标和动力的进取态势。不管布什如何强调“美国赢得了冷战”，其对苏政策其实对苏联政局走向的影响相当有限。而克林顿主义所主导的人道主义干涉和北约东扩又使美俄关系迅速进入“冷和平”。

在学界，苏联的突然解体使美国的“苏联学”一夜之间失去了目标和动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也集体失语，面临着非主流派和新生派的强力挑战。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Problems of Communism*）的死而复生，成为美国的“苏联研究”向“俄罗斯学”转变的一个缩影；与俄罗斯本身的转型一样，美国和西方的俄罗斯研究（或欧亚研究）也面临转型的挑战和契机，以及巨大的想象和操作空间。

一、“谁赢得了冷战”？—— 布什 vs 凯南

“谁赢得了冷战”？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美苏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苏联的垮台而结束。为何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再起纷争？原因在于美国内部。一般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总是赢得战争而失去和平”。然而这并非事实。美国不仅几乎输掉了 1812-1815 年的对英战争，连白宫也被英军付之一炬；而且在朝鲜和越南战争中，要么平手，要么战败。^①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二十世纪美国参加的每

^①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p. ix.

次战争以后，美国和世界都经历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①1991年冷战结束，美国经济依然未能摆脱衰退的命运。执政的共和党虽有外交“业绩”，但美国经济表现不佳，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在苏联突然解体后引发了如何评价冷战的争论。

1992年1月27日，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1991年12月25日）一个月以后，美国总统布什在年度国情咨文中称：“承蒙上帝的恩惠，美国赢得了冷战。”^②平心而论，老布什任职四年，在外交方面的业绩可圈可点，美国不仅摆脱了历时44年的冷战，而且赢得了1990-91年的海湾战争，一举走出了越战阴影。按老布什的话说，美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无可争议的领袖”（undisputed leader of the age）。在如火如荼的1992年总统大选中打外交牌、以冷战胜利者自居，争取连选连任，应该是万无一失。

然而美国经济不振，民心浮动，本来就对国际事务缺乏兴趣的普通美国人，对刚刚“赢得”冷战的老布什政府的外交业绩并不热心。美国政治文化中瞻前而不顾后、急于求成的特点，也使选民们更关心与自身经济利益有直接关系的眼前国计民生问题；在民主党煽动下，很多美国人把怨气统统转化为对执政的共和党的不满。1992年夏季，美国经济持续恶化，一些民主党支持者嘲笑老布什说：“萨达姆还有工作，你（老布什）还会有事做吗？”^③为了扭转选战的颓势，共和党和老布什的“美国赢得了冷战”的竞选口号，也逐步为“共和党赢得了冷战”所取代。

共和党“贪天功为己有”的做法，激起了早已远离政坛的乔治·凯南的强烈不满。他在1992年10月28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共和党赢得了冷战？无稽之谈》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任何国家、党派或个人赢得了冷战。这是一场旷日持久、耗费巨大的政治博弈。双方都肆意夸大对手的意图和实力。冷战极大地耗费了双方的经济资源，到八十年代末，双方都面临巨大的经济、社会以致政

① 这包括二战结束前美国经济于1945年2月起开始放慢，而1947年美国实行的马歇尔计划，即对欧洲的1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按2006年美元比价为1300亿美元），则要求欧洲受援国必须购买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参见R. Dennett, ed.,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III*, Princeton, 1951, pp. 607-608.）可以说，马歇尔计划不仅挽救了欧洲，也拯救了已经进入衰退的美国经济。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同月，美国经济即进入萧条直至1954年5月。越战期间，美国两次经历了罕见的“战时”经济衰退（1969-1970，1973-1975），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赖以复苏的军工产品的订单大都放到了美国在远东的盟国（日本、韩国等）。（参见Christina D. Romer, “Business Cycles”, in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http://www.econlib.org/library/Enc/Business Cycles.html](http://www.econlib.org/library/Enc/Business%20Cycles.html), 2011年2月17日引用。）

② 原文见美国《纽约时报》1992年1月27日，<http://www.nytimes.com/1992/01/29/us/state-union-transcript-president-bush-s-address-state-union.html>

③ Thomas Omestad, “Why Bush Lost”, *Foreign Policy*, no. 89, Winter 1992-93, pp. 70-81.

治问题（俄国方面），而双方对此均未有预料，有所准备。”

凯南不仅驳斥“冷战胜利”说，而且认为恰恰是由于美国方面的尚武行为，使冷战持续多年而不得其终。本来 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党内就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暴政开始反思。赫鲁晓夫是思想开放的领导人，他接手苏共后，对内放宽政治，对外缓和关系。然而 1960 年美国 U-2 侦察机入侵苏联领空被击落，迫使赫鲁晓夫对美采取更为强硬的言辞和政策。凯南认为，U-2 事件清楚地表明，美国冷战期间的对苏政策是军事优先于外交。此后的 25 年里，美国的极端保守派主导了美国的对苏政策并使之日益军事化，这反过来也强烈刺激了苏方的强硬派。双方强硬派的合力，大大延缓了苏联内部自由化的步伐。凯南并不反对美国在军事上有必要的准备，然而美方一些好战和威胁性的言辞则完全没有必要。而在这方面，民主共和两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凯南据此认为，美国此时此刻应深刻反思美方的哪些政策促成了冷战的形成并使之旷日持久，而不是自欺欺人地为所谓赢得了冷战而弹冠相庆，更不必拿冷战的结束为美国的某一党派涂脂抹粉。^①

在美国政治中，像凯南这样对历史有深刻洞察力的人已是凤毛麟角，选民更关心自己的饭碗能否保住，对共和党拉冷战胜利的大旗作虎皮的手法和凯南的反驳，多数人既不理解，也无兴趣，然而经济不景气却是不争的事实。1992 年美国大选以民主党的压倒性优势（370 对 168 选举人票）告终，一路下滑的美国经济是主要原因。至此，老布什在戈尔巴乔夫离去一年之内后也告别政坛。抛开政治制度和国情不谈，这两位冷战终结的见证人不无讽刺地殊途同归：尽管二人在外交方面的业绩可圈可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垮台前一年的 1990 年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都被各自的人民所抛弃。“堤外”业绩其实很难弥补“堤内”的损失。

二、冷战“胜利”的代价

苏联作为一个政治符号或政治实体，毕竟已成为过去，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尽管如此，在哪个领域、在多大程度上苏联的失败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美国的胜利，其实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美国在冷战期间有近十万美军死于海外征战（主要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数倍于苏军在阿富汗的阵亡数字。普通美国人民显然为冷战的胜利付出了更多的生命代价。

^① George Kennan, “The GOP Won the Cold War? Ridiculou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1992.

然而，冷战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国际关系体制，的确有别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尽管如此，“冷战”这一历史过程得以“善终”，还是有相当的偶然性。至少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几乎发生核对抗。在13天的危机过程中，肯尼迪政府制定了在1962年10月30日之前空袭古巴的计划。美方轰炸时机的选择，是建立在苏方在此之前不会在已经部署在古巴的近、中程导弹上安装核弹头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然而美方未曾料到的是，苏军当时部署在古巴的42枚中程导弹（可以覆盖美国全境）和9枚短程导弹（用以打击可能在古巴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有20-36枚已经装有核弹头，另有20枚核弹头正在运送途中；为了保护这些导弹，苏联在古巴还部署了4.3万名苏军，而且苏军指挥官被授权在美军入侵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核武器。对于苏军箭在弦上的态势，美方全然不知。肯尼迪总统只是凭直觉和对军方的不信任，才在关键时刻否决了军方一再坚持的入侵古巴的计划。^①1992年苏方公布冷战档案，美方大吃一惊。当年参与危机处理的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得知后震惊不已，认为“如果美军当年入侵古巴，核战爆发的几率是99%……美苏古三方的行为都建立在错误的判断、错误的评估和错误的情报基础之上”。^②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完全有可能转化为一场美苏的直接冲突以致核对抗。以此类推，冷战之所以没有演变成热战，导致两败俱伤，完全是侥幸。在这个意义上，盖迪斯的“冷战和平论”（Cold War as a “long peace”）的论点和论据是大可质疑的。^③所谓冷战中哪一方取胜之说，显然十分幼稚、不负责任，甚至相当荒谬。

在意识形态和哲学领域，前苏联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体制的破产，不仅导致了西方为主的国际体制的失衡，也极大削弱了西方理想主义在道义上对西方物质主义的制衡；西方内部在理念和体制上的单一性，使西方新自由主义逐步滑向政治上的单边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经济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小布什执政八年期间达到顶峰，并最终在2008年酿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解体，其所影响的仅仅是所在国人民的福祉，那么西方新自由主义

① Andrew Bacevich, *Limits of Power: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Metropolitan, 2008, pp. 90-93. 另见 “JFK vetoed a Cuba attack // Top advisers urged it during missile crisis”, *Chicago Sun-Times*, October 19, 1987.

② Martin Tolchin, “U.S. Underestimated Soviet Force In Cuba During '62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7, 1992, p. A11, [http://www.nytimes.com/1992/01/15/world/us-underestimated-soviet-force-in-cuba-during-62-missile-crisis.html? scp = 1&sq= McNamara,% 20 Cuba,% 20nuclear % 20 warheads,% 201992&st = cse](http://www.nytimes.com/1992/01/15/world/us-underestimated-soviet-force-in-cuba-during-62-missile-crisis.html?scp=1&sq=McNamara,%20Cuba,%20nuclear%20warheads,%201992&st=cse)

③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1986.

义的“过失”则在世界范围内“摧枯拉朽”，首当其冲的是美国自身及其一贯正确的经济和治国理念，即所谓“华盛顿共识”。当年谁赢得了冷战，早已失去意义。

在认同性层面，政治和意识形态化的苏联的解体是绝对的，但也以硬着陆的方式转化为文化的俄罗斯，尽管代价是沉重的。相比之下，作为冷战“胜利者”的美国却没有类似的文化“归宿”，仍然而且必须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美国凝聚力的唯一载体。在这一点上，俄国人似乎早有预感，如果不是“预谋”的话。八十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顾问阿尔巴托夫曾对美方表示过：“我们真是对你们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那就是使你们失去了一个敌人。”阿尔巴托夫的“玩笑”，一语道破了美国国家认同中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即美国的存在和国民对美国理念（American Creed）的认同，一直是建立在拥有或刻意建构一个外在敌人的基础之上，舍此美利坚则国将不国。对于美国国民性中的这一独特的诉求或软肋，亨廷顿有着精辟的论述：美国人从开国之初，就将其理念（creedal identity）建立在他们所不齿的“异类”的对立面。美国的敌人总是被界定为自由的反对者。美国独立时，因为美国人无法在文化上与英国加以区分，因此只能从政治上划清界限。英国代表着暴君、贵族、压迫，美国则象征民主、平等、共和。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都把自己置于欧洲的对立面，欧洲代表过去——落后、不自由、不平等、封建主义、君主制和帝国主义，美国则代表未来——进步、自由、平等和共和。在二十世纪美国登上世界舞台以后，不再将自身置于欧洲的对立面，而是以欧美文明领袖的身份，对抗挑战这一文明的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二战以后，美国将自身界定为民主自由世界的领袖，反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①

根据亨廷顿的看法，美国在失去了外部“敌对”势力以后，内部的聚合力日益减弱，甚至出现了亨廷顿所说的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相比之下，美国以外的其他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认同之间没有什么连带关系。没有共产主义，中国仍然是中国。英国、法国、日本、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摆脱过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而得以延续。亨氏因此提出了要以美国基督教主体的政治文化对美国“离心离德”的少数族裔“重新美国化”（re-Americanization）的口号。他认为，否则的话，美国作为一个没有深层文化的、极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混合体，将会象前苏联一样被历史所淘汰。^②

① Samuel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vol.76, no.5,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7, p.30.

② Ibid, pp.28-49.

1992年5月6日，无官一身轻的戈尔巴乔夫，显然是怀着复杂的心情前往美国密苏里州的小镇富尔顿（Fulton），对威斯特敏斯特学院（Westminster College）的师生发表讲话。46年前，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就是在这里发表了重要的“铁幕”（iron curtain）演说，拉开了冷战序幕，环球从此东西。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演讲不完全是为了“终结”历史、面向未来。在一定程度上，这位前苏联的最后一位领袖人物似乎在试图“修正”历史。他提醒听众，二战以后的苏联已经“精疲力竭”、“家园破碎”（too exhausted and destroyed），不仅无心无力与美国竞争，而且十分害怕战争。戈氏的言外之意是，当年丘吉尔在富尔顿的“铁幕”论，不仅言过其实，而且是“不现实”的和“危险的”。冷战的开启是双方的错误造成的：苏联有责任，即错误地认为战胜法西斯主义以后世界会倒向共产主义；然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发起的核武器竞赛，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fateful error）。对此，戈尔巴乔夫警告说：“把冷战的胜利简单地解释为是西方的胜利，是一个理念上甚至是政治上的错误”；“冷战的结束是常识、理性、民主和共同的人类价值观的总体的胜利”，“使我们得以从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中得以解脱”。五个月后，凯南在《纽约时报》上重复了这一论点，认为冷战是美苏双方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耗费巨大的政治博弈”。除了追忆往昔，戈尔巴乔夫还告诫美国不要在国际上自以为是，认为赢得了冷战就可以主宰世界。他在演讲中更寄希望于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并拥有更多和更有效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以避免世界再回到对抗和战争。^①

戈尔巴乔夫的告诫不是无的放矢。1989年12月东欧剧变时期，戈尔巴乔夫断然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拒绝对东欧国家动用武力。同年同月，老布什则以“禁毒”为由，以武力推翻中美洲小国巴拿马的诺列加军人政府。此次行动美军出兵27,000人，是越战以后美军在海外最大的军事行动。而这一记录一年后又被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刷新（美军共动用54万兵力）。事实上，没有外在敌手的美国，在苏联垮台之前就开始为所欲为，一发而不可收。据美国国会调研部（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04年的统计，美国从1798年到2004年的206年间，一共有320次公开使用武力（overt use of military force）的记录，平均每年1.5次。如果把这一阶段以冷战结束的1991年为界一分为二，那么前193年（1798-1991）美国每年平均

^① Francis Clines, “At Site of ‘Iron Curtain’ Speech, Gorbachev Buries the Cold War”, *New York Times*, May 7, 1992, <http://query.nytimes.com/gst/fullpage.html?res=9E0CE0DA163CF934A35756C0A964958260&pagewanted=all>

用兵 1.15 次；后冷战时期的 13 年（1991-2004）美国每年平均用兵次数达 7.8 次，几乎为冷战结束以前年平均数的 7 倍，还不包括美国情报系统的秘密行动。^①

冷战以后美国在世界各地频频用兵，从一个方面表明美国的确赢得了冷战。在国际体系层面，美国不仅失去了一个令其生畏而又令人尊敬的对手，同时也失去了制约美国对外行为的国际机制。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缺乏自我约束的理智和体制的美国，^②可以说是情不自禁地滑向了单边主义。马基雅维利说过：“人之所以诚实是因为受到约束 [Men... are kept honest by constraint]”；反之，一个再诚实的人、再高尚的政体，如果缺乏内外的制约，势必走向反面。美国固然在冷战中得以幸存，然而虽“胜”而不似胜，不仅失去了内部整合的凝聚力，而且由于失去了制约其外部行为的对手，在追求自身绝对安全和绝对国际行动自由的非理性诉求中，迅速挥霍了多年聚敛的软硬实力。

在冷战结束 20 年之后，回顾这一场在冷战和后冷战之间承上启下的“谁赢得了冷战”的辩论，就像冷战初期麦卡锡参议员挑起的“谁丢失了中国”的辩论一样，都是美国政治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产物。不同的是，“谁丢失了中国”的辩论发生在美国最强大的时候，使美国上下人人自危；而“谁赢得了冷战”的辩论则是在美国最应自省的时候，它使美国政治精英头脑发热，一直处于高度亢奋状态而难以自己。

三、对冷战结束的理性思考

“谁赢得了冷战”？不仅对美俄双方，而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个伪命题。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继续以西方的视角、西方的价值观、西

^① Steven Hook, *U.S. Foreign Policy: The Paradox of World Power*, 3rd ed., CQ Press, 2010, p. 314; Richard Grimmett, “Instances of the 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broad, 1798-2008”,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2, 2009.

^② 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体中，国会在理论上对美国的对外事务拥有决定性的权力，如宣战权、拨款权、批准条约权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行政部门、尤其是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多次海外用兵，立法部门要么蒙在鼓里，要么随波逐流，要么有求必应，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已经基本上失去了任何有效的制约。（参见 Steven Hook, *U.S. Foreign Policy: The Paradox of World Power*, 3rd ed., CQ Press, 2010, 第五章）二十世纪，美国两位被立案弹劾的总统（尼克松和克林顿）都是因国内事务。美国历史上还未曾有高官因发动对外战争而受罚的例子。美国在越战后期的全国性的反战运动，其直接原因是美国当时的募兵制。1971 年尼克松总统开始减少并最终取消兵役制后，美国的反战运动也嘎然而止。（参见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pp. 280-281.）

方的逻辑和西方的话语，来解释、弘扬甚至向全世界推销一些本来应该反思、批判甚至应该抛弃的东西。^①

冷战的真实及其历史意义在于，它结束了 20 世纪这一西方文明世界最大规模的“内战”。美国军事史学家威廉·林德(William Lind)的“西方内战”一说认为，直到冷战结束时为止的历史都属于“西方内战”(Western civil wars)，这不仅包括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也包括自 1618 年(三十年战争，1618-1648)以后西方国家之间无休止的战事，当然还包括西方在广袤的非西方世界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②经过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西方自由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在最终排除了异己(德日俄)，并以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整合了四方之后，一个统一的西方得以以强力面对非西方的世界，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快速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基于同样的道理，经过 20 世纪西方各类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剧烈冲撞，西方已经确立了相对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并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西方自由主义在“终结”了这段“西方内战”的历史之后，西方现实主义的代表亨廷顿于 1993 年提出“文明冲突论”(clashes of civilization)，^③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确实在内部实现了和平，但在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方面却选择了对立和冲突。

林德的论点至少给人以两点启示。首先，西方作为国际政治的主要参与者，其行为方式往往采取战争手段，不管这些战争是以“冷”或“热”的方式，也不管是在西方国家之间还是以非西方国家为对象。事实上，这个使历史“终结”的 20 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世纪。自公元 1000 年以来，共有 1.5 亿人死于战乱，其

① 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经常表现在对“时代”的“定位”问题上。比较常见定位有《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的所谓“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见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也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Pax Britannica)过渡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一说，其交接点为查尔斯·金德伯格首创的“霸权稳定论”，见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39*, London: Allen Lane, 1973；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把西方自由主义与其对手西方共产主义的最后一战(即冷战)描述成前者对后者的历史性胜利，人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从而“终止”。福山的论点 1989 年首次发表于美国《国家利益》杂志(National Interests, summer 1989)。

② 关于林德的观点，见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no. 93, Summer 1993, pp. 22-49。美国保守主义作家、前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初选)帕特·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的新作《丘吉尔、希特勒和不必要的战争：英国如何失去了帝国？西方如何失去世界？》中，也采用了“西方内战”的概念。然而布坎南的对“西方内战”时间范围的界定局限于一战和二战。(参见 Churchill, *Hitler and “The Unnecessary War”: How Britain Lost Its Empire and the West Lost the World?*, New York: Crown, 2009.)

③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es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no. 93, Summer 1993, pp.22-49.

中 75%发生在 20 世纪。^①林德以“西方内战”的时空观，高度浓缩了这段血与火的历史，不仅基于对历史大势的把握，更需要一些勇气。战争与杀戮古已有之，并非西方专利。然而战争的规模、频率、持久性和破坏力，却与西方工业化和科学发展同步提升。2007 年，美国学者康大伟（David Kang）对欧洲和东亚地区政治“长周期”加以比较，结论是，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疆界自公元 1200 年以后基本没有改变过。相比之下，1500 年欧洲的 500 个独立政体到 1900 年只剩下 20 余个。欧洲国家之间无休止的征战，使绝大部分独立的政治实体消亡。^②本文在此引用这个例子，不在于表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要“好于”欧洲的“丛林政治”，重要的是这客观上说明了中国与西方在地区政治的互动形式和结果的不同。

第二，在“西方内战”期间无休止的尚武行为背后，是各种西方思想流派按照自身的逻辑和标准寻求理论和实践的最高纯洁度（或极端性）而进行的无休止的论战。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等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激情表演，并在被林德称之为“西方内战”的最后阶段（20 世纪）达到了顶峰。在西方主义各种流派之间你死我活的交锋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世界也被迫卷入其中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里，不妨把上述西方种种意识形态的表象和内涵定义为“西方主义”（Westernism）。^③这一概念是对西方主要意识形态和理论流派及其方法论的整体描述，既不同于 20 世纪初德日等后现代化西方国家（late modernizers）对盎格鲁—撒克逊的西方自由主义所代表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仇视和批判，^④也有别于近年来西方学者所关注的非西方世界的以反对西方价值观念为主旨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

① William Eckhardt 统计，从公元 1000 年到 1991 年，全世界约有 1 亿 5 千万人死于战乱，而二十世纪的死亡人数为 1 亿 1 千 2 百 50 万，战总数的 75%，占 1800 年以后死亡人数的 89%。（参见 *Civilizations, Empires and Wars: A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War*, McFarland & Company, 1992。另见 John Rourke and Mark Boye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e*, Brief, 7th ed., Columbus, OH: McGraw-Hill, 2008, p.232.）

② David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7, 37-41.

③ 笔者在 2006 年首次使用“西方主义”的概念。见于滨，“‘9·11’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兼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上海美国研究所，论文，2006 年 6 月。

④ 关于所谓“Occidentalism”，见 Ian Buruma and Avishai Margalit, *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 Penguin Press HC, 2004.

西方主义流派五花八门，然而各自对于事物因果关系的处理却惊人地相似，即以一个主要的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来分解和应对复杂的以人为核心的政治世界。最通常的做法是围绕“主”、“客”观为基本自变量，衍生无数解说和理论。以冷战期间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制度上的代表——美国和苏联为例，二者都以政治制度或经济基础的变量来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方式。尽管它们在理论上水火不容，实践中不共戴天，但面对一个拥有各种色彩和层次的“混沌”世界，美苏两国所开出的药方却极为相似，即把复杂的国际事务划为黑白、善恶分明的两极世界，并企图按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改造和征服对方。二战以后，美苏都不愿意看到欧洲殖民主义的延续。为此，美国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统一的自由贸易体制，而苏联则乐见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扩展。为了各自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以及公开或隐蔽的国家利益，美苏都难以容忍“第三条道路”，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有限主权论”(limited sovereignty)。美国以政变的方式推翻了智利的民选总统阿连德，苏联则把“布拉格之春”消灭在萌芽之中。西方主义在方法论上“从一而终”，意识形态上以“我”划线，在外交上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在这一点上，西方主义在各自意识形态方面的极端品性，与宗教原教旨主义强烈的排他性极为相似。

即便是在 21 世纪西方自由主义一手遮天的时代，后现代主义所派生出来的种种“主义”的极端性亦表露无遗：女权主义视男性为万恶之源，极端环保主义认为一切人工痕迹都是大逆不道，反全球化主义对全球化的所有载体（大公司、工业化国家首脑聚会等）均采取暴力抗争，如此等等。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寥寥可数的几位“秀才”不仅在 80 年代以“保守革命”整合美国，更在布什执政的八年间（2001-2008）以强势的单边主义和极端放任的市场经济搅乱世界。到奥巴马执政，共和党内极端保守人士为主体的“茶党”运动(Tea Bag Party)，网罗了各路反政府、反纳税、反移民、反有色人种、反科学等极端人士，已滑到了暴力的边缘。

西方主义伴随着西方工业化产生的巨大的经济—军事能量而传向世界，对处于弱势的非西方世界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从广义的视角，中国 20 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关系走向，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认同了来自西方的三个主要思想和意识形态体系：即 20 世纪初的自由主义(Western Liberalism)、“五四”以后的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以及 1979 年以来的市场资本主义

(Western market-capitalism)。^①然而，上述西方主义都曾对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同时在中国都有“水土不服”的问题，最终也程度不同地被“中国化”。尽管如此，它们所折射出的中与西、新与旧等众多政治光谱，穿越了百年时空，至今仍在中国政治生态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身的价值和地位。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和平加发展为主线的独立自主外交，^②使中国的内外政策都远离西方主义的基本内核，更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中”与“和”的色调。这里所说的“远离”，不是抛弃或决裂。^③而是在经过百余年的彷徨、反思、追求和探索之后，中国在其历史性崛起的过程中，能够同时对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的不同要素，同时进行评估、筛选和理性借鉴，而不必在不同的西方主义范式之间被迫进行“零和”式的、而且往往是痛苦的抉择。^④换言之，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国，在与西方主义百年“不对称”交往之后，对各类西方主义已由理性代替激情，正以“和”的姿态与外部世界接轨。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内部关于冷战输赢的讨论，也许有可能影响美国当时的政治走向（或起反作用），但面对中国历史性崛起的大势，可能只是一个具有某些意义的注脚。

四、美国的对苏/俄政策：从无所作为到咄咄逼人

老布什在 1992 年大选中大打“冷战胜利牌”，而在任期间（1989-1993），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一系列激进以致眼花缭乱的改革措施，如“新思维”（New

① 笔者在此并未将民族主义包括其中，原因有二：一是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是以文化和族裔为核心的社团在政治上和领土上的诉求，与西方其他主要意识形态对事物进行理论（即因果）解释有所不同。二是民族主义在中国作为舶来品，迎合和驱动了中国各种新兴政治势力的基本诉求，即民族救亡和富国强兵。可以说，中国“西化”的政治生态背后，实际上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动力。

② 国内外关于中国外交分期和中国自主外交问题的讨论，一般认定 1982-1986 年为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转型期。1982 年 9 月 1 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了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1986 年 3 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第一次把中国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分十个方面阐述了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至此，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基本完成。

③ 十年来，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转型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的方式。而俄国的政治精英则是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体制，以“休克疗法”一挥而就，进入西方自由主义的殿堂。

④ 1919 年的凡尔赛合约，使中国知识精英对西方自由主义理念的“一厢情愿”破灭，进而转向西方共产主义。1947 年开始的冷战，又迫使新中国在两极世界中“一边倒”。

Thinking)、“公开性”(Glasnost)、“改革”(Perestroika)等,却谨小慎微,缩手缩脚,无所作为,甚至还从前任(里根)的对苏政策中倒退。比如,布什在1989年5月宣布,美国在允许苏联加入西方阵营之前,苏联必须大规模减少对东欧和第三世界的干预。^①然而早在里根第二个任期内(1985-1988),新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已就取缔中程核武器达成了历史性协议。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与包括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内的主要西方领导人均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和工作关系。里根执政的最后一年(1988年),戈尔巴乔夫宣布从阿富汗撤军,随后宣布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停止了用武力干预东欧国家的内政,允许它们自由选择政治制度。作为里根的副总统的布什,应是里根制订对苏政策的参与者之一。然而布什作为有丰富外交和国际事务经验的总统^②入主白宫后,却宣布其对苏政策是“以不变应万变”(status-quo plus),甚至对苏联内部和对外政策中早已出现的重大变化视而不见,从而使其对苏政策处于自相矛盾之中。

布什的“有所不为”的对苏政策在1989年底成了“无能为力”。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措施,苏共一党专政摇摇欲坠,各加盟共和国离心离德,民族矛盾凸显。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型的苏联经济已基本瘫痪,甚至莫斯科都出现了严重的食品短缺。1990年是苏联历史上少有的丰收年,但苏联政治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使近一半的粮食浪费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苏联开始出现饥荒。戈尔巴乔夫呼吁西方加大对苏经济援助。然而布什虽然不希望戈尔巴乔夫垮台,甚至刻意冷对呼之欲出的叶利钦,但美国当时也面临经济衰退,无力相助,只能提供部分应急食品援助,^③坐视激进变革所释放的能量和乱象迅速吞噬戈尔巴乔夫及其红色帝国。

布什实行“以不变应万变”的对苏政策,不完全是因为美国本身的经济困难。老布什的外交团队中,包括布什本人,几乎没有熟悉苏联事务的人。国务卿贝克出身律师,对华盛顿事务了如指掌,但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出任国务卿是因为他为

①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p. 355.

② 布什在1971至1981年间,曾先后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驻华联络处主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副总统。见白宫网站: <http://www.whitehouse.gov/about/presidents/georgehwush>

③ 布什在任期间对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提供了37.5亿美元的食品援助,叶利钦上台后要求布什政府追加6亿美元的食品援助,然而国务卿贝克不很情愿。布什政府最热心的项目是如何协助俄国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此,美国国会同意拨款4亿美元。见Thomas Friedman, “Baker and Yeltsin Agree on U.S. Help in Scrapping Arm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1992, <http://www.nytimes.com/1992/02/18/world/baker-and-yeltsin-agree-on-us-help-in-scrapping-arms.html?scp=9&sq=Bush,%20Soviet%20Union,%20February%201992&st=cse>

老布什助选有功。^① 在欠缺国际事务经验方面，贝克其实可以和当年尼克松第一任期时的国务卿罗杰斯相比。而后者出任尼克松的首席外交官，恰恰是因为他对对外事务一窍不通，正好为尼克松本人和基辛格直接插手外交创造了条件。相反，贝克的前任舒尔茨（里根政府的国务卿）的外交团队中则有众多苏联问题专家。布什在苏联剧变时期束手无策，除了“无力”的因素之外，“无知”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之一。

布什面对苏联解体前夕的剧变裹足不前、无所作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和西方知识精英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分歧。一方面，自由派学者对冷战的终结和苏联垮台弹冠相庆，认为国际社会将一劳永逸地导向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② 另一方面，现实派则认为解体后的苏联会导致政局动荡、社会动乱、核武失控、种族纷争、各种极端势力乘虚而入，给地缘政治和美国利益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美国学界对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转型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布什的继任者克林顿对外交事务基本上是空白，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却是经历丰富的外交官和国际问题学者。在莱克的指导下，所谓“克林顿主义”的对外政策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前者着眼于美国的价值观，后者服务于美国的切身利益。在对俄政策上，美国于1994年1月开始北约东扩计划，第一步是实行所谓“和平伙伴”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 或 PfP），主要对象是东欧国家以及从前苏联分离出来的各欧洲及中亚国家。1997年，捷克、波兰和匈牙利应邀加入北约，并于1999年成为北约正式成员。2000年5月，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等9国正式提出加入北约，并于2004年和2009年先后成为北约正式成员。

北约的持续东扩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不满。因为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北约的对立面华沙条约组织就已于1991年7月1日宣布解散。而1990年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接受德国统一，条件之一就是老布什和撒切尔保证北约不再扩张。^③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对欧洲的“放手”（hands off）政策博得了欧洲各国的好感，北约也逐渐失去了目标。到苏联解体后，甚至连北约的存在也成了问题。然而，没有了北约，美国在欧洲便失去了落脚点，欧洲脱离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的轨道，

① 见 John Newhouse, “Profiles: The Tactician”, *The New Yorker*, May 7, 1990, pp. 50-51.

②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pp. 3-18.

③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pp. 383-4.

将只是时间问题。而一个统一和强大的德国并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全球利益。为此，北约不仅有必要存在，而且必须不断扩展到包括甚至欧洲以外的地域，一个全球性的北约军事机器只能由美国来领导和整合。从经济利益考虑，北约的新成员必须换装美式装备，这对于美国的军工集团来说，无疑又是一个不小的生财机会。北约东扩，实际上是一箭数雕。

然而北约在冷战期间从未放过一枪，冷战后却在波斯尼亚（1995）和科索沃（1999）使用武力，极大伤害了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心和国际形象，以及俄国作为东正教领袖的地位，也损害了俄国盟友塞尔维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西方为“价值观”而战的作法，使叶利钦大为恼怒。即便是在最有利的国际环境中，俄国的历史性转型也面临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它必须在全无市场机制的环境中建立市场经济，在一个有着千年专制体制的政治文化中建立民主，为只有帝国传统的俄国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的国与国的外交关系。^①更何况俄罗斯的转型异常痛苦且代价沉重。如今，俄罗斯尚未从西方建议的“休克疗法”中恢复神智，北约的东扩和对南联盟的“人道战争”又大大压缩了俄罗斯的外交空间。克林顿执政八年，美俄关系也快步进入了所谓“冷和平”（cold peace，叶利钦语，1994年12月）。^②1999年底，叶利钦突然去职，把俄罗斯交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此之前，这位俄罗斯的民主之父离任前的最后一次出访地竟是非西方的中国。不仅如此，这位俄国第一位民选总统还竟然选择在北京提醒华盛顿说，俄国拥有摧毁一切的核武库。^③

十年之内，俄罗斯内部的转型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而俄罗斯的外交却实现了180度的转身，从戈尔巴乔夫的“西向”，回归到某种更为俄罗斯式的欧亚主义（Eurasianism）。俄罗斯外部的原因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转变，是一个应该讨论的问题。然而，这一时期的美国两任总统，不管是无所作为的布什，还是志在必得的克林顿，在处理对苏/俄政策时可能都忘记了、或者根本就未听说过19世纪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关于俄国的一句名言：“俄国从不像它外表那样强大或软弱（Russia is never as strong or as weak as it appears）”。也许布什和克林顿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基

① Andrew Kuchins, ed., *Russia After the Fall*,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2, p. 6.

② George J. Church and Sally B. Donnelly, “Next, A Cold Peace?”, *Time*, December 14, 1994,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82016,00.html>. 无独有偶，叶利钦发明“冷和平”一词10年后，西方和美国对叶利钦继承人普京咄咄逼人的外交态势有强烈感受，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Jaanusz Bugajski为此出了一本专著《冷和平：俄国的新帝国主义》（*Cold Peace: Russia's New Imperialism*, Washington D.C.: CSIS, 2004）。

③ 见于滨：“Back to the Future”,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1, no.3 (Pacific Forum, CSIS: 4th Quarter, December 1999),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9903qchina_russia.pdf

本的事实：虽然意识形态的苏联垮了，但文化的俄罗斯仍在。况且俄罗斯仍然是一个横跨十个时区的欧亚大国，经济、军事和人文的潜力仍在，其盛衰沉浮对地区政治和世界格局都是举足轻重的。过强过弱、忽冷忽热的对俄政策，都会产生反效果。

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二十年里，俄国一直在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俄国的文化和地理之间徘徊，以寻求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作为一个横跨 10 个时区的欧亚大国，也许这一寻觅会一直继续下去。在这个意义上，西化、西向、欧亚主义等等价值和利益取向，对俄罗斯来说既是瞬间的，也是永恒的。然而这种对俄罗斯极为抽象的定位，并不能代替对俄罗斯转型过程的细微研究。美国和西方学界对俄罗斯转型的研究，也经历了震荡式的转型，但对俄罗斯的转型有回音但无共识，有成果而无定论。对于俄罗斯的现状与未来，美国和西方的俄罗斯研究也在孜孜寻觅和探索，其中不乏他山之石。

五、美国的“后共产主义问题”^①

在西方的苏联学和俄罗斯学的书山文海中，《共产主义问题》杂志（*Problems of Communism*）占有某种特殊的地位。冷战时期，这份由美国政府主办的“学术”杂志，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美国外交、情报、学者和学生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杂志从 1952 年创刊，几经波折，冷战结束后又与时俱进，更名为《后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一直延续至今，其寿命甚至远远超过很多前共产主义国家。

《共产主义问题》杂志由美国新闻署出版，专门报道和分析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最初只用于对外发行，不得在美国境内销售（注：美国之音也历来如此）。然而其首任主编艾布汉姆·波拉姆伯格（Abraham Brumberg）却要求撰稿人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更细微的分析，而非以意识形态和黑白分明的宣传方式面对读者，撰稿人甚至不必反映美国官方的观点。然而这种既拿政府的钱又标榜“独立”的路毕竟不好走，尤其是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五十年代。事实上，政府和政治的影响一直存在，只是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比如，杂志创办初期，美国政府规定所有稿件的作者必须通过“国家安全检查”（security clearance）；在一段时间里，政府甚至禁止在杂志中出现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字眼。对于一份聚焦共产主义制度的刊物来说，如此意识形态化的规定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随着美苏关系在赫鲁晓夫执政

^① 本节除特定注释外，主要资料来源于 Ann Robertson, “Enduring Problems: Fifty Years of Scholarship”,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January/February, 2003, pp. 3-7.

后期的逐步改善，政府严格的政治、安全审查制度也逐步放松，《问题》杂志“非意识形态化”渐成常态。其稿源不受地理、国别、意识形态的限制；编辑人员对所收到的稿件完全以“专业”和“客观”的标准加以处理，不受外界和“上级”意图的影响。然而《问题》杂志的“专业性”和“客观性”并未超出美国化的范式，虽然少了官气，更接近美国主流媒体的“客观”和“公平”标准。但美国主流媒体在对国际事务的报道和评论中，充满了美式的傲慢、偏见与说教，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鲜有准确与客观。美国媒体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近十年的反恐战争的初期，几乎成了政府的传声筒，只是在战事遇到重大挫折后才开始改弦更张。基辛格还注意到美国媒体对国际事务的报道鲜有持久性，常常从一件事跳跃到另一件毫不相干的事，在过度报道和不闻不问两极之间徘徊。^①

《问题》杂志与纯学术杂志最大的不同在于，该杂志不使用外部送审制(peer review)，而是由编辑部集体定稿。尽管如此，美国国会还是在1972年通过一项立法，把《问题》杂志与美国新闻署出版的其他只对外发行的“宣传性”出版物区别开来，破例允许《问题》杂志作为“学术”期刊在国内发行。国会的这一举动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杂志要有名气，必须有名人投稿。然而学界的很多人士为了保持学术“中立”，常常避免与政府资助的项目有任何来往，《问题》杂志因此只能而且必须改头换面，向学术靠拢。国会对《问题》网开一面，《问题》在美国内外的名声和发行量也节节攀升。在最鼎盛时期，《问题》在美国国内发行量达四万份，这对一份“学术”杂志来说，是一个罕见的数字。《问题》的优势在几个方面：它不同于一般学术杂志的深奥甚至艰涩，也不像媒体那样就事论事，而是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纽约时报》甚至认为《问题》是“媒体和学者研究共产主义问题的首选期刊。”此外，它既有政府的资助，又有学术的名声；读者中不仅有外国人（除英文版外，还有法、德、意、葡、西文版），也有本国人，其中不仅有大量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有国务院的外交官和中情局的研究人员，据称一些前苏联学者对《问题》的评价也不错。

共产主义的前苏联经过1989-1991年间的巨变演变成民主的俄罗斯，美国解决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龙头的“苏联问题”，包括《问题》杂志在内的整个美国苏联学/俄罗斯学也立即陷入了危机。冷战期间，美国国务院设有专门款项，资助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比如1983年国务院的“苏联和东欧问题教育拨款法”(Soviet and East

^①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Touchstone, 2001, p. 27.

European Training Act of 1983), 直接资助“美国斯拉夫研究发展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lavic Studies)、“美国国际研究与交流董事会”(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xchange Board)、美国俄语教师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Teachers of Russian), 以及《问题》杂志等学术和行业组织。共产主义问题的“解决”, 美国政府立刻开始减少以致最终停止了对这些组织的资助。甚至在苏联倒台之前, 美国政府内部对苏联和东欧研究就不再像冷战时期那般热心, 俄语也不再是与美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语言。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 导致美国军事、外交和情报部门开始转而聚焦中东和阿拉伯世界, 中东问题研究和阿拉伯语大受青睐。在政府功能方面, 负责后共产主义国家事务的文化和教育部门由美国国际发展署取代, 后共产主义问题在美国官方显然只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1992年4月29日, 美国新闻署主任亨利·卡托(Henry Catto)在没有事先通知《问题》杂志编辑部的情况下, 突然宣布取消《问题》。1992年6月, 《问题》出版了最后一期, 中止了其40年的历程。美国“赢得了”冷战, 《问题》也寿终正寝了。

美国新闻署对《共产主义问题》釜底抽薪后, 私营的夏普出版社(M.E. Sharpe)出面, 由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苏问题研究所出资并组织编辑部, 于1994年秋再度出版这份杂志, 只是把刊名改为《后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2002年乔治·华盛顿大学又停止资助《后共产主义问题》以后, 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的美国欧亚和东欧研究协会(*National Council for Eurasian and East European Research*)接手主办并提供资助, 夏普出版社发行至今。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 《问题》杂志的命运与该刊的名称紧密相连, 即《共产主义问题》本身代表了典型的美式“外国研究”(foreign studies)的特点, 即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是需要战而胜之的敌手来对待, 美国的“外国研究”因此也有“敌人研究”(enemy studies)的别称。美国致力于研究某个国家, 多多少少是因为这个国家是美国的敌人或潜在敌人。反之, 如果一个国家不成其为美国的敌人, 美国对这国家的兴趣就会大大下降。在美国政府资助的“外国研究”中, 鲜有以平等的方式、平常的心态, 完全出于对研究对象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象的兴趣、好奇心和学习的态度和动机。2006年美国国防部出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 正式把俄语从所谓“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外语”中删除, 而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中文被列入其中。如今, 能说能懂这三种语言的人很容易在美国政府中与安全、外交和情报等部门找到工作。几年前, 美国国防部和教育部联手, 通过所谓“旗舰工程(Flagship Program)”, 在全美各地数千家中学和高中开设中文课, 其规模甚至超过冷战时期推行俄语的规模。

在这一点上，亨廷顿所说的“美国需要一个外在的敌人”的论点甚至还不够给力。美国似乎不仅需要一个敌人，而且在有意无意地制造一个“敌人”。美国的“外国研究”也因此找到了新的安身立命之道，即一个日渐崛起的中国，正在被美国塑造造成“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曾被被悠悠万事、反恐为大小布什政府“冷冻”了八年，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巴马似乎在情不自禁地“锁定”中国，尽管这对手的绝大多数人民根本无意挑战美国，尽管这个国家正在以巨额资金支持美国经济的运行和美国人难以遏制的消费欲。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苏联学向俄罗斯研究转型的迷茫与困惑，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Abstract】 In the midst of the rapid changes occurring when the Soviet Union was being displaced by Russia, the U.S. reciprocated with a “three-strike” policy: inaction or “status-quo plus” before the Soviet collapse, a brief period of shock and confusion following the collapse, and an overwhelming euphoria leading to the highly ideological polemic of “who won the Cold War.” Ironically, the victorious Bush lost election due to economic agony at home, thus joining Gorbachev as a “loser” abandoned by their respective constituencies at home despite their foreign policy accomplishment (Gorbachev was the 1990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The Cold War and its ending, however, can hardly be defined by a zero-sum, win-lose verdict. If anything, it was the culmination and final stage of the “Western civil wars” of the past centuries, during which major Western powers and ideologies were competing for primacy inflicting heavy costs on all sides. In the 20 year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has squandered huge amount of its hard and soft power for its goals of absolute security and absolute freedom of action. The real implication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f anything, is the West’s re-direction towards “civilizational” clashes against the non-West following the West’s internal modera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academia, Western Sovietology lost, almost overnight, its purpose and energy. Stunned by the sudden change, the main stream of Western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arted to be challenged by peripheral and new forces. Perhap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Sovietology to Russianology was evidenced by the decline and recovering of the journal of *Problems of Communism*, now renamed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Russianology in the West is now faced with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enormous intellectual space.

【Key words】 Sovietology, transition, Russianology, post-Communism studies, Westism, Western civil wars

【Аннотация】 Политику СШ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адикаль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в СССР до и после 1990 г. можно свести к «трилоги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Буша старшего: негативный прогноз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охранение статус-кво; краткосрочный шок и смятение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и последующее удивление и торжество.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самопровозглашенный «победитель в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Буш вскоре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ССР проиграл в предвыборной гонке из-з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пада в США и неустойчив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астроений.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и Буш, и Горбачёв, д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лидера с выдающимися достижениями в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Горбачёв в 1990 г. был удостоен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премии мира), были брошены своими собственным народом.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исход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осто определён понятиями победы или поражения.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является апогеем и завершающим этапом продолжающейся многие века «Западной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а такж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и конфликтов западных держав и их основных идеологий; стороны заплатили высокую цену. В последующие 20 лет США в погоне за абсолют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и абсолютной свободой действий израсходовали много жесткой и мягкой силы. Ре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Запад после внутренне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обратился к «столкновению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незападного мира. В научных кругах развал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ивёл к потере цели и мотиваци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ССР» на Западе, 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афазия наступила и в среде ведущих западны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 сред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оказавшихся перед лицом серьёзного вызова новых и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ых течени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журнал «Коммунизм» воскрес из мертвых, став миниатюрой переход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ССР» к «изучению Росси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на Западе столкнулись с проблемами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м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однако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существует обшир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ля воображения и маневрирова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сткоммунизма, вестернизм, западные гражданские войны,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俄罗斯大事记

(2011年9-10月)

9月

1日 俄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

俄总统非洲国家合作特别代表马尔格洛夫 (Mikhail Margelov) 表示, 希望利比亚新政府承认并遵守俄罗斯与前政府签订的所有合同。

2日 俄总理普京 (Vladimir Putin) 确认俄政府将在必要时介入机场燃料不足问题。

俄国家石油运输公司 (Transneft) 副总裁巴尔科夫 (Mikhail Barkov) 称该公司没有放弃布尔加斯-亚历山德鲁波利斯 (Burgas-Alexandroupolis) 管道, 只是在今秋暂停该项目。

3日 标志着独联体组织成立 20 周年的独联体峰会在杜尚别 (Dushanbe) 召开。

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Sergei Lavrov) 称俄反对包括欧盟禁购叙利亚石油在内的对叙利亚的单边制裁。

4日 俄亿万富翁政客普罗霍洛夫 (Mikhail Prokhorov) 宣布准备竞选总统或争取就任总理。

5日 俄联邦麻醉品监管总局局长伊万诺夫 (Viktor Ivanov) 称中亚禁毒四方成员 (俄罗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将在阿富汗巴达赫尚 (Badakhshan) 地区开展联合缉毒行动, 流入俄罗斯的海洛因都来自该地区。

6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7日 搭载俄“火车头 (Lokomotiv)”冰球队的飞机在雅罗斯拉夫尔 (Yaroslavl) 起飞时坠落。

8日 俄总理普京出席了远东天然气管道一期工程 (萨哈林-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输气管道) 建成开通仪式。

9日 到访莫斯科的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称俄罗斯对待阿萨德 (Bashar al-Assad) 政权的立场不明确, 这可能会损害其形象, 重蹈其在利比亚和伊拉克的覆辙。

10日 亚博卢 (Yabloko) 奠基人和前主席亚夫林斯基 (Grigori Yavlinsky) 称在 12 月选举后如果该党进入国家杜马, 便会提名一名总统候选人。

11日 亚博卢联盟公布了其 12 月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名单。该名单由亚夫林斯基, 现任党主席米特罗欣 (Sergei Mitrokhin), 和该党绿色俄罗斯派系领导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亚布洛科夫 (Alexei Yablokov) 领衔。

12日 俄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 (Vitali Churkin) 称俄支持巴勒斯坦领导人在联合国的一切行动。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和到访的英国首相卡梅伦 (David Cameron) 举行双边会谈。

13日 俄联邦地区发展部巴萨尔金 (Victor Basargin) 称俄将考虑设立专门机构帮助中方企业在俄投资。

14日 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丘罗夫 (Vladimir Churov) 称约有 500 名国际观察员将会到俄监督 12 月的议会选举。

俄总理普京在会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并表示计划明年十月访华。

15日 俄“正义事业”党代表大会解除普罗霍洛夫的党主席职务。

俄与中国确认俄方为中国建造田湾核电站第三和第四机组的第二期工程总合同开始生效。

- 16日 俄反垄断局发起了一项涉及国防部的立案调查，以试图澄清关于对外贸银行（VTB）优待的指控。
俄总理普京出席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意大利埃尼（Eni）公司、法国电力集团（EDF）和德国温特斯公司（Wintershall）南溪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股东协议的签署仪式。
- 17日 俄外交部欢迎联合国关于利比亚的最新决议，称这大体上反映了俄支持在联合国领导下用政治和民主协议的方式来解决危机。
乌马哈诺夫（Ilyas Umakhanov）带领的俄联邦委员会委员代表团到访大马士革，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及反对派代表进行会谈。
- 18日 身着制服的俄军官在莫斯科市中心抗议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的改革，称这将毁灭俄的国防能力；他们还要求获得更好的社保待遇。
- 19日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开始举行 2011 年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 20日 俄驻北约代表罗戈津（Dmitri Rogozin）否认了其可能为了参加议会选举而辞职的报道。
俄联邦移民署称在过去三年中约十四万五千俄罗斯人永久移民国外。
- 21日 俄驻北约代表、反导问题总统特使罗戈津称，欧洲在土耳其部署的反导雷达不会成为俄安全的威胁，也不会恶化俄罗斯与安卡拉的关系。
- 22日 俄与哈萨克两国宣布将会成立联合空中防卫系统，其模式与俄、白俄和亚美尼亚之间的现存系统相同。
- 23日 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和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在莫斯科宣布俄中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第 16 次会议开幕。
- 24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会晤到访莫斯科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
- 25日 俄财长库德林（Alexei Kudrin）称其不会在新一届政府中任职。
- 26日 塔吉克斯坦反对党伊斯兰复兴党新任党主席卡比利（Muhiddin Kabiri）呼吁展开对俄罗斯在塔吉克斯坦军事基地前景的全国性讨论，但他表示无论谁为俄罗斯下任总统，俄仍是战略性伙伴。
俄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证实其已经提交辞职申请。
- 27日 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总裁米勒（Alexei Miller）称该公司准备向乌克兰让步，但是在新协议达成之前，到 2019 年为止的长期合约依然有效。
俄总理普京称副财长西卢阿诺夫（Anton Siluanov）将会代替库德林出任财长一职。
- 29日 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Igor Shuvalov）认为，库德林离开财长一职不会引起金融市场、财政部和俄罗斯预算的不良反应。

10 月

- 1日 土耳其能源部长伊尔迪兹（Taner Yildiz）证实，本应年底到期的土俄西线天然气合约因双方无法就降价问题达成一致而提前终止。
- 4日 俄“正义事业”党承诺将立即归还其在亿万富翁普罗霍罗夫领导期间获得的约为三百一十万

美元的捐赠。

- 5 日 俄总理普京倡议组建欧亚联盟。
- 6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欢迎外国投资者进入俄罗斯传媒产业。
首次正式出访的阿布哈兹总统安克瓦布（Alexandr Ankvab）抵达莫斯科并与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包括军事事务和边境保护在内的一系列协定。
- 7 日 俄副外长博罗达夫金（Aleksey Borodavkin）称俄将坚决要求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结束后减少其在中亚的军事存在。
- 9 日 在叙利亚各反对派代表抵达莫斯科的前夕，俄罗斯副外长博罗达夫金称莫斯科可能提出主持叙利亚当局与反对派的谈判。
- 11 日 俄外交部指责乌克兰在裁定季莫申科案时带有反俄色彩；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称这一案件已被高度政治化。
俄总理普京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的重点是发展不局限于能源的全方位合作。
- 15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声明说，推荐普京参加 2012 年总统选举的决定，是基于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合理性。
- 17 日 俄总理普京在外国投资协商理事会第 25 次全体会议上向外国投资者保证，俄有足够的缓冲余地应对全球经济的各种发展状况。
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了“统一俄罗斯”党提名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领衔的该党国家杜马选举候选人名单。
- 19 日 俄与七个前苏联国家—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 20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关于批准俄中在石油领域合作的协议修改议定书的联邦法》。
- 21 日 民意调查显示，69%的莫斯科人对索比亚宁（Sergei Sobyenin）担任莫斯科市长一年来的工作表示满意。

（胡彦辑）

讣告

本刊副主编、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敏焘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不幸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辞世，享年 68 岁。在本刊工作期间，李敏焘同志兢兢业业，严格细致，以其卓越的业务能力和精湛的编辑技巧，为刊物水准和质量的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编辑部全体同志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同志、好师长而感到万分悲痛。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俄罗斯研究(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1年第6期

(总第172期)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致本刊读者与作者

《俄罗斯研究》自创刊以来,一直得到广大读者和作者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正是由于这种关心和支持,十几年来,《俄罗斯研究》获得了坚实的进步与发展。编辑部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近年来,在世界形势发生广泛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这对我们办好刊物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本着办刊宗旨,《俄罗斯研究》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际形势和俄罗斯问题的各方面人士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作为核心学术期刊,《俄罗斯研究》将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体现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和水平的重要平台之一,为推进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外,为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俄罗斯研究》还将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作为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与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相适应,《俄罗斯研究》除了继续关注重点放在俄罗斯现状以外,还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栏目设置也将更加多元。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各方面学者专家继续关心和支持本刊工作,不吝赐稿。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读者和作者继续对本刊提供批评意见和建议,以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工作。

(赐稿者如需了解本刊的有关规范,请登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rus.org.cn>, 查阅“最新期刊”栏目中的“《俄罗斯研究》投稿须知”。)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2113

排版: 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

网络电子版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qikan.com www.qikan.com.cn

· 公开发行 ·

定价: 12.00 元